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四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四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發行

國際合作之前途……陳世材（一）
當前世界政治的主流……戴文葆（四）
蘇波疆界問題……史國綱（七）
國際經濟合作中之貨幣金融……孫九祿（一〇）
懷特戰後貨幣計劃與國際銀行計劃……曾紀桐（一六）
美國之高度工業化……湯德明（二〇）
工業救濟問題之檢討……田文彬（二五）
縣官在政制史上的地位……周蔭棠（二七）
隋唐五代的歲貢科舉……曾資生（三〇）
請改貧金為工讀金……湯學耕（三六）
二月星座神話……陳遵嬀（三八）
汽車行駛方向應否改為左來右去？……何乃民（三九）
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之投效……余行邁（四一）
明紀輯略與朝鮮辨誣……王崇武（四五）
文學的時代……姜蘊剛（四九）
藝術有用論……王陵平（五一）
中國戰時戲劇創作之演變……田　禽（五三）
邱吉爾的雪茄煙……許君遠譯（五七）
翠玉戒指……錢歌川譯（五九）

國際合作之前途

陳世材

一　國際合作之演進

國際合作是人類進化過程中一種自然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原動力，在於人類天賦的本性；而這種趨勢的終極目標，便是　國父所期望的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人類爲使這種趨勢加速度進行起見，會有不斷的努力，這就是我們所謂「國際合作運動」。我們現今仍在戰爭圈內，但是將來終有一天要恢復和平。將來的世界和平能夠維持到甚麼地步，就要看這個國際合作運動發展到甚麼程度。這是目前全人類的一大課題。

何以說國際合作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種自然趨勢呢？因爲合作是人類的本能，要求合作也是人類的天性。西哲亞理斯多德有言：「人類是政治的動物」，這便是說，人類生來就是合羣的動物，有合作的本能，也有合作的要求。所以自古以來，國際合作的事實，史不絕書。我國春秋時代的諸侯會盟，西洋古希臘時代的亞卡安聯盟(Achean League)，都是古代國際合作的顯例。

我們若就整個人類歷史來看，可以發見國際合作的演進，有下面幾種趨勢：

第一，在範圍方面，國際合作是由局部的合作逐漸演變爲全球的合作。在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以前，人類的世界觀念，只是局部的世界。中國人的所謂「天下」，僅限於東亞一隅。西洋人的所謂「國際社會」(Family of Nations)，在十八世紀以前，也僅以歐洲國家爲限。自美國獨立後，「國際社會」中才有非歐洲的分子，十九世紀末葉後，「國際社會」才擴展到亞洲。前次的大戰，叫做「世界大戰」，這次的大戰，在許多國外的出版物裏，便不再稱「世界大戰」，而稱「全球大戰」。國際合作的範圍是隨着這種觀念的擴展而擴展的。

第二，在方式方面，國際合作是由雙方的合作逐漸演變爲多方的合作，由臨時的合作逐漸演變爲長期的合作。古時國際合作多半限於雙方，即使同一事件涉及許多國家，那個發動合作的國家，也只知派遣多數代表，分別前往有關各國接洽，後來人類發明了利用國際會議的方式，於是國際合作由雙方的一變而爲多方的。但是，國際會議的召集，仍祇有臨時合作的功能。自一八七四年萬國郵政公會成立後，常設的國際合作機構才日見發達，於是國際合作的方式，又由臨時的一變而爲長期的。

第三，在內容方面，國際合作是由片斷的合作逐漸演變爲全面的合作。從前的國際合作，多半限於某些特定事件，例如萬國郵政公會，國際度量衡局等，都祇是某一方面的國際合作，這種國際合作，很顯然的，是零碎的，片斷的。自從國際聯盟成立以後，國際合作漸有概括一切的趨勢，現在世界聯邦之論，甚囂塵上，將來戰事結束之後，縱使世界聯邦不能即時實現，但國際合作總是朝着全面合作這一方向走，似可斷言。

以上三點，說明了國際合作的歷史趨勢。國際合作既有數千年的歷史，何以演變至今，國際社會仍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呢？這其中的道理，大有研究的價值。

二　國際合作之障礙

國際合作演進遲緩的原因很多，歸納起來，有下面的幾個重要因

素：

第一，人性的缺陷：人類雖有合作的本能和要求，但在另一方面，人類也有自私的慾望，偏執的僻性，和猜忌的心理，合作是有時需要犧牲本身利益的，但是自私的慾望往往不肯讓步；合作是需要和衷共濟的，但是偏執的僻性往往不肯放棄己見；合作是需要坦白真誠的，但是猜忌的心理往往從中作梗。

第二，歷史的遺毒：歷史上有兩大勢力，阻礙國際合作的發展。這兩大勢力，一個是孤立主義，一個是帝國主義。我國從前的閉關政策，就是孤立主義的典型。十九世紀的英國，還高唱着「光榮的孤立」，現在的美國，孤立派仍未絕跡。這種孤立主義是國際合作運動的一大阻力。說到帝國主義，我們中國受害最深。簡單的說，此次大戰後，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國際合作就有受阻的一天。

第三，政治的阻力：現代的國際政治，在思想上有所謂「主權至高」的觀念，在實際上，有所謂「一致同意」的原則，都是國際合作的障礙物。至於各國內部的政治組織，德日二國的獨裁制度，固與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即民主美國的政制，也不免有妨礙國際合作的地方，例如美國批准條約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任何國際合作的方案，很容易給少數頭腦糊塗的議員所否決。這些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曾經直接間接的阻礙了國際合作的發展。

第四，經濟的矛盾：各國在經濟方面的衝突，也許是阻礙國際合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這點可從兩方面觀察，一方面是經濟的競爭主義，例如各國的關稅壁壘，進口定額，外匯統制，貨幣貶值等，都是損人利己的法寶。另一方面是經濟的自給自足主義，倘使各國真正能夠自給自足，當然便無須與他國合作。所以一切根據自給自足主義而來的辦法，如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等，都是國際合作的暗礁。

因為有上面這許多重大因素的存在，所以國際合作雖有幾千年的歷史，至今仍在很幼稚的狀態之中。這次大戰以前，國際聯盟及其附屬機關，可說是國際合作的最高造詣。但自中日開戰以後，國際聯盟便奄奄一息，名存實亡。從歷史上看來，國際合作的進展，往往是曲線型的。

三　國際合作之現狀

在現階段裏，戰前的國際合作機構已經是沒有多大作用了。但聯合國方面，為求共同勝利和永久和平起見，現有下列各種的合作：

第一，全體聯合國的合作：全體聯合國簽訂了或接受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大西洋憲章和一九四二年元旦的二十六國宣言，這是規定聯合國全體合作的基本原則的文獻。去年聯合國先後在美國舉行了國際糧食會議，和聯合國救濟善後會議。這兩個會議的決議案，都有常設的機關來執行。

第二，多數聯合國的合作：最顯著的是歷次的羅邸會議，中英美的魁北克會議，英美蘇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及中美英開羅會議，英美蘇德黑蘭會議等。其次是各種作戰機構，如太平洋作戰會議，中東供應中心，澳洲聯合國供應委員會，以及各戰區的統帥部等，都有多數聯合國參加，通力合作。此外，各佔領區，如北非，西西里，義大利南部等處的行政機構，泛美聯防制度下的各種機構，也都是多數聯合國參加的。

第三，聯合國雙方的合作：聯合國雙方的合作，現在以美國為中心。美國利用互惠商約，已與大多數中南美國家取得聯繫，她又利用租借法案，與將近四十個國家發生了雙方的合作。現在，美國與英國合組的合作機構已有七個，與加拿大合組的合作機構，也有四個之多。此外，英蘇的軍事同盟，亦很值得注意。依照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的英蘇協定，英蘇兩國不但應在戰時合作，而且將在戰後合作二十年。

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中美英蘇四國聯合宣言發表，更為聯合國在戰時及戰後的合作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四國宣言將為全體聯合國家所接受，已可預見。至於擬議中的國際合作機構，各聯合國的朝野人士

都曾發表許多意見。在最近期間，有實現的可能者，莫如去年四月美國和平組織研究會第三次報告書中所提議的幾個合作機構，即設立(一)聯合國貨幣組織，(二)聯合國經濟組織，(三)聯合國物資局，(四)聯合國開發局。這些機構目前雖僅包括各聯合國，將來不難變爲全世界的國際合作組織。

四　國際合作之前途

說到國際合作的將來，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中美英蘇四大主要聯合國對於國際合作的基本態度。

現在，先說美國：美國自華盛頓總統的臨別贈言以來，孤立主義籠罩着許多人民的心理。但是歷史告訴他們：前次的世界大戰，曾經把美國捲入了戰爭的漩渦；這次的全球大戰，也使美國「在獨裁的沙漠中無法取得民主的水草」，終至被迫參戰，所以大多數美國人民都知道「孤立主義已經死了」。美國參議院所討論的康納利案，便是美國永遠放棄孤立主義，參加戰後國際合作的徵象。這議案已經衆議院通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也已以二十二票對二票的絕大多數通過了。但是，縱使參議院順利的通過了康納利案，我們認爲仍不能十足保證美國的參加國際合作，因爲(一)美國的國會，今天可使孤立主義死，明天亦可以使孤立主義復活。著名的美國中立法案，是由美國國會所制定，也是由美國國會所廢棄的。(二)美國的孤立派迄未絕跡，任何國際合作的方案，均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批准，這些孤立派參議員很容易阻礙美國參加國際合作的行動。(三)共和黨是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現在共和黨內部紛雜，羣龍無首，對於許多重大問題，都無決策，若下屆的美國總統爲共和黨人所得，將來的政策如何，殊難逆料。不過，現在孤立主義已經不能算是阻礙美國參加國際合作的重大勢力，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新興的勢力，這個新勢力可以叫做「新帝國主義」。現在有些美國人相信，美國的力量，已經到了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地步，要造成一個美國人所希望的新世界，只要運用美國的單獨力量便行。所以現在美國輿論上的爭辯，不是前次世界大戰後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爭，而是新興帝國主義與國際合作主義之爭。美國對於將來國際合作的態度，將取決於這兩種主義鬪爭的結果。

其次，說到英國：英國是受議會政治的薰陶最久的國家，各黨派對於同一事件，很少一致的見解。大體而言，勞工黨是趨向國際合作主義的，保守黨裏的人則多少還是憧憬着維多利亞時代的光榮。在這次大戰中，英國所表現的合作精神固然很好，但是戰前國際合作的失敗，英國又何嘗不要負責？不過，這次的大戰給英國的教訓太大了，一般有遠見的英國人都知道孤立主義是不可能，帝國主義是無用了，所以英國將來積極參加國際合作，當不致成爲問題。

再次，說到蘇聯：蘇聯的共產主義本有世界性和排他性，很不宜於國際合作，但自史太林主張共產主義國家化後，無論在理論上，或在事實上，蘇聯已經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合作。當歐洲風雲緊急之時，蘇聯毅然加入國際聯盟，這便是蘇聯趨向國際合作的一大步驟。去年第三國際宣告解散，這又是蘇聯放棄偏執己見，準備參加國際合作的另一重大步驟。不過，共產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國家始終不免猜忌之心，將來除非美國積極參加國際合作，蘇聯對於歐洲問題必定不肯讓步，而採「獨善其身」的政策，造成一個經濟自給自足的單位。

最後，說到我們中國：中國從前雖曾採取閉關政策，但是舊日的孤立主義，早已給帝國主義者打破，現在的中國人民，再沒有相信孤立主義者了。孔子的「大同主義」，也許受了他的「尊王攘夷」政策的限制，但是　國父的大同理想，既沒有人種的歧視，也沒有地域的限制，三民主義的最後目標，就在「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民國元年，　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宣言「願與世界友邦攜手合作，以增進人類幸福於無窮」。我們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也屢次以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和平合作的決心昭告中外，中國不願恢復從前的閉關主義，也不願承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衣鉢，而將以平等的精神向國際合作的大道邁進。現在的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最忠實最熱誠的一個國際

合作主義者。

中美英蘇四個主要聯合國家對於國際合作的基本態度，大體看來，都很可樂觀。而莫斯科會議更為未來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不過，天下事不宜過分樂觀，也不宜過分悲觀。國際合作的前途如何，仍要看下面幾個問題能否圓滿解決：

（一）人種的偏見，自私的心理，是否可以完全化除？倘若不能化除，又是否可以設法控制？

（二）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是否可以完全消滅？消滅之後，又是否可以設法防止其復活？

（三）各國的政治制度能否滿足國際合作的要求？國際組織有無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四）各國的經濟矛盾怎樣去解決？各國的利害衝突怎樣去調和？

（五）英美的民主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的三民主義，用甚麼方法可以取得協調？

倘使人類能從這次的全球大戰裏，找出適當的方法來圓滿解決上面幾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則國際合作的前途，必定光明遠大。我們大家都得要用一點腦筋，去想想辦法，來推進這個為全人類謀福利的國際合作運動。

當前世界政治的主流

戴文傑

E．亨利曾在他的『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對德國問題作這樣的預言：『問題只是：這兩個前途那個首先到來，戰爭或者革命？無論如何，第一個最後要轉變成第二個。』如果把它轉引到這幾年的世界問題上來，將也還是一個正確的先見。

現在，我們所進行着的，已不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也不是只限於保衛一國權利的戰爭。它是保衛全世界全人類的自由和民主，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威脅和奴役的戰爭。它應該正如威爾基在『天下一家』中所說，是道地的『人民的戰爭』。

通過這個進步的戰爭，世界的面目已經有了不小的改變。英國名政論家拉斯基教授，在以『新建設之性質』為題的對華播講中，解釋這次戰爭是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的確，我們現在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時期，『目前世界中最重要的事實，不是我們處在一個戰爭中，而是我們處在一個革命中』（引自朱寧．赫胥黎之『論生活於一革命中』一文，原載一九四二年九月份『哈甫斯』Harpers 雜誌）。這革命的具體內容是世界民主主義的發展和昂揚。這革命的最後目的是：『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德黑蘭三強宣言）。而法西斯主義是以反對民主與和平起家的，墨沙里尼說過：『法西斯主義是要和一切民主主義的意識作鬥爭的』；『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與實用性』。所以，澈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就是這革命的偉大行動。

當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本有兩條路線向全世界提示着，而其中威爾遜總統給我們的是戰前秩序的恢復。在國內，他主張民主主義的改革，但仍保存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獨佔生產工具的要素；在國外，他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但仍保存殖民地統治；他贊成世界和平的目標，卻將敵對的帝國主義的主權，放置在鬆弛無能的國際聯盟裏。可是，威爾遜總統並沒有引領我們走上和平的坦途。戰後分贓的條約，播下了今日戰爭的火種。『十四條』祇是歷史上一個文獻而已。

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芝加哥的建立和平委員會中，解說得頂透切。他說：『其原因完全是我們對於全世界平民的困苦情形，還不十分關切。我們還沒有認識經濟上的民主必須與政治上的民主，配合一致』（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訊芝加哥九月十一日電）。換句話說，就是發生戰爭的經濟結構沒有改革。二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經濟關係，是這次戰爭的淵源，也就是說，狹隘的民主主義絕不能建立眞正的和平。

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發展和昂揚的世界民主主義，它必須是把狹隘的民主主義擴大了範圍，普及於『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在國內，擴大爲全國人民間的民主；在國外，擴大爲各國民族間的民主。對內民主，國內方可和平；對外民主，國際才有和平。這兩者是相互影響，而前者決定後者的。

世界民主主義，在對內，它的核心精神是羅斯福總統所倡導的四大自由，『有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每一國家的人民，均應享受。『法西斯主義以及所有的惡勢力和流派，必須澈底消滅』（莫斯科會議所發表的『關於意大利的宣言』）。這就是實行『以民主原則爲基礎的』全民政治，『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民權主義演講），爲人民所運用。今後，正如華萊士所說：『領導世界，有賴於福利政治的多，有賴於權力政治的少』。這福利政治，一定是建築在絕大多數的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的視聽爲視聽，人民的利害爲利害。所以，不但那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專制，應該剷除，就是那『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孫中山先生語）的狹隘的民主，亦應改造。在對外，它的核心精神是大西洋憲章所標榜的民族平等，『尊重一切民族在所居處的本國內，有權選擇他們的政府形式，凡以武力壓迫而失卻的主權和自治權，將予恢復』；『（英美及所有盟國）不願違反有關係的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願，而作任何領土上的變更』。每一民族的成員，均應享受。這就是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達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的目的。因此，這個開明的決定，無論怎麼說，它不應限制於一個地域，威爾基說得好：『全世界民族皆須自由平等』。任何民族由別的民族去統治，這不是我們戰爭以圖保持的制度。所以，不獨法西斯主義的荒謬的『種族論』，應該根絕，就是那造成近代最血腥的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也應摒棄。倘若在戰爭進行中，或結束後，反法西斯陣線中，和所有的國家，竟仍有被剝奪或漠視其自由與平等權利的人民或民族，則這個人民戰爭便將失去其光輝的意義，而勝利的獲得也將受到阻撓，縱使倖而獲得，仍難免播下再戰的種子。

因此，必需具備保障這對內自由對外平等的世界民主主義實現的物質基礎，那就是經濟上的民主與政治上的民主配合一致。所以，華萊士在美國底特律城對民衆團體講演時謂：目前有兩條路線由我們選擇，『我們的選擇，是在大家的民主和少數人的民主之間任擇其一：要就是把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機會散佈給一切人民，要就是把我們的豐富的資源集中在自私和貪婪的人們手裏』（原載七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這偉大的選擇，它本身就是一個革命行動。這行動不但影響戰爭的結局，而且更決定戰後的世界。

我們必需慎密的選擇，以創造保證永不發生戰爭的世界，決不能又把血的澡盆遺留給我們的後裔。『我們企求的和平，並不是舊暴君逝去，新暴君成立之間的曇花一現的和平』。華萊士這樣地警告我們：『我是信任我們民主的資本主義的制度的，但我所信任的資本主義必須是富足而大家有職業的資本主義，假如我們回復到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所產生的那種使人貧困的資本主義，那麼我們一定可以預料，戰場上回來的兵士們和停職的軍火工人們會說些什麼，是很難說的了』（同前引）。因此，『當我們對奴役人類精神和靈魂的鬥爭，以勝利者的資格放下武器的時候，就要馬上拿起武器，進行對抗飢饉失業和壟斷世界市場的鬥爭』。可是，這並不是說，這兩種鬥爭是無關聯的，它們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忽視的；然決不是平行的並行，而是

有先後的相互主從的關係。有了『富足而大家有職業』，使人人『可免於匱乏』的經濟上的民主，國內和平方可實現；『而國際和平必『有賴於經濟國際主義之實施』（威爾基語）。這樣，世界民主主義的原則才不致落空。人類的禍患，才可以免除。威爾基去年訪問盟邦歸國後，在對人民的廣播文中，就道破了這個道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民，必須獲得政治與經濟的自由，這樣才有和平的存在』（載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先鋒論壇報）。

這世界民主主義的基本精神，是和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相脗合的。因為『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就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富人打不平的』（總理全集三、二四九頁）。這就是說：民族主義是對外的民主主義，民權主義是對內的民主主義，民生主義是民主主義的核心。我們面對着當前的人民戰爭中發展和昂揚起來的世界民主主義，更深感 孫中山先生的天才的卓見是不滅的眞理。

從大西洋憲章，二十六國宣言，到三國會議的決定，開羅會議的決定和德黑蘭會議的宣言，這世界民主主義的精神像一根紅線一樣地貫穿在其間。它是國際團結爭取和平的基礎，也是反法西斯國家國內政治的基礎。人們往往忽視後者，我們應該看到二者之間的聯繫，只有切實推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才能眞正促進國際間的和平合作。因爲，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從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生長出來的。人民戰爭勝利的目的是非『談判的和平』，是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即以眞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這次戰爭，這戰爭才能給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以幸福。惟其如此，實行普遍的擴大的世界民主主義，才是人民戰爭勝利的保證，才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

所以，世界民主主義必須在世界的規模上實現。只有世界的民主，才有人民戰爭的勝利，才有世界的和平。從世界民主主義的原則來說：自由的世界，不能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隸，民主絕不可分；平等的世界，不能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和平絕不可分。明天世界的和平，決定於今日世界的民主；爲了人民戰爭的勝利，爲了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建立『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德黑蘭三強宣言），具體實現民主主義的原則是所有反法西斯國家的當務之急。

威爾基說：『此次殘酷無情的戰爭，是對我們的一個教訓，整個世界不得不在勝利與淪亡，自由與法西斯主義中間選擇，並沒有所謂純粹的局部問題。』今天我們所要解決的，不是那一國家的問題，是一個世界的問題。具體實現民主主義的原則，也是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例外的。因為全世界的人民，不僅要求政治上滿意的自由，並且還要求着經濟上的進步。世界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流。『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是阻止不住的』（民權主義第一講）。

世界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流，是人民戰爭勝利的保證，是這個『偉大的社會革命』的具體內容。祇有它，才能『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德黑蘭三強宣言）。『世界祇有一個前途，便是正義與自由民主的徹底勝利』（蔣委員長於『七七』六週年紀念日告聯合國民衆書）。它必須實現，它一定要實現的。

蘇波疆界問題

史國綱

一九四四年開始時就使人感覺到興奮的軍事發展，就是一月四日，伐杜丁將軍麾下第一烏克蘭軍在基輔西北區域，攻入未淪亡以前波蘭的國界；非特使聶伯河曲的德軍，更陷於危境，並且把希特勒的歐洲堡壘，又打開了一個從東方進攻的門戶。在這種情形之下，德方軍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德軍不因維持威望而堅守其在蘇聯之佔領區。德軍雖被迫退出蘇境，亦在所不惜，蓋與掌握全線相較，尚屬次要問題。」到處捉襟肘見的希特勒，自料必難逃過今年。而蘇聯對於剷除歐洲侵略惡勢力的供獻，亦將永久彪炳於後世。

但是這個可喜的事實，卻使去年一度緊張的蘇波關係，復因疆界問題而趨於尖銳化。翌日（一月五日）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就舉行閣議，討論這椿事情，並發表聲明云：「希望蘇聯能尊重波蘭共和國及其公民之權利。波蘭政府曾訓令抗德之秘密運動繼續，並加強對德之抵抗，避免與前進之蘇軍發生衝突。」又說：「波蘭在此次戰爭過程中之行動，可證明其向未承認，且不顧承認由武力所作之解決。」意義明顯，當然是爲了日後要求恢復東方原有疆界而言的。這引起了一月十一日塔斯社所發表的蘇聯政府正式的聲明，全文如左：

「一月五日在倫敦發表了波蘭流亡政府關於蘇波關係的聲明，其中含有若干錯誤的武斷，包括關於蘇波邊界的錯誤的武斷之辭。

「大家都知道，蘇聯憲法遵照一九三九年經由普遍的民主基礎上進行的全民投票所表示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民衆的意志，已確定了蘇波邊界。烏克蘭人形成人口絕大多數的西烏克蘭的領土，就併入蘇維埃烏克蘭，而白俄羅斯人形成絕大多數的西白俄羅斯的領土，就併入蘇維埃白俄羅斯了。曾經強使蘇聯接受的，跟居住在西烏克蘭的烏克蘭人和居住在西白俄羅斯的白俄羅斯人有關的，一九二一年的里加條約所作的不義行爲，因而矯正了。

「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併入蘇聯，不僅絕不曾侵犯波蘭的權益，而且反爲波蘭人民和鄰人——烏克蘭人民、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的堅定永久的友誼，創造了可靠的基礎。

「蘇聯政府曾一再聲明：牠贊成再建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贊成蘇波交好。蘇聯政府又聲明說：牠力求在堅定的善鄰的邦交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而且如果波蘭人民這樣願望的話，就在爲反對作爲蘇波主要公敵的德寇而締結的互助同盟的基礎上，建立蘇波的友誼。波蘭如加入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對於這種任務的達成就會有所貢獻。

「蘇軍在蘇德戰場上博得的成就，一天天加速蘇聯被佔領區從德寇羈絆下獲得的解放。紅軍自我犧牲的奮鬭，以及我們盟軍正在展開的戰鬭行動，使希特勒作戰機構的徹底敗北越來越近，而使波蘭和其他國家就要從德國佔領軍羈絆下獲得解放了。

「『旅蘇波蘭愛國者聯盟』以及由牠編組的在戰場上和紅軍並肩攜手對德軍作戰的波軍師團，已經在這種解放鬭爭中貫徹他們光榮的任務。

「目前，正爲波蘭作第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再生展開着可能性。然而波蘭不得由侵佔烏克蘭的和白俄羅斯的國土來再生，而應把自古以來就屬於波蘭卻被德寇從她的手中掠奪了去的國土歸還波蘭，而再生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在波蘭人民跟烏克蘭人民、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友誼。

「波蘭的東疆是能夠由和蘇聯的協議來確定的。蘇聯政府並不把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視爲不可變更。這些疆界能夠以對波有利的方式加以修改，以便波蘭形成大多數人口的區域，轉讓給波蘭去。在這種場合，蘇波疆界再能大致依照所謂寇松界線。那是一九一九年由同盟強國的最高委員會通過的，那種界線就曾規定把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併入蘇聯。

「波蘭的西疆必須擴張，把德寇先前掠奪了去的古波蘭國土併入波蘭。沒有那片國土，就不可能把全體波蘭人民團結在它的國家中，那個國家將要獲得通往波羅的海去的必要的出路。

「波蘭人民熱望完全重新團結在強大而獨立的國家中，這種正當的抱負應該予以承認和支持。

「跟人民絕緣的波蘭流亡政府，已證明了沒有能力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牠並且證明了沒有能力在波蘭本土組織對德寇積極戰爭。不但這樣，牠更由於牠的錯誤政策，數見不鮮地幹出使德國佔領軍得利的勾當來。

「然而，波蘇的利益是在於我們兩國間建立堅定的友好的關係，在於波蘇兩國人民在對共同的外來敵人的鬬爭中團結起來，那是所有一切盟邦的共同事業所要求的。」

這個聲明不但表白了蘇聯的態度，並且也解釋邊界更改的經過情形。但是有幾點是需要補充的。(一)波蘭的復國雖始於一九一九年，不過她的最後疆界，尤其是東部的，數年之後方才定奪。那時波蘇之間，發生戰爭。一九二〇年秋季，紅軍長趨直入，兵臨華沙城下，後來經過維斯杜拉之役，波蘭轉敗爲勝。結果簽訂里加條約，改變巴黎和會中最高會議所決定的「寇松界線」，向東擴展，包括一部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而成立波蘭流亡政府認爲應有的原來疆界。(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派大批陸空軍，進攻波蘭，勢如破竹。九月十七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否認波蘭的存在，而爲了保護該境以內同血統的人民——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亦派大軍西進，未遇劇烈抵抗。德蘇兩國在波蘭中部會師後，於九月二十八日簽訂莫斯科協定，平分波蘭國土。於是蘇聯把所得到的土地，如聲明中所云，復併入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因此顯然不承認一九二一年所定的疆界。這兩個疆界之間，面積約七萬五千方哩，居民窮困，大都從事耕種；除加里西亞所產的石油和拔力斯托克的紡織工業之外，並無其他經濟上重要的企業。波蘇因疆界問題而爭的土地，就是這一片。

波蘭本來是一個大國，疆土北自波羅的海起，南迄黑海止。但是經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的三次瓜分，以及一世紀多這樣長時期被統治的情形之下，她歷史上的疆界和目前民族的疆界，自然是不會相符的了。所以對於一九一九年波蘭的復國，雖然贊同，但是她版圖的劃定，顯然欠妥。例如波蘭走廊的存在，不但不合理，並且也決不會持久，更是釀成國際糾紛的因素。而在波蘭的總人口中，少數民族卻超過三分之一。尤其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蘇聯所分割的區域裏，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約有八百萬，猶太人一百三十萬，波蘭人祇有三百五十萬；可見那兒許多地方，實際上波蘭人必佔少數。根據威爾遜總統所倡議的民族自決的原則，這也是大西洋憲章所襲用的，波蘭的疆土似乎有重新調整的必要。再進一步說，假使波蘭治理少數民族，成效顯著，那末波蘭在這次戰後繼續要求管轄，可得主持正義者的同情。雖然波蘭在條約上有保護少數民族的義務，但是波蘭是否厲行這種的職責，又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就是對於自己同種的人民，波蘭政府恐怕也沒有盡應有的努力。從以上各方面看來，波蘭實難堅持其立場。

還有，波蘭立國以後所採取的政策，不免基於錯誤的觀念上。依常理而論，她祇有實施睦鄰政策，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然而被人利用，一方面自認爲阻擋共產主義的屏障，另一方面擔任包圍德國的職務。因之對於東西二鄰的蘇德，始終沒有樹立眞正友善的邦交。到了希特勒得勢之後，更被其狂言所眩惑，甚至於有贊助希特勒東進政策

的趨向。一九三五年，本流傳極廣的書裏（名爲「波蘭的政治目標」），係斯都尼基所著），就很坦白地說：「日本擊敗蘇聯，波蘭卻有很大的裨益。假使波德爲了（分割蘇聯西部）的共同觀念而成爲同盟，那末波蘭便有參加日蘇戰爭的可能。法國在事實上已成爲一個三等國，不必考慮到她的態度。波蘭和德國就能夠建立中歐的強大集團。」而政府方面的發言，也不時流露這種的意志。到了希特勒的野心已經十分明顯，英法派了參謀團到莫斯科商談軍事合作的時候，當蘇聯提出借道波蘭以攻德的建議，波蘭仍舊不立卽予以同意。卽以德軍佔領下的情形而論，波蘭祕密運動協助德方，反有阻礙蘇方的嫌疑；否則波蘭流亡政府的聲明，不必特別提出已訓令「避免與前進之蘇軍發生衝突」，同時華盛頓和倫敦方面，也不會發生波蘭祕密運動和前進蘇軍難於合作的顧慮。這些又可見蘇聯聲明中不願以波蘭流亡政府爲交涉的對象，頗有理由。

至於蘇聯在聲明中所表示的態度，相當誠懇。（一）蘇聯希望波蘭人民重新團結而成立一個強大和獨立的國家，能夠和蘇聯合作，對付共同的敵人。（二）經過全民投票而併入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的土地，固然難於更改；但是蘇聯政府並不把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視爲不可變動。這部份疆界能夠以對波有利的方法，加以修正，以便波蘭人形成大多數的區域，轉讓與波蘭。這種未來的疆界，大致可依照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最高會議所決定的「寇松界線」。（三）波蘭應把自古以來就屬於自己，卻被德國所奪去的土地（指東普魯士），設法歸還，而圖再生。這樣，波蘭仍舊是一個大國，有通波羅的海的出路，還避免走廊的存在。（四）蘇聯歡迎波蘭參加去年年底簽訂的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根本調整波蘇關係，建立波蘇之間可靠的友誼。這些一方面宣佈交涉之門，並未關閉，另一方面指出波蘭能夠獲得最完滿結果的路徑。

這樣說來，波蘭流亡政府爲波蘭的前途計，似應捐棄前嫌，改變態度，最低限度先和蘇聯樹立友善的關係，有願意互助互惠的精神，以便來日在疆土方面得到最完滿的解決。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該參加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在該約附件中的議定書裏，蘇捷雙方都明白表示，歡迎波蘭參加，因此這可說是毫無問題的。從捷克斯拉夫總統貝尼斯由莫斯科抵達開羅時所發表的談話中，我們知道，在戰後蘇捷將有共同的疆界。如是波蘭對於蘇捷，更有維持友好邦交的必要。波蘭使蘇捷條約成爲三方面的協定，實在是一舉兩得。而且去年斷絕的蘇波邦交，可以立刻恢復，免得聯合國之間表面上也有不睦的現象。其次，波蘭流亡政府當發表聲明，願意把疆土問題，留待戰後作最合理的解決。這是最光明正大的態度，可得各方面的贊許和同情，而事實上決不會對波蘭有任何害處的。並且聯合國之間或有的嫌隙，不至於愈趨嚴重，而可逐漸冰釋。否則解放了一個區域，就發生疆土的爭執，對於勝利及和平，將有莫大的阻力。理由明顯，毋須贅述。

當紅軍越過波蘭舊界的時候，就有波蘭總統擬前往華盛頓，要求美方表示對於波蘭疆界態度的傳說。而在蘇聯的聲明發表之後，又有波蘭已請美英調處的消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根據下列的原因，我們認爲美英對於波蘭的申請，除表示願意接受和考慮，並設法調解波蘭關係外，不見得會有進一步的舉動。

第一、現在的時期中，在戰事方面，爭取勝利，最爲重要。凡是足以遲緩勝利的降臨，或削弱擊潰軸心國的力量的任何事件，都不應該發生。聯合國之間疆土的爭執，顯然是其中之一。那末英美對於波蘭，除乘機促進蘇波的關係之外，怎樣會有支持波蘭立場的主張。

第二、在和平方面，奠定四主要聯合國的密切合作，尤爲必要。由於莫斯科、開羅、和德黑蘭三個會的成就，已建立可靠的基礎；而地中海委員會和歐洲顧問委員會的成立，更使美、英、蘇之間對於歐洲問題的處理，有更進一步的聯繫。這種情形是不容易創立的。美、英該不會有任何舉動，使已實現的復歸於消逝。

第三、戰後世界版圖的劃分，是整個的問題，應該通盤調整。使

略國佔領區未完全解放之前，似不宜詳細決定，徒然引起無謂的糾紛，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造成的錯誤。作者認為「怎樣劃定戰後的世界地圖」（見本刊第三十九卷第二號）一文中的建議，乃是最合理最徹底的解決辦法。波蘭在這時單獨提出要求，顯然難於獲得嚴重的注意。

第四、表面看來，這問題和波蘭的主權有關，波蘭流亡政府不該輕鬆放過。但是依照前文的檢討，該區域應否仍屬波蘭，卻是疑問。即使感情用事者，知道了這種實情，也不見得會過於偏袒波蘭。這樣，波蘭流亡政府對於美、英，該不至於有過奢的希望。而以為波蘭流亡政府的立場不適宜，也並不是畏強凌弱，認強權為公理。所以權衡輕重，根據事實，必如美、英觀察者的猜測，美、英政府對於這事不會有直接的表示。何況蘇聯與美、英之間，向來有一種不易趨於接近的觀點：就是在蘇聯目光中，美、英常偏重傳統的而不是真正代表多數人民的政府，把這種政府作為交涉的對象。這是由於美、英素來重視法統，蘇聯注重事際，各有各理，是非難斷。但是最近情形轉佳，這種分歧的意見已漸趨消滅。努力於爭取勝利及創立和平的美、英，當不願為了這事，可能擴大舊有的裂痕。

總之，美國國務卿赫爾自莫斯科返國後說：『一切有關疆界與領土的問題，必須待諸戰後解決，』目前決不能因為擴土問題，就停止作戰。這是絕對不錯的。至於聯合國共有的態度，始終是對於打擊軸心國家的，都認為友；其作戰最力的，則視為良好。深願波蘭流亡政府予以注意。

國際經濟合作中之貨幣與金融

孫九錄

一　戰前的悲劇

前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各國的貨幣都非常紊亂，從戰時所遺留之種種經濟上的限制和各國風起雲湧的保護貿易政策束縛了國際貿易，許多國家的生產解體，許多國家因無力償付國際債務致演成財政上的破產，於是整個世界陷入於經濟上的厄運。如是者十年，終於造成不景氣時代的降臨，且表現着有史以來從未那樣的劇烈和長久。接着，全世界又轉入於劇烈的經濟戰爭。許多國家因欲保持其通貨的穩定與財政上的償付能力起見，對於進口貨品施以嚴格且廣泛的限制，而對於出口物品則採取各種不合理的方法，如關稅壁壘，貶低幣值，限額，禁運，統制匯兌，複數幣制津貼制等種種經濟戰爭的武器都被採用。於是對方亦採取同樣方法為報復手段。此種經濟戰之結果，雖使全世界均蒙受重大損害，而受害最烈者還是那使用經濟戰中最有力武器且奪取最大限度的國家。此種國家不獨基於經濟上之理由，且用作為政治上的輔助，而進行大規模的擴軍計劃，提出為大砲犧牲牛油的口號，以至日益增長其經濟脫節，更因國際關係日益惡化而漸次加烈。演變到極點，終於釀成此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在戰爭環境之下，各種經濟戰略勢必大為加強，甚至不斷產生新的經濟戰武器，此乃不能避免之現象，因經濟戰爭現代戰爭中整個軍事力量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但戰爭結束之後，倘不能採取決定性的行動，消滅各種造成經濟戰的因素，建立經濟和平，則全世界人類所將遭遇之經濟痛苦，必較諸此次戰後的情況尤為悲慘，可以斷言。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總統羅斯福與英首相邱吉爾簽訂之大西洋憲章第五條，明白提出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

以提高勞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個聯合國共同宣言對於此點亦加以重申。可見各國政治家都覺悟到戰後各國如果無全面經濟合作為基礎，則在任何情況之下，政治和平仍不能免除危險。

二　貨幣與黃金

談到全面的國際間經濟合作，千頭萬緒，而貨幣則為一切經濟行為的工具，故穩定戰後世界通貨，遂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全面的先決問題。所以美國業經於四月間召集聯合國舉行一非正式貨幣會議，希望在戰事結束之前即能成立一戰後貨幣匯兌與平準協定。

在以往自由市場的貿易體系之下，許多國家的國際收支不能平衡，匯率波動頻甚，凡屬於逆勢的國家勢必輸出黃金並通貨貶值，結果金本位制度脫離，市場波動無法制限，此乃此次戰前整個世界所遭遇之事實。吾人如欲於戰後決心解除匯兌波動之痛苦，必須廢止舊的金本位制，建立一新而單純的國際通貨單位，充作實施穩定一切通貨之工具。欲建立此新制度，當然必須各國訂立一政治協定，確定此種國際通貨在實際價值上的價值，以及其在匯兌市場上支持此協定價值的經濟工具地位。

吾人從國際通貨問題必聯想及黃金，因世界許多國家之通貨通常均用黃金定其交換價值。回憶金本位制度於前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崩潰之後，金屬主幣絕迹於各國，市場上實際流通者均為紙幣，票面上雖因人民心理關係印有憑票兌付字樣，而實際上已絕無兌現者，均採用通貨管理制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間金本位制之部分的回復，亦祇以管理因素，較諸以前之金本位實已變質，不過基於償付貨物的詮解而已。一九三一年各國再度放棄金本位制，於是黃金準備之貨幣觀念不再適用，在國際經濟橫的廣大目的上，不過以黃金充作國際間清償比價之用。現在美國握有全世界黃金儲藏量的五分之四，如此繼續下去，黃金的功能將無法發揮，不獨從此不能再見黃金回其貨幣舞台，且將無法可使國際政治趨於穩定。即使美國願將現存黃金作為禮物重行分配與以先所自來的國家，然而戰前的經濟情勢如仍繼續存在，恐不久黃金必又回到坎特基城下，決非一種好辦法。何況各國未必願依賴美國之此種寬宏大度，而感覺到需要一種比金本位更好的制度。此次大戰爆發之初，各國於不得不用黃金換取美國的援助品之際，黃金還有地位；自美國租借法案實施後，此種情勢已經改變；至美國參戰以後，簡直不復存在矣。雖然，十年以來世界各國會將每年黃金產量盡量提高，在以往之經濟與貨幣制度中，新出產之黃金雖不和諧，而尚有其動力性之特點；但全世界黃金之產量不過財富儲藏額的百分之五，所以其動力性頗有變為奢侈與強豪的趨勢，在某種場合或有限制出產的必要。何況現存黃金之不合理分配存在一日，金本位制度即無回復希望，此種不合理分配狀態繼續存在一日，黃金之功能亦無從發揮。故在新的經濟制度建立以後，必需有新的貨幣制度相配合，屆時黃金恐未必再能維持其以前地位，即充有力融通工具，信用與經濟政策主要目標的媒介之地位。戰爭結束後，國際貨幣制度既有建立之必要，黃金勢必自然消失其領導與操縱世界金融之主要因素。惟黃金仍保有其本身形體上的優越及心理上的重大價值，決非世界從此棄黃金不用，國際通貨單位的價值可以定量黃金規定其比值，但並不說是用硬幣或紙幣發行，而在各國間流通，可以持之在店鋪中購買物品。各國仍保持其本國之通貨，國際通貨單位不過在國際聯合平準基金或清算聯合中用作計算匯率和清償債務的單位媒介工具而已。

三　匯率的穩定

吾人於複雜的經濟體系中最感煩惱之事，當為國際匯兌。從個人在世界各地旅行之經驗，莫不理解到匯率變動所加予吾人之痛苦，甚至於可能使金錢因匯兌的差率而化為烏有。商人與銀行家則大半投機於貨幣單位本身之相對價值，而對於正當的商業反覺無關重要。當

個商業行爲集中於貨幣匯兌的投機時，國際貿易卽陷於困難，此尙爲正當之後果。倘發生經濟紛擾與財政危機之際，則匯兌波動之壓力足以誘導一切不幸與弊竇，而國際投機家則爲其本身利益操縱市場，使資金大量的不正當流動，而匯兌的差額勢必愈大而愈不能平衡。

某一國家爲增加輸出減少輸入起見，必合法的實行通貨貶値，其他國家爲適應此種通貨貶値的競爭，遂推翻一切通貨的穩定，終而無一國能得利，全世界盡受其害，何況匯率之故意變動會被利用充作一國改善其在國際經濟上地位的競爭手段。此種手段當然違反國際間自然利益與相互利益之原則，阻塞資金之有益流動與國際貿易。充其量在一兩個國家之間締結雙方通貨休戰協定，能穩定十二國家間之匯率，但於整個世界之通貨穩定仍無濟於事。

吾人倘能理解匯率不穩定對於國際經濟政治之影響，則在戰後利用單純的國際通貨單位以穩定各國通貨，藉以消除匯兌波動，乃一顯然合理之舉措。屆時，不論美元英鎊盧布法幣以及其他各國的通貨均可用此國際通貨單位共同協定一比値，於是各國之通貨亦將彼此等比，而後國際匯兌率遂不復再有發生重大波動之慮。

國際匯率一經協定之後，卽各國將其本國通貨價値相等於若干國際通貨單位以後，除非某一國家發生不能預料之變化而有申請調整匯率之必要，再與各國協商同意，無論何國均不能任意變更其匯兌率。因此參與此國際貨幣協定之各國必須對於所有其他各國的匯兌予以合理的制限或統制，除非某一國家有特殊原因，必須遏止資金外流或其他重要目的時，概不得通融。美國財長摩根索之建議，匯率一經協定之後，僅於因糾正重大不平衡狀態必需變更時，並獲得會員國五分之四票數通過後，方可變更。此項規定似欠缺彈性，不如英國凱恩斯之計劃較爲適合變動時期之需要。按凱恩斯之計劃，會員國兩年以上之平均借差卽透支額超過其限額的四分之一時，該國卽可自動的降低其匯率的百分之五。此一規定雖較美國建議有伸縮性，在工業國家已足應付，但在農業國家尙嫌不足，因當逆差連續兩年超過限額四分之一時，百分之五的匯率差數在經驗上決不能產生有效的調整力量，故有增至百分之十的必要。

四　國際匯率的經濟支持

國際匯率經各國運用政治力量協定以後，仍須在經濟方面予以支持。美國之建議利用平準基金，其辦法與現今穩定美元金鎊及中美平準基金的運用相類似；而英國的計劃則完全基於現今各國通行之一般單行的銀行原理。

摩根索建議每一會員國必須提供若干基金，其應認基金之數額依其黃金與外匯之持有量及國際貿易與國民所得之情況擬定之，同時卽依照此擬額規定處理各國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的辦法，於是基金管理當局可以買賣黃金，各國的通貨，及政府證券，並從事借貸，進而直接支持國際匯率。加以此額制度可能用以限制支持任何特定的通貨，且可使該國家隨時儘可能改正其經濟上情況，以穩定其匯兌價格。

凱恩斯計劃雖基於一般通行單純的銀行原理，但並不需用現金付賬，只須會員國先在清算機構中開立戶頭，由債務國開具支票與債權國劃賬。債權國除非本身於匯兌上有必需時，不將此項劃賬所得存款提走，經過如此來源的累積，國際清算機構可將此項存款貸與債務國；換言之，卽債務國可以在國際清算機構中透支。至於每一逆差國家透支額之多寡，乃根據其國際貿易而決定其比額，此後債務國可利用此項比額多寡要求較多之信用透支，藉以改進其本身之經濟狀況。此種制度既代替立卽須用現金償付，而將債權國之剩餘借給債務國利用，當然有利於國際貿易，而足以延緩逆差國家之貨幣貶値，卽爲支持匯率。

凱恩斯計劃對於信用限額在最初過渡時雖係參照每一國家假定戰前三年之貿易平均總數而定，但因任何理由認爲此種辦法欠妥時，得用一特別估額代之，嗣後則每一國家可以依其前三年實在貿易額的平均總數逐年予以修正。此種辦法對於缺乏可靠統計及環境變遷頻繁之

國家似較摩根索建議爲便利，因摩根索建議確定會員國間貨幣買賣的比率應以穩定匯兌關係爲基本原則，一經協定之後卽成定案，非經會員國五分之四投票通過不能變更。

吾人如採用美國之建議，則有下列幾點原則上之意見：

(1)會員國爲應付國際上收支逆差向基金會購買外匯之限額，不僅依各會員國之基金分攤額之多寡而定，應再參酌各國之土地面積，人口數量，資源多寡，及戰後建設需要等因素決定之。

(2)戰後世界經濟情況決非目前所能估計無遺，限額變更之限制如過嚴，恐缺乏伸縮適應性能，似可規定最初三年爲一試驗時期，在此期間隨時可以更正，以後則根據以往三年間各種情況逐年修正。

(3)匯率協定以後，在基金會成立之最初三年內，國際貿易處於逆勢之國家得憑其借差超額之多寡在百分之十的限度內自由升降其匯率。

(4)基金會爲穩定各會員國之幣值，及平衡各會員國之收支差額起見，得買賣各國通貨，但其政府證劵須經該國政府同意後方能出售。

(5)爲防止片面的貶價行動起見，會員國不得以其高於其貨幣計算之協定價値購買黃金。

(6)會員國得用黃金向基金會購買國際通貨以支付其在基金會往來賬上逆勢收支差額；但不得用其在基金會之往來賬上因順勢收支差額所獲得之任何餘款購回黃金，如是可集中黃金於基金會，以減少黃金在國際市場上操縱金融的功能。

(7)國際貿易處於逆勢的國家應許其管制其本國人民之外匯，採用關稅政策及其他限制方法以恢復其國際收支平衡。

(8)國際貿易處於順勢的國家，其貸方差額逾某種限度時，在國際間應擔負限制出口，將順差折合國際通貨保存於基金會，提高匯率，減低關稅，及舉辦國際放款等義務。

五　管理機構之組織

各國既感於戰後需要建立一國際通貨單位，穩定國際間匯率，建立一種更爲完善之國際聯合清算制度，甚至於需要一防止國際貿易過分不平衡的方法與計劃，自應組織一國際管理機構以處理此等事務。組織此國際機構之原則應儘量民主化，避免政治性，使其成爲一純粹屬於技術之機構。

此國際機構應設一董事會，由聯合國家之政府依照商定方式各派董事一人及候補董事一人組織之，但其本國政府有隨時撤回或改派之權。董事會設主席一人，由董事互選之；董事任期三年，連派得連任。董事會就董事中選總經理一人，充任此國際機構之行政業務首長。董事會又就董事中推選若干常務董事，經常駐在此國際機構之所在地，執行董事會所賦予之職權。

會員國在董事會之投票權幷非與他的基金分攤額或信用限額成精確比例，除每一國家保有一基本投票權外，更須依其基金分攤額或信用限額的多寡，國家領士面積的大小，人口數量與資源潛在力的厚薄等因素遞增之。任何一個國家之投票權不得超過全體的百分之二十。

董事會之一切決議須經投票權五分之三以上權數之表決始得成立，決議後會員國均有遵守幷履行之義務。會員國如對董事會之決議不履行其義務時，董事會應宣告暫行停止其會員資格，在此期間，該爽約國家不得享受會員權利，但仍應擔負與其他會員國同樣之義務。

董事會應每年舉行年會一次，幷作成一年間工作報告提出於年會，遇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如有投票權總數五分之一以上的會員國家請求，董事會主席應召集臨時會議，討論該會員國之提議事項。

此國際機構之辦事處可分設在美國，歐洲，及遠東之主要經濟都市。董事會則在上述三處輪流舉行會議。

此國際機構旣爲聯合國家所共同組織，其會員國資格可視爲聯合

國家在戰後之一種權益，且其目的爲促成國際經濟之全面合作，以免戰後世界再遭遇經濟痛苦的不幸，故一經成立，會員國均不得退出。歷史上許多國際組織之破壞，每先由會員國用退出方法爲不合作之起點，進而釀成嚴重的不幸。蓋國際間的一切糾紛與意見不同，苟非有意破壞和平，欲造成禍亂，決無不可開誠布公用協商的方式予以解決也。

此國際機構既以全世界之經濟合作與繁榮爲目的，聯合國家不過爲發起國或創始國，其他非聯合國家當然可以參加。至於戰時敵國，俟其改建成一足以負擔會員國義務之國內組織，而願遵守此種國際經濟合作之原則時，亦應許其加入。爲便利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之貿易計，此國際機構可准許非會員國政府之中央銀行開立貸方清算賬戶，但無透支信用之權利，當然更不能有其他一切發言權。

六　長期信用與投資

此次大戰之破壞程度與範圍，較諸上次大戰爲廣大且劇烈，因此戰爭結束後全世界各地期望於復興建設程序自有迫切需要，於是供應資金遂又成爲國際財政經濟重要問題之一。

一九一八年之大戰結束後，少數資力雄厚國家曾將巨額資金用貸款或投資方式輸往各國。此種資金之移動亦曾造成貸借雙方人爲的經濟繁榮，且使借入國家能保持其不穩固之償債能力；貸出國家之輸出額雖亦曾因此保持相當高的水準，但對於收入則又造成許多障礙。事實上大部份資金之移動皆屬短期貸款，隨時可以提出償付要求，不過供債務國週轉的償付，於是債務國之債額遂不斷增加，以致已經不穩的局勢再加上一不穩因素。大量國際貸款皆浪費在此種不生產部門，極少貸款則成爲人爲的與暫時需要的刺激物，在此刺激狀態下之世界生產與貿易雖曾增進一時，但速率不足，且又向着錯誤之方向發展，根本未注意到資金移動所引起之糾紛，其貸出程序與經濟政策完全不相聯繫。當時發生如此之情況，貸出國家惟有繼續不斷的貸出才能掩飾其商業政策及索債政策之矛盾及其固有之不健全性質，以延緩必將來臨之清算日期，借入國家則無不覺其自身爲一負債額比收入額更增加得快，惟有被迫逐漸用其收入之大部份充償債之用，或繼續增加新債以保持人爲的繁榮及不穩固的償債能力。此類不健全的信用與投資政策既造成貿易限制與貨幣不穩之後果，最後到借貸之來源涸竭，同時償債要求更形迫切之時，債務國祇有破產之路，且牽引不健全之債權國同墜深坑，此乃此次戰前世界經濟不景氣主要原因之一。

吾人既鑒於上次戰後國際資金之流動完全缺乏建設性，而此次戰後聯合國政府傾向於所謂社會目標之意識已較前爲濃厚，將來不能不履行其建立世界繁榮及提高人類幸福的諾言，因此對於世界復興建設的國際長期信用與投資應有一週密完善之設計與機構。美國財政部所擬之聯合國建設銀行計劃正適應此種需求。今姑將組織此國際銀行之技術方面細目於不論，而在原則上主張應爲一非政治性，完全爲協助各國在戰後建設工業發展生產資源之國際銀行。

此國際銀行之信用與投資不應含有排斥私人投資的政治意味，正所以補充戰後私人投資之不足。在戰事一經結束之後，必有若干國家需要資金異常迫切，均可在合理條件下從私人投資機關獲得供應。但全世界許多區域的迫切需要，其數甚決非任何一富有國家或一私人資本機關所能負擔，國際銀行自可在同樣條件之充分保證銀行資金安全之條件下補充其投資額。至對於聯合國家有計劃之建設及經其政府保證之一切工業生產，國際銀行則負有長期信用與投資之義務。此種長期信用投資之目的，不獨促成國際長期資本運用於工業生產資源之正當發展，以扶助提高會員國之生產力，且即所以間接促進會員國國際貿易長期平衡的發展。

此國際銀行與一般銀行然，需要設置一經濟研究部門，經常研究整個世界與各會員國之經濟情況，并審愼研究每一投資對象之眞實需要及其成效與進展，然後提出書面報告。銀行對於每一被投資事業之是否能直接或間接提高借貸國之生產率，是否能影響該國的預算及收

支之平衡，雖與一般銀行業務然，應予以經常注意與考慮，但對於審核投資對象的限制不宜過嚴，凡合於增進世界繁榮提高人類生活的條件者都應予以善意的援助。

此國際銀行與穩定世界通貨之國際機構應有經常聯繫。如關於貨幣單位、匯率計算、借貸賬目等都應採取同一步驟。此銀行在股東國家政府同意之下，得從事抵押貼現買賣外匯借貸信託等一般銀行業務，但其營業對象祇限於（1）股東國政府及其中央銀行與財政管理機關，（2）穩定世界通貨之國際機構及其他財政經濟之國際組織。

國際銀行之本身及其行員應審慎避免干預任何股東國家或被投資國家之政治。凡行員之欲在其本國從事政治活動者，應先解除其在此銀行中之職務。銀行對於申請貸款之審核不應受任何政治性質之影響，祇可憑其在經濟方面之考慮，然後予以定奪。

至於此國際銀行應如何組織，應根據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之原理。銀行之股份由聯合國政府分認，其分攤額則以各國之歲入及其國際貿易額等有關事實爲根據。國際銀行之股份不得轉讓估價或課稅。銀行之管理機構及其股權之規定將一如組織管理國際通貨機構之主張，保持純粹之經濟性與民主化。

七　結論

現今全世界經濟思想中之各國學者所發表之一般意見漸趨一致，此種意見實係時代精神之產物；吾人將一般基本意見容納於戰後實際工作之機構中，可以引起吾人必須應付之未來經濟困難逼使解決之。集全世界人類之精力，無疑的無有不可達到之目標，因世界具備着基本資源，而此等資源均有加以適當利用的可能。但此次大戰後之形勢在性質上同一九一四年戰後之形勢無甚差別，祇有更感困難及複雜。如果戰後國際貿易仍擁滿矛盾與衝突，則一切從事上述各種實際工作之國際機構，其存在將不易久遠；如果若干國家之國際收支平衡仍如戰前之同樣逆轉，則各種國際性計劃之實施亦不能久遠。

國際貿易乃勞役以外各國交換實質貨物之程序，爲自然富源未開發或財力不足之國家向富有國家換取資金與償還債務之方法。全世界之天然資源技術及財力分散在各地，每一國家均擁有別國所無之資源，每一國家不論其幅員如何廣大，仍不能充分擁有構成健全經濟基礎之一切因素，每一國家如果僅靠其本國之資源必不能以近代生活之必需品供給其人民，每一國家決不能在孤立中使其人民之生活水準能到達全世界實現經濟互助時之生活水準。各國如傾向於一國或某一集團之狹隘的自足自給主義，或基於其他理由採取阻礙國際貿易或減削其效力時，必被迫減縮或停止發展其有效率生產而盡量發展其無效力生產。實則此種行動不僅自己剝奪其本身所應享受之國際交換利益，且使其他國家不得不同樣辦理，結果必至全世界之生產減退停滯，全人類之生活大部分不能不被迫而大爲降落。國際貿易如因盡可能的遵循全人類之自然利益與相互利益之原則推動，定能奠定全世界經濟和平之基礎與促進人類福利不可或缺之因素；反之，遭受過甚之壁壘所阻礙或被迫走入人爲途徑之國際貿易，則成爲經濟戰爭之有效工具，殘酷的成爲人類福利之抑壓機。

戰後之世界雖廢除不了國家，大部份之經濟活動仍不免爲國家性者，如無適當之國家政策與措施顯然不能得經濟上之進步，但如處於經濟戰爭之狀態下亦同樣得不到進步。所以戰後主要關鍵在於每一國家之國內經濟政策須與國際經濟政策能相互聯繫，不相矛盾，甚至於每一國家於戰後必須準備接受某種程度之超國家措置。要而言之，本文所論之國際貨幣與金融之合作計劃，較之戰後各國所被要求接受之政治合作辦法與軍備減縮計劃尚爲溫和。戰後國際貨幣與金融之合作，對於未來世界的經濟繁榮與和平爭取實肇其端，故希望聯合國家能首先放棄其戰前自由使用之無紀律，無秩序，不合作，損人害己而不利於全體人類之自私與放縱政策也！

懷特戰後貨幣計劃與國際銀行計劃

曾紀桐

一

赫利懷特氏(Dr. Harry D. White)爲現時美國經濟學權威，以去年四月美財部提供戰後國際通貨計劃，懷氏爲此計劃主稿人，聲譽著稱一時。懷氏幼年攻讀於哈佛大學，追隨陶錫格教授(Prof. F. W. Taussig)專研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一九二九年以哈佛大學獎金，赴法研究法國戰前財政，國際貿易，及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回美後著有法國國際收支平衡問題(Balance of French International Account 1880–1913)(一九三三年)。「書，爲哈佛經濟叢書中的重要著作。一九二八年曾助陶教授重訂陶氏的名著美國關稅問題(Some Aspects of the Tariff Question)，懷氏短篇著論很多，散見於美國各經濟期刊，此次大戰發生以來，任美國財政部餘幣顧問，對於美國戰時財政，擘劃極多。

本年春英美兩國同時提出戰後國際通貨計劃，筆者對英方所提的凱因斯計劃，曾爲文論及(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二十期)。凱氏爲劍橋經濟學派權威，與懷氏所屬之哈佛經濟學派，可謂同出一源，皆淵宗於利卡圖(Ricardo)彌勒(J. S. Mill)等的經典學派。故凱氏所擬的英方計劃與懷氏所擬的美方計劃，相同之處至多，其不同處，或係原於英美兩國國情與經濟背景的不同。英美兩貨幣計劃的提出，皆針對着戰前國際貨幣的惡性競爭，擬於戰後國際經濟合作的場合下，求幣制的改造和建設。本篇僅就懷氏貨幣計劃與國際銀行計劃，加以論列，尤側重在檢討兩計劃的配合性。

二

自第一次大戰後，迄於這次大戰，在這二十餘年中，各國間發生了無數惡性經濟競爭，如關稅壁壘，匯兌統制，貨幣貶值，貨物傾銷，經濟集團的形成等，結果對於國際經濟都有極嚴重極深遠的影響。自一九二九年後世界經濟蕭條，各國所受的影響，尤爲慘重。第一次大戰後，美國首先恢復金本位，繼之英國於一九二五年恢復戰前英鎊本位，法國於一九二八年恢復法郎本位將幣值貶低。各國恢復金本位後數年的實際經濟情形，皆與當初所預期的趨向適得相反的結果。英國到後來乃感恢復金本位時，英鎊價值規定太高。法國則感覺新法郎的幣值規定太低。美國則以當時過量黃金情形下所施行的低利政策，非但未能促使黃金外流，反促成證券市場的暴漲，外資流入，及黃金流入。金本位的運用不靈，因此均被迫而放棄。自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後，不久美國日本法國及其他各國亦相繼放棄，金本位制乃根本發生動搖。關於這方面的演變，瑞典經濟學者卡塞爾教授(Prof. G. Cassel)所著金本位的崩潰(Downfall of the Gold Standard)一書，述之最詳。

在金本位制仍在運用的時候，各國匯價的波動，不能超過現金運送點，但自各國放棄金本位後，其幣值與黃金脫離關係，匯價的變動，乃毫無所憑。英法美三國乃發起訂立一種貨幣協定，以維持國際匯兌與貿易上的均衡，防止貶低匯價等競爭的辦法，並利用平準基金去求匯價的穩定。三國雖已不是金本位，但仍以黃金爲其貨幣的聯繫。該協定後來還有比利時荷蘭等數小國加入，而且到現在還未取

消，但機構是暫時的，氣魄不大。不過即此已足表示國際匯價問題的急須設法穩定。此次美財部所示懷特通貨計劃，大致可說是由上述三國貨幣協定脫胎而來。

三

懷特國際通貨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建議於戰後成立一國際平準基金(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以黃金為基礎，穩定國際通貨幣值，幷訂定一國際清算單位，其計劃包括六要點：(一)平準基金的目的：擬議中的平準基金，其目的在穩定各參與國通貨的對外匯兌率，減少由國際收支所引起的失衡。平準基金管理當局，將規定其買賣各參與國通貨的價格，祇有經管理當局的許可，並為應付極端情勢，各參與國才能變動匯率。匯率變動既須先經國際間的諮商，則參與國間競爭性的通貨貶值，自然可以避免。又在這個計劃各項規定之下，各國已經無單獨統制外匯之必要，任何參與國均不得採取統制匯兌的新措施。但目的在制止不應有的資本流動的統制，得經平準基金當局同意後採行。至於各種複式通貨辦法和雙方匯兌清算辦法，除經平準基金當局許可者外，均將加以禁止。平準基金當局將使戰時各種封存的資金，在一定條件之下解封。(二)基金的機構和運用：使通貨穩定能實現，平準基金須能在充分保障下，應付參與國由平時交易而發生的對外匯的合法需要。要達到這目的，參與國至少應共同分擔基金五十萬萬美元，開始時以黃金，各國貨幣，及政府證券交納一半。每國分擔的定額，按照彼等所持有的黃金與外匯，國民收入，和國際支付差額的變動等因素而定。這個基金分擔定額，也都是平準基金購買各國貨幣的定額，在通常情形之下，平準基金購買各國貨幣(即對各國通融)不得超過各該國定額百分之二百。(三)基金管理當局的權限：基金當局有權買賣和持有黃金匯票，有權買賣各參與國的貨幣，並經參與國的同意後，買賣彼等證券。基金管理當局經有關國家的允許，亦得向彼等借用彼等之通貨。此外經有關國家的請求，亦得將基金所持有該國貨幣的一部份貸與該國。(四)新國際單位的產生：這計劃建議創立一國際黃金貨幣單位，命名為「佑尼達」(Unita，含純金一三九又三分之一英釐，等於美金十元。這種國際單位是平準基金帳目的計算單位，但並不鑄造這種單位的金幣，也不發行這種單位的鈔票。各參與國得將黃金存於平準基金以換取這種單位的信用，同時這種信用亦可以兌取黃金，並可在參與國間轉移。(五)基金的管理：基金由一代表各參與國的董事會管理之。每國的投票權依其對基金資本的負擔額而定，但任何一國的投票額不得超過總票百分之二十五。董事會的普通決定經多數通過發生效力，但特殊決定，如各參與國匯率更動的許可等，須經五分之四之通過，始能生效。(六)參與國的責任：各參與國應維持匯率的穩定，取消匯兌統制，善意考慮平準基金當局對貨幣有關問題的建議，及對防止資金外逃等問題與其他參與國採合作的態度。

四

從以上內容觀察，懷特貨幣計劃可視為一種修正國際金本位制。大體言，該計劃與過去金本位制不同之點，即過去貨幣的主權操諸各國，現在設立平準基金一種國際機構，將各國大半貨幣主權移轉到此國際機構。再過去各國有各國貨幣單位，現在成立一國際單位「佑尼達」，以與各國貨幣聯繫。又以往對於國際間短期資金的流動無法控制，現在成立這國際機構，將國際間短期資金的流動加以管制，這是機構上幾個大不同點。

根據國際貿易國際匯兌原因，以往國際金本位調節國際金融，維持國際經濟均衡的方法，簡單的分析，可分為下列各步驟：(一)一國貨幣匯率定為一定含金量(如英鎊定為純金一一三．○○一六英厘Grains，美幣一元定為純金二四．七五英厘)；(二)匯率如遇變動——上升或下降時，影響於黃金的流動——流入或流出；(三)黃金的流動影響於中央銀行黃金準備額的變動，即黃金外流時促使銀行準備的減

少，黃金輸入時促使銀行準備的增加；(四)銀行準備的變動（增加或減少）影響於貿易各國資金信用的變寬或變緊，物價的上漲或下降，人民收入的增加或減少。以上種種變動的次第發生，足以調節當初引起國際收支上的變動（即出超或入超）——亦即促成黃金在國際間流動（流入或流出）的因素，此種演變的程序，足使貿易的國家再達於均衡情形。以上種種國家貿易和國際金融變動的程序，幾爲百數十年來英美經濟學者所共信爲國際經濟上不易的步驟，亦以往國際金本位所視爲不易的自動調節的法則。

但戰前金本位宣告崩潰，充分證明了這種貨幣制度運用不靈。過去國際金本位之所以失敗，約有兩大原因：一、爲世界各國黃金分配的不合理化，多者過多，少者過少，不能適應各國的需要；二、爲世界黃金生產量不足，且產量年有不同，致引起各國幣制上的波動。這次懷氏鑒於過去弊病，曾下極大工夫，加以矯正和補救。但懷氏計劃對於各國貨幣互相聯繫仍以黃金爲基礎，且利用黃金的彩色異常濃厚。此種貨幣計劃，如加以分析，仍不出爲一種變像的國際金本位。假此計劃施行起來，在國際貿易和國際匯兌變動和調節方面，與金本位的運用，亦處處相似。此計劃的調節步驟可簡單分列如後：(一)各國的通貨單位不定爲含金若干，而改定爲對成立中的國際通貨單位（佑尼達）的比率若干；(二)以前需黃金運出或運入，以平衡國際收支，但現在無需運送黃金，而以平準基金內的劃帳辦法，支付國際差額，替代黃金的流動；(三)平準基金內的付方或收方的劃帳促使各國中央銀行準備的增減及貨幣信用的寬緊，一如黃金流入或流出所發生的影響；(四)各國中央銀行準備的增加或減少對於各國國內金融及物價所可發生的變動，亦將一如國際金本位制的運用。不過這方面平準基金管制的機會較多，通融補救的辦法亦多，因此各種波動亦將隨而減少。準此以觀，懷氏戰後國際貨幣計劃，仍不出爲一種修正國際金本位制。

五

懷特計劃的特殊處，可得而言者，約有下列各點：(一)黃金的彩色異常濃厚，這層可由下列各點見之：(1)平準基金的籌集以黃金爲基礎；(2)建設中的國際單位「佑尼達」定爲含純金量一三九又三分之一英厘，等於美金十元；(3)參與國得將黃金存入基金以換取佑尼達單位的信用，這種信用亦可以兌取黃金，凡此都是特別有利於持有黃金的國家。(二)對於債權國比較有利，照國際經濟上觀察，持有黃金國亦往往爲債權國，這點已經是對債權國有利，且基金開始時，參與國須繳入現金，此非戰後債權國，恐不易辦到。又將來國際收支上的「順差國」（即出超國），照國際經濟均衡的觀點看，與「逆差國」（即入超國）同爲一種失衡狀態，但順差國則無需經過調整處置，說來還是一面倒的辦法，也是這計劃的一缺點。(三)對於各國貨幣的處理基金當局的權過大，而與各國諮商的機會過少。(四)各國投票權依據其對基金資本的負擔額，而不以國家爲單位，將來操縱之權必落於黃金，外匯，國民收入，和國際支付差額總額最高的國家，是無可疑義的。

從以上各點觀之，可見懷氏貨幣方案充分將戰後美國在經濟上的強點提高於有利地位，照此計劃付諸實施，戰後國際貨幣金融牛耳，其必屬於美國，是預料中事。若與英方所提的凱因斯計劃相較，尤易見出此種論斷之不謬。不過整個戰後國際經濟合作，除幣制外，尚有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與各國生產分配適當處置三大部門。就中尤以國際長期投資機構的不可缺少，爲最顯而易見。此時最明顯易見的，各國在戰後，除美國以外，都面對着戰爭大破壞後龐大的復興建設問題。在大破壞後需要大建設，無論歐洲各國，在遠東方面，抑在南洋方面，將來皆須仰給於經濟充實國家的借款投資，以舉辦其戰後復興建設事業，美國不待言，是戰後最重要的資本供給國。至從國際經濟均衡上看，懷氏貨幣計劃的最大缺點，亦爲缺少國際長期投資機

構，無以處置戰後復興建設期中各國長時期間繼續入超的失衡狀態。國內經濟學者亦嘗論及此點。因此有去年十月美財政所公布的懷特聯合國銀行(United Nations Bank)計劃(以下簡稱國際銀行)。

六

懷氏通貨計劃公布後，各方的一項重大批評，即為該計劃缺少國際投資的部份，這項缺點，至去年十月懷氏國際銀行計劃的公布，可謂得到了一個圓滿的答案。由是可知懷氏通貨計劃與其國際銀行計劃的配合性。懷氏國際銀行計劃的主要內容：(一)目的：擬議中的銀行在供應資金以進行遭受戰禍各國的長期建設，其基金將補助私人資金之不足，並將假手各政府轉貸。該銀行將鼓勵私人金融機關供應長期資金，以發展其會員國(指參與該銀行的各國)的生產資源。必要時並將與私人資金合作，及補助私人基金的不足，以達到此目的。(二)資本：該銀行的資本約達一百萬萬美元，由會員國分籌，大部份資本將保留為該行所保證或該行所發行證券的保證金。會員國第一次及其後交納之資本，應有一部為黃金，一部為該國的通貨。黃金的比率不超過交納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各國交納黃金的比率，將就每一會員國的存金額加以規定。該行所有之各國通貨，將由會員國以黃金重予收回，其比率佔其每年應交納數額百分之二。(三)業務：凡以私人資本貸與任何會員國政府的貸款，及假手該會員國政府轉借其國內政治部門與貿易及實業機關的貸款，均可由該行加以保證。該行並得參加私人資本貸出的貸款，唯有借貸者不能以合理之條件自私人方面獲得借款，該行始可自其本身基金中撥款貸與之。(四)投資貸款的規定：該行所為的一切決定，將純基於經濟上之立場。該行接受任何要求保證貸款參加貸款或舉辦貸款的申請書時，應考慮下列三點：(一)投資計劃的是否健全，(二)保證貸款之會員國的預算情形，(三)該會員國之未來之收支平衡。國際銀行所參加之一切貸款，或銀行擔保或該行本身所舉辦的貸款，必須具備下列各條件：(一)本息的清償應由會員國之政府加以充分保證，(二)投資計劃必須由有資格之委員會加以調查，並經其批准，(三)貸款的條件必須合理，(四)該銀行對其所保證之貸款應負損失賠償的責任。國際銀行對於貸款所得的應用方式不得提出任何條件。以任何一國的通貨為貸款者，非經該國的同意，不得舉辦。國際銀行唯有與會員國政府，會員國中央銀行，及以會員國為主之國際機構進行交易，或假手會員國政府與上述各機構進行交易，該行須經會員國贊同後，始得保證。各會員國所為之國際貸款，該行經會員國之贊同並與國際穩定基金機構諮商後，亦得出售其所有基金或外匯。該行的資金產業將為會員國的利益而加以運用。(五)該行的管理：該行的管理權操於董事部，董事部有董事長一人，尚有輪流由各會員國指派的董事長一人，董事部將指定執行委員會，顧問委員，及其他有設立必要之委員會。會員國投資票權之大小視其股金而定，任何一會員國得於一年前提出退出通知。上述暫時計劃與美財部日前提出的國際通貨平準基金計劃或將受同樣的待遇。

七

從以上內容，可知擬議中的世界銀行在補充國際通貨穩定計劃關於缺少國際投資部門的大缺點，國際銀行與國際平準基金機構，實輔車相依，交互為用之國際貨幣金融機構。由是可知懷氏貨幣計劃與其銀行計劃的配合性。簡言之，戰後國際貨幣的價值，一方面可靠國際平準基金計劃的實施，以維持穩定，一方面對於國際收支長時間失衡時，可賴國際銀行的國際投資政策的輔佐，以維持各國經濟均衡。穩定通貨計劃的重要，固無待言，擬議中的國際銀行這項國際投資機構的重要性，亦因此而充分顯出。貿易逆差國之需要長期投資以維持均衡的理由比較易見，但貿易順差國之需要繼續向國外投資，以維持均衡，以英國數十年來的對外貿易及國外投資的實際情形言，亦是必要的。故世界銀行的設立，是逆差國與順差國兩得其益的計劃。

懷氏銀行計劃最令人批評的地方，一如其貨幣計劃，即將黃金地

位過度抬高，黃金的彩色太過於濃厚。但此項銀行計劃如付諸實行，對於戰後國際經濟造福之處極多。預期中的收穫可得而言者，可有下列數事：(一)戰後需要進行大規模復興建設的同盟國，以此銀行的設立，可有供應各項建設所需巨額資金的籌措地處；(二)戰前國際幣制因黃金分配不均而發生的種種惡性影響，可因此銀行的運用，將黃金較合理化的分配，國際幣制可望臻於穩定狀態；(三)因國際銀行國際投資政策的運用，各國對於所需主要原料的分配問題，及原料品價格波動問題，可望解決其大半；(四)此項銀行計劃的實施，可使各國免除自金融方面措施不當所產生的經濟恐慌；(五)戰後各國的生產及各國人民生活水準可因而提高。

八

從以上各節的檢討，可知懷氏兩項計劃所示解決戰後國際經濟問題的對象。戰後國際經濟合作，原可包括四大部門：(一)國際通貨，(二)國際貿易，(三)國際投資，及(四)各國生產與分配的適當處置問題。現在美國對於國際通貨及國際投資兩大部門，已提出具體方案，可謂已着手解決國際經濟合作問題的大半，所餘者僅戰後國際貿易問題，及此問題相聯帶的各國生產與分配的適當處置問題。將來關於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或類似機構方案的提出，爲預料中事。

我國爲聯合國中主要國之一，戰後國際合作將佔重要地位，亦爲預料中事，是以將來至有參加這種國際通貨及國際投資機構的趨向。但最後的決定當以本國戰後經濟政策爲準繩，這點現在已略可窺見途徑。我國於此次戰事結束後，各項破壞亟切需要建設，毫無疑義。再我國戰後經濟政策主要在實現　國父實業計劃及　總裁「中國之命運」中所昭示的經濟建設計劃，換言之，即於戰後最短期間，實行工業化政策。最近政府對於利用外資協助經濟建設，亦經表示贊成。我國一向爲入超國，戰後龐大工業建設計劃的付諸實行，必有大量機器及工業物資進口，且在在需要工業資金的籌措，故在戰後若干年中，貿易逆差及「入超」趨勢，必然更甚，長時間的失衡，可能性至大，其有賴於世界銀行國際長期投資政策的運用以資調劑，以維持均衡，不言而喻。本文的檢討，除指陳懷特通貨計劃與其銀行計劃的配合外，同時亦可顯示以上兩計劃與我國戰後經濟建設的配合。

美國之高度工業化

湯德明

美國工業經濟的發展，與幾次戰爭有密切關係。由於獨立戰爭（一七七五——八三年），美國得以解除英國的殖民化梱桎，本國工業，始有抬頭機會。由於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六五年），南方農業所加於北方工業的阻礙又得以掃除，美國工業才突飛猛晉。一八八〇年後重工業尤見發展，至一八九〇年頃，美國鐵鋼產量已占世界首位，至一九〇〇年頃，煤產量也已趕上英國而居世界第一。此則由於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以及其他軍事行動，美國得在海外開闢廣大的市場。由於首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八年），美國工業充分成長，幷由債務國一變而爲債權國，國內集中甚多黃金，其經濟地位且一躍而居英國之上，至一九二九年，遂呈現空前的繁榮。溯自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二九年之七十年間，美國工業生產增加二十一倍，而同期間，英國不過增加二・九倍，法國五・四倍，德國也祇八・一倍。

美國工業生產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尚次於英、法、德而居世界第四位，在七十年代，亦仍次於英、法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八十年代，則僅次於英國而居世界第二位，在九十年代，則躍居世界首位。由第四位到第一位，前後歷時不過三十餘年光景吧了。由於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美國生產力量再進一步，得達於戰時高度繁榮。茲舉煤、鐵、鋼歷年生產量為表一，以見美國工業之成長情形。

表一　美國工業之成長

年別	煤（單位百萬公噸）	鐵（單位百萬公噸）	鋼（單位百萬公噸）
一八八〇	六四·九	三·八	一·二
一九〇〇	二四四·六	一三·八	一〇·二
一九一三	五一七·〇	三一·〇	三一·三
一九二九	五五二·三	四三·三	五七·三
一九四一	五二〇·〇	五五·九	八三·〇

（註）一八八〇——一九一三年數字，據「法國統計年鑑」Annuaire Statistique. Stat Générale de la France, ，1934；一九二九年據「國聯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8-39。一九四一年：煤係估計數，鐵、鋼數字據俄文「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一九四二年五——六月號。

在一八五〇年，美國煤產量僅六百餘萬公噸，至一八七〇年增至三千萬公噸，一八八〇年已達六千五百萬公噸，一九一八年增達六億一千五百七十萬公噸。其後多年迄未達到此額，一九二九年亦不過五億五千餘萬公噸。即以一九二九年與一八五〇年相比，也約增九十倍以上。一九四〇年擴軍後，煤產又行激增，并有駕凌一九二九年的趨勢，此在煤的比重逐漸降低之今日，尤有重要的意義。（煤在美國燃料中比重逐漸低落，如在一九〇〇——一〇五年比重為八八·七%，一九三〇年即不及六十%，一九三七年更減至五〇·四%，因為煤已可為石油、水電、天然瓦斯所替代，而節省燃料的進步，也使煤的需要減少。）

次就銑鐵生產而言，在一八五〇年，僅約五十六萬公噸，至一八七〇年，增至一百六十六萬公噸，一八八〇年，已達三百八十萬公噸，一九二九年又增至四千三百三十萬公噸，一九四〇年為四千七百萬公噸，一九四一年更增達五千五百九十萬公噸，前後增加一百倍之多。

再次說到鋼的生產，在一八五〇年尚無紀錄可考，在一八七〇年約為六萬九千公噸，至一八八〇年，增至一百二十萬公噸，一九二九年增達五千七百三十萬公噸，一九四〇年更增至六千七百萬公噸，一九四一年為八千三百萬公噸，一九四二年為八千六百萬噸，一九四三年估計可達八千七百萬至九千一百萬噸（同年，政府之鋼生產鵠的則為九千一百五十萬噸），與一八七〇年相較，則已增一千二百六十倍以上。

除煤、鐵、鋼外，電力在現代工業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美國之公用電力，在一九一二年為一七·六「十億」瓩時，一九二九年為九七·三「十億」，一九三七年為一二一·八「十億」，一九三九年為一三〇·三「十億」，一九四〇年為一四四·六「十億」，一九四一年為一六二「十億」。前後三十年間，增加九倍有奇。

美國在一九二九——三三年，因遭經濟恐慌影響，工業生產祇有跌落，甚少增長。一九三七年雖回復舊觀（據表二統計，一九三七年工業生產指數略略超出一九二九年，另據彼特羅夫著一九四二年莫斯科版「美洲合衆國」一書統計，則一九三七年僅及一九二九年的九二·二%），但翌年又行低減。惟自一九四〇年起，因積極擴軍關係，工業生產指數經常超過一九二九年，并超過很多，這實在是有決定意義的事實。

表二　近年美國工業生產指數

一九三五—三九年＝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一〇
一九三〇年	九一
一九三一年	七五
一九三二年	五八
一九三三年	六九
一九三四年	七五
一九三五年	八七
一九三六年	一一三
一九三七年	一一三
一九三八年	八八
一九三九年	一〇八
一九四〇年	一二三
一九四一年	一五六
一九四二年	一八一
四二年一月	一七二
四三年一月	二〇〇

(註)據聯邦準備局(Federal Reserve Board，簡稱F. R. B.)統計彙編而成。

依據聯邦準備局統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二九年爲一一〇，一九四〇年增至一二三，一九四一年一月續增至一四一，一九四二年一月達一七二，一九四三年一月已至二〇〇，估計一九四三年秋約爲二二〇，則恰爲一九二九年之二倍，即爲一八六〇年之四十二倍。

至言工業生產總值，在一八五九年爲一·九「十億」美元，一八七九年爲五·四「十億」，一八九九年爲一一·四「十億」，一九一九年爲六一·七「十億」，一九二九年爲六九·九「十億」，一九三九年減爲五六·八「十億」，其後諸年工業生產總值雖不得而詳，但已知全部生產總值(包括非工業生產總值在內)，在一九二九年爲九九·四「十億」，一九三九年爲八八·一「十億」，一九四〇年爲九七·一「十億」，一九四一年爲一一九·五「十億」，一九四二年爲一五一·七「十億」，一九四三年估計可達一八八·〇「十億」美元。以之與一九二九年比較，約已增加一倍，與一九三九年比較，已增加一倍有奇。由此推論，則工業生產總值亦應隨之倍增。

就工業生產總值言，在一九二九年，曾占世界工業生產總值的四七%，較整個西歐所占成份(四四%)爲尤多。在一九三八年，亦較德、英兩國合計之數尚超過十一%，一九三九年後，其世界地位當較更高。

就工業生產數量言，以一九三八年爲例，則如表三所示。惟該年爲美國經濟較蕭條之一年，工業生產亦較低落，此不可不注意者。

表三　美國工業生產之世界地位(一九三八年)

	世界產額	美國產額	美占%
電力(十億基羅瓦時)	四二四·〇	一二五·九	二七·三
銑鐵(百萬公噸)	八一·七	一九·五	二三·九
鋼(百萬公噸)	一〇八·九	二九·二	一二·七
木漿(百萬公噸)	一九·三	四·八	二五·一
紙(百萬公噸)	二〇·七	五·八	二八·二
水泥(百萬公噸)	八二·五	一八·三	二二·二
人造絲(百萬磅)	一、〇二五·〇	二六〇·〇	二五·四
硫磺(百萬磅)	九五八·〇	三〇·〇	三·一
汽車(千輛)	四、〇二一·〇	二、五〇〇·〇	六二·二
船舶(千總噸)	三、〇三四·〇	二〇一·	六·六

(註)據日本「金鋼鐵新報」二十九卷十一號，昭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又右表中紙之產額係一九三七年數字。

在一九三八年，美國工業生產尙多有不能占世界首位者，船舶卽爲一例。但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船舶生產增加一百倍，卽由二十萬噸增至二千萬噸後，無疑已是世界第一。

再從工業部門加以研究，美國的重工業尤其是機械工業，特別發達。機械工業生產價値，在一九一三年，占全世界五十%，在一九二五年，占全世界五七．六%，其機械種類別，且以原動機類爲最多。美國近年對外輸出商品中，就價値言，機械又占第一位。

至於美國的「新」工業（指油、鋁、酸、人造絲，汽車各業，對「舊」工業之煤、鐵、鋼、船、棉各業而言），均已居世界首位。其中製鋁業，在一九三八年之生產額尙不及德國，其後卽大加擴展，一九三九年產鋁十四萬八千四百公噸，一九四〇年估計已達十八萬七千公噸，一九四一年六月後，政府陸續建造新廠八家，至一九四三年，美國鋁產能力已可增至九十五萬餘公噸，此數較一九三八年世界鋁生產總額尙多六十%有奇，當然已是世界第一。

再言新工業中之汽車工業，一向是世界最龐大的，其年產額常占全世界六十%以上，在一九〇〇年，尙僅生產四千輛汽車，一九二九年增達五三五九千輛，據估計，同年汽車業實際生產力當在八百五十萬輛以上。在一九三九年，生產汽車三百七十萬輛，其操業率僅達四五——五〇%，在一九四〇年操業率約爲五五%，卽產出汽車約四百四十七萬輛。在一九三九年汽車業雇用工人數達四十七萬九千，與全體黑色冶金業雇工人數相等，較全體機械工業雇工人數尤多四〇%。其所消費原料在全部原料消費中所占成份，以一九四〇年爲例，鋼爲一六%，鍊鐵五一%，灰鐵一四%，樹膠八〇%，板玻璃七五%，皮革六八%，鉛一〇%，銅一四%，錫一一%，鉾三四%，鋅一二%，棉一〇%，甘油一一%，何況汽車還是汽油的大量消費者（約八十%）。因此，汽車業的盛衰，常可左右美國經濟的榮枯，在戰時，則左右軍需工業生產力的大小了。

美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還可以從下面幾個角度來測量。

就國民經濟的結構言，在一九二九年，工業生產淨値爲三百零七億美元，農業則爲一百二十八億。在一九三七年，工業爲二百五十二億，農業則爲一百億。由此可知工業生產遠較農業爲多而重要。

就對外貿易中商品的性質言，在一八五一——六〇年，製成品與半製品僅占輸出總値的一六．三%，在一九〇一——〇五年，占三五．四%，在一九一三年占四八．八%，在一九二六——三〇年占五九．五%，在一九三八年增至六六．五%。美國多年以來，旣爲出超國家，故輸出商品之性質可以說明該國工業的發展情形。

就城鄉人口的分配言，美國人口有向都市集中的趨勢，在一八五〇年，城市人口佔全國一二．五%，一八六〇年占一六．一%，一八七〇年佔二〇．九%，一八八〇年佔二九．五%，一八九〇年佔三六．一%，一九〇〇年佔四〇．五%，一九一〇年佔四五．八%，一九二〇年佔五一．四%，一九三〇年佔五六．二%，一九三五年增至五六．九%。一九四〇年美國五大都市（紐約、芝加哥、費城、底特律、洛沙磯）的人口卽佔全國十二%。因爲美國連農業也機械化了，靠土地營生的人大大減少，農村過剩勞力湧向都市，轉而依靠工商各業爲活，這是工業發達國家的一般的現象。

就工場勞動的分配說，工鑛商等占其大半，農業僅佔一七%。就技術水準、勞工效率說，也可見美國工業的高度發展。容當爲專文論述之。

就企業組織的規模說，美國是資本集中，生產集中最顯著的國家。由於美國的煤、鐵產區之遙隔，鐵鋼價格之搖擺，戰爭與恐慌之威脅等等，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已有獨佔情勢，如一八七九年之「美孚煤油托辣斯」（Standard Oil Trust），可爲代表。其後雖有所謂「反托辣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 及其補充法案；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及其補充法案等）的成立，但事實上仍未能阻止獨佔的加強。美國大企業之年產額在一百萬美元以上者，其工場數目，在一九〇四年，僅佔全國工場數的〇．九%，

其雇工人數，則占全體工人的二五・六%，其生產價值，占達全工業總值的三八・〇%。至一九二九年，相應的數字爲：工場數目佔五・六%，雇工人數佔五八・〇%，生產總值占六九・三%，若專就「企業組合」(Corporations) 而言，其工場數目，在一九〇四年，占全國工場數的二三・六%，而其雇工人數則佔全體工人的七〇・六%，其生產價值佔達工業生產總值的七三・七%，至一九二九年，相應的數字爲：工場數目佔四八・三%，雇工人數佔八九・九%，生產總值佔九二・二%，在一九二九——三三年恐慌期中，生產集中，更益顯著。

至於資本集中情形，在一九三六年，納所得稅之企業組合，爲數計有四一五・七千個，資產總額共爲三〇三、一八〇百萬美元。其中僅約二%的組合，佔資產總額的五二・三%，在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企業中，都是由少數「富翁」供資，其最著者爲摩爾根 (Morgans)，洛克斐勒 (Rockerfellers)，篾朗 (Mellens) 三家。在一九三二年，前二者合佔全國「企業組合」總資產達九百三十億美元，幾爲總額的三分之一，而後者也有四十五億。

再就個別企業部門加以分析，如採鑛業，無煙煤鑛的八〇%爲八個企業組合所有，與摩爾根，洛克斐勒所經營之鐵路公司發生密切關係。煙煤的三五%，操在三十家公司手中，其中四家大公司便佔有全國煤富源的二〇%。鐵鑛的五〇%，屬於摩爾根所供資之「美國鋼業公司」(U. S. Steel Corp.)。銅鑛的八三%爲六家公司所控制，其中四家則占有四五%。

如鐵鋼業，在一九三三年，十一家公司鋼產能力佔全美的八〇・三%，五家公司則擁有七〇%，在一九三五年，十家公司擁有八二%，而「美國鋼業公司」一家，即擁有三九・二%。

如石油業，在一九三二年，美國在全世界石油投資中佔六七%，在一九三八年底，美國二十家石油公司即佔全國石油業投資總額的六六・七%，即三分之二。「美孚煤油公司」(Standard Oil Co.)，其最著者，該公司資產總額在一九三九年底，約達二十億美元之多。

如機械業，其中電汽機械，工業用機械，農業機械，他種事務機械，幾均由少數大公司所包辦。其尤大者，如 General Electric Co., Westinghouse Electric & Manufacturing Co. 等。

如汽車業，尤爲企業集中之典型。美國在一九二二年有汽車公司五十七個，當時生產由「福特」(Ford Motor)，「通用」(General Motors) 等七家占一半以上。在一九三〇年，福特佔全國四〇%，通用佔三四%，二者合佔七四%。同年汽車販賣額，二者合佔全國三分之二，若加入 Chrysler Motors 合計，三者佔六分之五。在一九三二年，通用擁有資產十三億美元以上，佔汽車生產額的五〇%有奇，福特擁有資產七億二千二百萬，佔產額三五——四〇%。

如化學工業，就炸藥言，杜龐 (du Pont) 與摩爾根佔六五——八〇%。就蘇打言，一家公司即占六〇%。至於化學肥料，則七家公司佔三分之二（六五%），其中二家即佔三分之一。他如化學藥品，染料之販賣，化粧鉛粉等均集中於少數公司手中。

資產集中，生產集中，是現代工業經濟的特色，也就是工業高度發展的產物與條件。

最後，要附帶敍及的，是美國的生產雖然已經很有可觀，但生產設備仍然過剩，故即使在繁榮的一九二九年，煙煤生產力的負荷祇有七八%，鋼——八七%，銅——七八%，汽車——六三%（據瓦爾加 Varga 氏估計爲五四%，渠係估定同年汽車實際生產力可達一千萬輛，但較保守的估定則爲八百五十萬輛，此處操業率即係據後一估定算得），波特蘭水泥 (Portland Cement) ——六七%，紙——八六%，鞏素——六八%，因而留有增產的廣大餘地，現時生產量之超過一九二九年，當非偶然的吧。單拿鋼生產力的負荷來說，在一九三八年，僅達三九・七%，一九三九年爲六四・七%，一九四〇年爲八二・一%，一九四一年爲九七・三%，一九四二年估計已達九九%，

與一九二九年相比，業已增加許多，與一九三八年比較，相距更是遙遠。直至一九四三年，即使不增加固定生產設備，鋼產量仍可能上增。於此又可看出美國生產力的特點——潛能很大。

工業救濟問題之檢討

田文彬

一

自抗戰以來，後方工業發展，各期均有其特殊的困難，迄至最近，已有一部分轉入生產過剩，資金呆滯，和工廠停閉的狀態。譬如機器和鋼鐵兩業，即屬如此。因爲在長期通貨膨脹之下，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已極度萎縮，此時欲繼續與辦新事業和擴充舊事業，已不可得，而政府鑒於社會情勢的嚴重，又改採緊縮政策，愈使上項形勢趨於明顯。在此種情形下，機器和鋼鐵兩業遂不免首先遭難。據翁部長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報告，渝市附近已登記的機器廠計三百六十四處，其中歇業者已達五十五家，停工者十三家，共佔總數百分之十九；鋼鐵廠在四川共登記十八家，自去年六月起至報告時止，已有十家停工，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六。另據民間研究機關估計，機器廠已停工歇業而未具報者，恐與報告數目不相上下，故實際停工者已超過三分之一；民營鋼鐵廠在川省共二十二家，現已停工十八家，計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強。此種情形，確屬嚴重，亟應對於當前的救濟方案加以檢討，並尋覓一有效的對策，以求解決。

在各項救濟方案之中，政府當局顯然着重分批訂貨，配售於其他各業的辦法。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曾於去年三月間擬有訂製機器專案，並撥足一萬萬元作爲訂金，至同年八月間，即已將第一批機器全部訂齊，且利用該批機器發動若干新事業，及配售各廠礦作爲擴充或輔助設備。現第二批訂貨亦已開始，訂金聞已增至九萬萬元云。此項辦法的效果如何，值得我們深長思慮。

所謂機器和鋼鐵兩業的生產過剩，並不是眞正的過剩，而是其生產超過了現在原料、勞工、和運輸設備等所能容許的限度，致使其表現相對過剩的狀態。政府訂貨的目的，是在掃除過剩，並無錯誤，但同時不可忘記，應使原料勞工等亦比例的增加。否則祇將原來已不爲社會所收容的機器鋼鐵產品，強令各廠礦消納，其他條件不變，則結果必對現有的原料勞工等增加壓力，可無問題。

假若感覺產品滯銷的，祇是某一單獨的工廠或某一單獨的礦場，無疑的我們可以用收購產品的方法，使其得以繼續週轉。解決了它的產品的問題，同時亦即救濟了它本身。但現在感到產品滯銷的，是整個機器和鋼鐵兩業，情形未免不同。對於該兩業不斷訂貨，配售於其他廠礦，後者亦即須不斷增購原料和僱用勞工，以免機器廢置不用。此時市面上原料和勞工的價格必然逐漸抬高，而使某些廠礦購買不起，不得不將以前所需要的購出一部，讓給他人使用。似此，機器和鋼鐵兩業困難的解決，同時即是其他廠礦困難的發生，救濟了此業，卻犧牲了彼業。若原料勞工等的價格繼續抬高，其他廠礦必將因購買力不斷萎縮而紛紛從市場上退出，最後連機器和鋼鐵兩業本身亦將無

法保持救濟的效果。

在對外交通斷絕，原料和勞工等不能顯著增加的今日，工業生產如何始能圓滑進行，根本須從整個國民經濟中去求解決。目下當局所推行的訂貨政策，其作用祇是將某些實業部門的困難，強制分散於其他實業部門而已，而從社會觀點來看，困難不但未曾消滅，且因抬高原料勞工等的相對價格乃至一般物價之故，或反較前增加，均在意料之中。

三

其次，關於時人所擬具的救濟方案，大致可分為築路、造船、和製造農具三種。築路和造船，頗似歐美的公共工程政策，值得考慮的是它的「間接就業」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得到和上文同一的結論。而況築路偏重於鋼鐵業，且無適量的鋼板以製造車頭，造船偏重於冷作業，亦無適量的鋼板以製造船身，祇能製些木殼機器船，救濟範圍不大，故均可不論。比較可注意的，還是製造農具的問題。

最近數年，敵寇在我淪陷區內，對於農具肆意搜括破壞，無所不用其極，一旦失地盡復，需要補充的數量必多。此次在國際糧食會議中，我國代表卽已提出意見，希望各友邦借給我大量的農業機具和耕畜種籽等，以為戰後農業復員之用。不過各種高度機械化的農具，在我國一時恐尚難推行。為適應實際情形計，及早由自己來加以製造，以備將來應用，未嘗不是切要之圖。此外，製造農具還有以下兩個好處：第一，發動此項業務，不需要若干間接材料，不發生上述困難分散的問題，至少亦可減至最小限度；第二，所謂農具包括動力機、抽水機、耕作機、農產加工機、和人力獸力工具等，範圍較廣，可使極大的機器廠鋼鐵廠，以至極小的翻砂銅鐵作坊，都獲得救濟。

照此看來，製造農具比較合理，值得贊同，但其實施時的技術問題仍不無可商榷之處，其中最關重要的一點，卽是資本如何籌集的問題。這裏，我們覺得政府切不可再利用其發行權，以辦理籌集的事務。據專家估計，大量製造農具，約需資本三十萬萬元，數目可謂龐大。假若按照一般人的說法，將此項資本交由國家銀行、有關各部（農林、經濟、財政）、以及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等共同負擔，則結果錢無所出，必仍取源於發行。依此推論，對於機器鋼鐵兩業的救濟，須賴於新鈔的增發，這顯然不是好的辦法。於是又有人主張為避免此種流弊計，可由政府以原料和廠家的成品相交換，或發給各廠原料，限令交回成品，另外再給以工資和合法利潤。這辦法似較進步，但政府所能控制的原料是否有如是之多，以及行政效率是否有如是之高，仍成問題。總之，農具是應該製造的，但又不可因此而增加發行，這是問題重心之所在。倘若不能於此二者之間尋一出路，其結果必將徒然引起物價的上漲而已。

四

在通貨膨脹的刺激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難於維持平衡的，某些部門的不足，反映於其他部門中，卽形成相對的有餘。因此，機器鋼鐵乃至其他各業的產品滯銷，與資本先進國經濟衰落時期的產品滯銷完全不同，表面上是生產過剩，實際則為物資缺乏。

在此種情形下，究將如何謀求有效的解決呢？我們以為政府應該乘此時機來一個通盤的大調整，卽將不需要和不健全的工廠的設備歸併，使其力量趨於集中，工作避免重複，然後再在統一的計劃之下，分配其職務，指導其生產，以徹底掃除有餘和不足的現象，並將有限的物資做最有效的利用。現在所謂生產過剩的廠家，其是否值得救濟，根本就有問題，各項枝枝節節的救濟方案，無論開的如何美妙，均祇能收效於一時，最後還是真正為社會所需要的實業始能立足。時候到了，我們不可再浪費我們的精力，而應使之集中於有用的方面。目下實業界已有聯合經營的傾向，敵寇已經完成了若干次的實業重編組，而我們尚無一次。政府應因勢利導，善為運用，以達成調整的目的。這是一條坦途，相信我們終於必能走上。

縣官在政制史上的地位

周蔭棠

中國昔時所謂親民之官，大都指各縣之縣官而言。（註一）職綜上或亦稱道府為親民之官，（註二）或又謂佐貳雖微，皆有親民之責。（註三）然習慣上並不普遍。道則巡察數郡，府則表率一方，要皆為督導州縣之官，丞佐雜職尚無民社之責。至於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寄以城池府庫，寄以錢糧征收，寄以訟獄判斷，責任甚重，有與民最親之稱，惟縣之正印官足以當之。所謂親民者，即現今所稱基層政治之意也。吾人綜觀前史，無論何代，其整個政制中，縣官之影響，皆為重大。茲試於數千年之演變中，探得其三點特徵，述之如下。

第一、名稱　縣官之職，自古至今，未能更易，惟名稱則稍有不同處。自秦以至北宋，歷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凡一千二百餘年，大縣曰令，中縣曰長，通常於縣官皆統稱之為縣令。（註四）至北宋，始有知縣之名。緣其初，中央集權，不過欲重縣令之任，以朝官京官知某縣事，凡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謂之知縣，知縣者實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質言之，係以中央官權理地方之事，與縣令不同。逮後能令，專設知縣，而知縣乃為縣令之專名，疇昔之中央官，遂變成地方官，意義頓改。（註五）宋以後，遼金皆仍稱為縣令，元則州縣官並以尹名，州為州尹，縣為縣尹，外各有達嚕噶齊一員，以為監督。至明又復宋代之舊名，府州縣官皆以知稱，清代因之，知縣之名，凡五百餘年不易。此外，明代地方制度，亦有一與前代不同之點，即秦漢以至元，縣之疆域，雖名以百里為率，而實因人口之稀稠而增減之，縣之大小，乃至於令長之稱，皆以戶口為標準，惟戶口數目之多寡，則歷代所定，不盡相同。（註六）明則改以賦糧為標準，知府知縣，名稱雖一，實分為三等，其糧二十萬石以上者，為上府，二十萬石以下者，為中府，十萬石以上者為下府，十萬石以下者為上縣，六萬石以下者為中縣，三萬石以下者為下縣。清代於此，亦屬沿明之舊。總之，無論其為縣令抑知縣，或其他稱呼，名目雖不同，而其為一縣之主管官則一，惟此為真正地方官，中朝雖欲侵佔其職權而終不可能。無論其以人口抑賦糧為區別等級之標準，而積容有變更，而其為地方行政區域之基層單位，則毫不能影響之也。

第二、員數　縣置首長一人，為一縣之主管官，綜攬全縣政務，此為歷代不易之制，惟至後魏，縣置三令長，亦如其郡置三太守，州置三刺史然。州之三刺史中，必皇室一人，異姓二人，而郡之太守，縣之首長，則未見有此規定，近人或謂其郡守縣令，三人中亦是一為皇室，二為異姓，語實無徵。後魏於縣設三令長之外，又創兼攝鄰縣之制，凡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註七）此種兼攝之制，固為鼓勵靖盜之辦法，然亦與縣設三令長之制有關，蓋惟縣有長官三人，故可分其餘力兼理二縣或三縣，三人兼理三縣，平均每縣仍不少於一人，當可從容集事，若每縣止一長官，兼攝數縣，民事紛紜，如何能勝任耶？清代常有以聽訟或幹練著聞之知縣，得兼斷鄰縣某特殊案件，或派赴鄰縣專辦某特殊事件，然此並非如後魏繼攝鄰政務之謂也。金代縣令之設，與唐宋不異，惟縣有置穆昆者，隸於明安之下。穆昆原作謀克，清人改正為穆昆，滿州語族也，蓋族長之轉，明安原作猛安，清人改正為明安，滿州語千也，蓋千夫長之稱。金太祖始以三百戶為穆昆，穆昆十為明安，繼而諸部來降，契丹，漢人，及渤海軍，奚軍，率用明安穆昆之名，以

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註八）是其初制，源於諸部族間，分置明安穆昆，其後諸州縣亦有置穆昆者，隸於明安之下，職從五品，較諸縣令之秩爲高，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是縣令之外，又別有穆昆之官矣。考漢代郡縣守令，勢重權尊，殺人例不待奉報，剿賊用兵皆其職責。（註九）宋史職官志載京朝官知縣事，有戎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是降至宋世，縣官猶兼理軍事，金之穆昆，即以專司軍事而論，已爲分縣令之權，況除不管常平倉外，餘悉同縣令者乎？職權不清，此疆彼界，失所統轄可知矣。元代於各州縣之州尹縣尹外，具設有達嚕噶齊一員，或謂爲頭目之意，（註一〇）或直稱州達嚕噶齊曰監州，縣達嚕噶齊曰監縣，其職僅以蒙古人任之。縣達嚕噶齊實爲一縣之最高權力者，斷事管印官，并監督全境之官吏，而縣尹一職，則以漢人任之，爲一縣行政次官，處理普通政務，實際上，達嚕噶齊即主管長官，殆如今日淪陷區內，各縣之日本顧問，而縣尹反處於輔佐縣政之地位也。由上所述，可知正常規制，一縣之長官，只有一人，惟後魏有縣令三人，金於縣令外，有所謂穆昆者，元於縣尹外，有所謂達嚕噶齊者，斯爲例外，蓋此三代皆以異族入主，既猜忌之橫生，思有以嚴防漢族，而其習慣故事，又本不與中夏同，於是乃有此變制耳。淸代以滿族統制中國，而一切制度，多由舊章，中央各官，漢滿並用，地方長官，亦止一員，無兩人以上並列一缺之事，然自入關以至咸豐初，滿人爲督撫者十之六七，順治時曾欲將各省督撫盡用滿人，賴魏裔介抗疏力爭而止，（註一一）乾隆時又欲盡用旗人爲知縣，賴劉統勳徐青善諫而止，（註一二）故自乾隆以後，除奉天府縣各官，定制專用旗員外，（註一三）其他各州縣，皆無是例，此亦淸人之善於適應中國環境，所以能延國祚至數百年之久，而異於拓跋女眞蒙古歟？惟八旗編制，與金之部伍相近，各地駐防之八旗佐領，於訓練外，隱然兼司牧之任，此則與金代縣令之外，別有所謂穆昆者又相同，而淸代系統較爲嚴密，且駐防所在之縣亦不多耳。

第三、人選　一縣長官之優劣，與一代政治之隆汚，有密切關係。其將縣職看重，人選嚴格者，必爲新興統一或太平鼎盛之朝，其社會鄙視縣官，政府任人濫雜者，必爲割據短促，或帝國崩潰之際，證諸史籍，歷歷不爽。漢代郎官出宰百里，天子不輕以授人，刺史巡視郡國，不得輕辱黃綬，（註一四）所以重其職者甚至。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唐明皇納張九齡之言，猶行此制。宋初愼選朝官出知州縣之事，孝宗時，定制縣令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得除監察御史，（註一五）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明初廣徵天下賢才，爲州縣之職，敕命厚賜，以勵其廉恥，又敕諭之，至於再三。（註一六）其行取之制，知縣得入爲科道，此猶襲往代必經縣令始得爲臺郎御史之遺意。（註一七）漢晉之初，唐開元宋乾道明洪武，皆昇平盛世，而其重縣令之選如此。反之，如南北朝時，縣令多由廝役任之，縉紳之流，恥居其位。五代時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爲縣令。宋天聖及政和間，縣令之選猥下，士大夫輕之。（註一八）明中葉以後，亦重內輕外，州縣官多浮濫闒冗，不得其人。由上正反兩方面事實觀之，中國史上，任何朝代之盛衰，完全繫於州縣之臧否，而州縣之臧否，又完全繫於長官之優劣。淸代疆臣閻敬銘曰：『自古未有不愼選牧令而能治天下者』。中國昔時之所謂吏治，幾即完全指州縣官之本身而言，此種觀念蓋已經極長久時間之醞釀矣。（註一九）

綜觀以上所舉名稱員數人選三項，縣官在政制史上之地位，約略可知。惟自明至淸，五六百年間，名稱定爲知縣，是中央官之權理，已成爲地方上之經常正印官，員數定爲一人，是縣屬大權已能集中而不分散，此兩項皆已不成問題。只人選一層，輕重縱濫，曲折繁複，因時而異，前後不同，此所謂吏治問題，眞正成一大問題，一切縣政，率由此中發生出來。明代官吏登庸，表面上以科甲出身爲正途，末年考場，多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之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爲道地，或伏謁，或爲之行金，購於諸上臺，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劵而得也。（註二〇）關於銓選，表面上聽吏部擇人注授，而

上下其手，予奪任意之事，亦所難免，後乃行掣籤之法以防弊，雖不能爲人擇地，亦不能爲地擇人，人與地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註二一）關於考核，表面上由於撫按執行，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親，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註二二）縣官之任用與考核，皆失其所，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隨之以亡。明代之顛覆，流寇與異族，不過其近因，縣政腐敗，實爲一最大要素。清代上承朱明，下啓民國，演變至今，影響未替，余更有專篇敘述焉。

（註一）參看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九十三所載同治三年四年閻敬銘兩疏。惟清代屬州之知州及專管地方之廳同知或通判，皆與縣官相等，自亦同享親民之稱。

（註二）參看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七所載乾隆二年諭旨及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七所載陳廷敬請考試正印官疏。

（註三）參看歷代職官表卷五十四。

（註四）惟封建系統中之侯國，實等於縣，以相治事，亦等於縣令，名稱稍異耳。

（註五）參看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及隨園隨筆官職類宋知某縣事非縣令條京朝官之分條。

（註六）考漢代縣制，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萬戶以下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然因時變遷，亦非一定。孝武開疆，邊縣戶口數百而或爲令，荊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亦名爲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主薨，復其故。此令長大小之殊，又未可概以漢書百官表爲斷之證。三國六朝，仍規漢法，以縣之大小，分令之品秩。如劉宋，縣令千石至六百石，長五百石。梁陳，官五千戶以上縣令相，品第八。不滿五千戶以下縣令相，品第九。後周則戶七千以上縣令，五命，戶四千以上縣令，正四命，戶二千以上縣令，四命，戶五百以上縣令，正三命，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二命。其等差較漢代爲尤析，而縣之戶口益少，蓋其時戰爭之餘，疆土既促狹，戶口復凋弊，不得不然也。唐代除京都及京畿附近之縣外，諸州之縣，所可考者，六千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宋則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戶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千戶以上爲中，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金則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以上爲次劇，在諸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爲上，三千戶以上爲中，不滿三千戶爲下中。元則始以六千戶以上者爲上縣，二千戶以上者爲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爲下縣，後以三萬戶以上者爲上縣，一萬戶以上者爲中縣，一萬戶以下者爲下縣，因合併江淮以南之地，人口稠密故也。

（註七）參看文獻通考卷六十一刺史及卷六十三縣令。

（註八）參看歷代職官表卷十七理藩院卷四十四八旗都統卷五十四知州知縣等官。

（註九）參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二劉蒲帮疏。

（註一〇）隨園隨筆官職類元知府或有或無條云：『所謂達魯花赤者，猶言府包屬曰，取管轄之義，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監縣。』歷代職官表卷八戶部倉場衙門補達嚕噶齊註云：『蒙古語，頭目也，原本作達魯花赤，今改正。』又一同邳州志有云：『按元官多以赤名，如必闍赤玉典赤怯里馬赤之類。此云達魯花赤，亦總轄之義。』

（註一一）詳見徐珂清稗類鈔及清鑑綱目乾隆八年御史杭世駿之對策。

（註一二）詳見李元度清先正事略劉統勳傳。

（註一三）奉天府暫各官，向俱漢滿兼用，乾隆十六年定制專用旗員，參看皇朝通志卷六十九職官略六，及大清會典事例吏部處員差選類奉天州縣各員缺揀選內所載乾隆二十七年諭旨及五十四年奏准文。

（註一四）案漢代縣官，銅印黃綬，成帝時曾改爲墨綬，哀帝時復舊，劉宋時又改爲墨綬，唐時縣官仍爲黃綬，詩人有『新命大邑仍黃綬』之句。

（註一五）參看趙翼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考，及顧炎武京官必用守令條。

（註一六）案明初天子敕諭，直下州縣，不須經承宣布使司，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清雍正元年春正月即位之初，連頒諭旨十一道，上自督撫，下至州縣小吏，皆諭千言誥誡，此固由雍正勵治之急，或亦猶襲明初之辦法也。清代州縣授任之初，有吏部引見之例，而入覲受計之制，迄未行也。

（註一七）參看王慶雲石渠餘記及清朝文獻通考五十五選擧九康熙十三年乾隆七年十六年。

（註一八）關於宋代縣令之任用，馬端臨熟於本朝掌故，文獻通考載之甚詳，凡天聖慶曆政和宣和靖康紹興乾道慶元諸朝有所規定也。當參看。

（註一九）漢代六條察吏，只言法，未言人，只言具體事項，未言抽象心理。北周亦有所謂六條，地方官必須誦習，其第一條主張先治心，謂：『心不清淨，則思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此種清心以治民之思想，當受魏晉以來王肅僞古文尚書人心惟危等語之影響。自宋以後，發展尤烈。

（註二〇）詳見研堂見聞雜記。參看虞陽說苑載張漢儒攻訐錢謙益瞿式耜疏。

（註二一）參看顧炎武選補，趙翼明吏部權重，及歷代職官表卷五吏部。

（註二二）參看明史循吏傳序及趙翼明初吏治，又清人汪命岳論吏治不清皆由舉劾不當，疏有云：『當明季時，緣撫按擧劾不實，廉讓者苞苴不入門，則目爲罷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譽稱幹才，甚至糾爲貪者皆眞廉，薦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馴致亂亡，興言前事，足爲殷鑒。』言之可謂深切。

隋唐五代的歲貢科舉

曾資生

隋唐取士的科目，有由學館生徒者，有由制舉者，有由州縣者，制舉科目頗多（詳拙著唐代的制科一文），大都由君主親臨考試，以待非常之才。其由州縣者則爲鄉貢，初步由州縣加以甄別考試，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新唐書選舉志云：『不由學館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寮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敍長少焉。旣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其所定科目，則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外尙有童子萬言，百篇之目，都是屬於歲舉科目的範圍。玆將各科分述如次：

秀才　漢制郡國貢，秀才孝廉，後避光武諱改曰茂才，歷魏晉南北朝均有此科。隋時秀才爲最高科目。唐書杜正倫傳：『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所稱。』芒雒遺文冢誌銘云：『開皇中應詔舉秀才，任汲郡朝歌縣丞。』同書趙庭嘉誌銘云：『祖諱孝鈞，隋秀才登科，初補校書郞，轉益州都宰。』同書徐純墓誌云：『以秀才升第，調國子學生，頻遷著作。』又舊書薛收傳云：『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隋時舉秀才，則試方略。（隋書七六杜正玄傳云：『開皇末舉秀才，尙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唐初亦爲最高科，且因隋制試方略，其後但限制綦嚴，貞觀中遂廢而不舉。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封氏聞見記亦謂唐初秀才試方略策三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昌齡（唐張昌齡傳云：『弱冠以文辭知名，本州（冀）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按昌齡曾於貞觀二十一年詣闕獻頌。）其後復有此舉，但實質已替，通典原注云：『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送者並停。』其時士族所趨在明經進士二科，故秀才一科，實際上等於廢絕。但至寶應二年，則又復秀才孝廉，停明經進士。舊唐書禮儀志云：『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每歲察秀才孝廉取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是年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定貢舉條目，秀才舉人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爲上第；上第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會要）。自後有經由秀才登科者，如馮伉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有秀才科，授秘書郞中（本傳）。然明經進士之科行之積久，已爲社會人士所重，故旋又勅令秀才孝廉與明經進士諸科兼行，終唐之世，秀才一科，仍趨沒落。

孝廉　孝廉亦漢代郡國貢舉之一科，歷魏晉南北朝仍存其制，不過名存實亡而已，至隋復重其科。（如張行成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郞。見舊唐書本傳。）唐因隋制，貞觀十八年二月六日引詳

詔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孝經，並不能答。是初唐孝廉之舉，亦空虛無實。中間此科遂替。至寶應二年六月二十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是年七月二十六日楊綰奏定貢舉條目，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儀禮，毛詩，尙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旁通諸義，務窮根本，試格策三道，問古今治體及當今時務，要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勑旨與進士明經等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勑孝廉科宜停。

明經（包括學究一經、兩經、三經、四經、九經）　漢制歲貢明經，內入仕通階，魏晉南北朝仍踵其遺制，然已有名無實。至隋此科復重，隋文開皇九年詔云：『……生徒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勑所由，隆茲儒訓。』（隋書本記）其時如韋雲起開皇中明經舉符璽直長（唐書本傳）。煬帝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至者甚衆，又如孔穎達大業初舉明經，授河內郡博士，這是經學的復興時期。因而明經一科，亦成爲入仕與出身的要途。唐因之。其初止於策試，貞觀九年勑，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幷儀禮者，於本色量減一等。永徽四年三月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上元元年，武后表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准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二年正月勑明經咸試老子策二條。儀鳳三年三月勑自今已後道德經孝經並爲上經，貢舉皆須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恆式。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加帖經。永隆二年八月，以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摘義條，纔有數卷，詔自今以後，明經每經帖十得六以上者然後令試策。長壽二年，武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神龍元年停臣軌，復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文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量配作業，幷貢舉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開元十六年十二月，國子祭酒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恐左氏之學廢，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亦請量加優獎，遂下制明經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勑令每年貢舉人，量減尙書論語一兩條策，加老子策。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自今以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十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天寶元年停老子，加習爾雅以代之。十一年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旣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明經自隋以降有四等，分甲乙丙丁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大抵千人之中，所收不過十一二而已。寶應二年依楊綰奏停明經，但旋即復故。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寖微，莫不由此，請約貢舉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旣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舍，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勑超與處分，明經請減二選。勑旨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奏。貞元元年四月勑以比來所習爾雅多是鳥獸草木之名，無益理道，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同年五月勑自今以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許冬集。貞元二年六月

詔，其明經與人有能習律一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經俱通，于本色減兩選，令集日與官。十二年依國子司業裴肅奏，依節如爾雅，十三年十二月尚書左丞權禮部知貢舉，顧少連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勅，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奉勅宜依。（據此，知趙贊奏定所問口義錄於紙上之制，其問有疑弛，至此復奏行之。）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墨義十餘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入第，詔從之。七年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試明經請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從之。開成四年十月勅，每年明經及第，更與十三人，降至五代，歲貢仍設明經之科，然其問頗有興廢。如晉天福五年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至開運元年八月，又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周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明經之中又有類別，有通曰明經者，依此登科者極多見。有分別曰學究一經者（如唐許孟容究王氏易登科是也）。有曰兩經者（如唐牛僧孺貫耽崔戎韋辭王凝，均以兩經登第是也），有曰三經者（見新唐書選舉志），有曰四經者（舊唐書楊瑒傳云，瑒於開元十六年奏請能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任散官），有曰五經與九經者。（如唐丁公著殷侑孫嘉貞五代蘇禹珪均五經登第，蘇珪父仲容於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後唐天成三年有鄉貢九經劉晉甫是也。）至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九經舉人，元帖經一百二十道，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於諸經墨義對一百五十道，五經元帖經八十帖，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令對墨義一百道；學究元念書二十道，對義五十道，從之。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又奏九經請都對墨義二十道，其帖經對策依元格，五經亦請對墨義六十道，帖經對策依元格，從之。是明經之科的考試內容及其風尚，自隋以至五代，其間隨時前後多所變化。

進士　進士之科，隋煬帝始置，當時止於策試。舊唐書楊綰傳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策試而已。』又同書薛登本傳云：『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如楊纂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見唐書本傳。）唐因之，進士考試已有變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先是沿隋制進士止試策文，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為常式。永隆二年，詔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與及第。二十五年四月，制進士停小經，準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浚開爲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經策全通爲甲第，通四以上爲乙第，通三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者爲不第。）進士分二等，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進士爲乙科而已。進士大抵千人中得第者百一二。寶應二年六月依楊綰奏，停明經進士科，旋復故。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貢舉趙贊奏，進士先時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今請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試策二道。三年四月制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以後，如有試官及不合選，幷諸色出身人等有應舉者，先於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如實才堪，即合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元和二年十二月勅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任州府小史，有一事不合清流者，惟薄有辭藝，並不得申送。太和七年八月禮部奏，進士舉人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

試詩賦幷停者，伏請帖大小經各十帖，仍對衆口議，伏准新制，進士略問大義，緣初舊革，今且通三通四爲格。明年以後，幷依明經例，其所試議論，請限五百字以上爲式。」勅旨依奏。八年十月禮部奏：「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間或暫改更，旋即仍舊，蓋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勅節文，先試帖經口義議論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請先試帖經通數，依新格處分。勅旨依奏。」進士及第人數自隋以降本無限制，太和四年格則不得過二十五人之限制。至九年中書門下奏請增至四十人，開成元年二年三年均放入及第四十人。但自後常有增減，如會昌三年正月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限人數，每年止於二十五人。四年初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增放楊嚴一人。五年放及第三十七人，旋又覆落七人。大中元年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增塡放及第三人。天祐三年二月勅今年吏部所放進士，依去年人數外，更放兩人，均隨時增省。有時禮部已放及第，但如考拔非才，則又可由中書門下或勅令其他人員重加覆考，故事實上所放進士及第員額，可以說沒有限制。五代時，進士一科仍沿唐制，唐會要略云：『唐天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禮部貢院奏，當司準天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勅文內，準近勅自此進士考雜文後，據所習本經，一一考試，須帖得過三以上者，即放及第者奏勅。進士帖經，本朝舊制（中略），今年凡應進士舉，所試文策及格，帖經或不及通三，與放及第。來年秋賦詞人所習一本經，許令對義目多少次第，仍委所司條例聞奏。其今年本經內對義，義目五道，考試通二通三，準帖經例放入策。其將來秋賦諸寺監及諸州府解送進士第，亦準去年十月一日勅，考試詩賦送試，奉勅宜依。』又云：『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交奏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十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道，今欲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請別試雜文二首外，又試帖經對義，亦依元格，從之。』是知進士考試內容隨時變化。其餘如覆按之制，亦同唐代，如後唐長興三年，今後禮部每年所試舉人雜文等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仔細詳覆奏聞，周顯德五年詔以貢舉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書，或有臧否，爰命詞臣，再加考覆。遂命翰林學士李昉復試。又有勅同進士及第與已及第而中途落下者（如開平三年四月勅賜劉同進士及第，而禮部所放進士辟均係左司侍郎薛延規子，方持省轄，因令避嫌，遂令落下），凡此大率係由勅旨臨時行之。

開元禮　貞元二年六月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列，選人不限選數許習，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放及第，以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請學生願習開元禮者並聽。九年五月勅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等，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元和八年四月吏部奏應開元禮及學究一經登科人等，舊例據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緣校書正字等名望稍優，但覆科第，皆求注擬，堅待員闕，或至踰年，若無科條，恐長僥倖，起今以後，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伏請量注校正，其餘四者開元禮人，太常寺官有闕，相當注通經人，國子監官闕，相當者，並請洗授，勅旨依奏。五代之際，亦沿唐制置開元禮科，如後唐長興二年勅明法科與開元禮科，同其選數。

三禮　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人微旨，請貢人參試之曰凡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從之。貞元五年五月勅，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選，吏部考試白身人，依貢舉例，史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選經通三五人聞奏，主司於同試問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等，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請館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

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五代之際，仍沿唐制置三禮之科，五代會要略云：『後唐同光四年正月五科舉人許維嶽等一百人進狀，伏見新定格文，三禮三傳，每科止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餘人，三史學究一十人，若每年祇放兩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舉，伏見咸通長慶年，放舉原無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請依元年例放人，勑從之。三年七月勑，應將來三傳三禮三史開元禮學究等考試，本業畢後，引試對策時，宜令主司於時務中，採取要當策題，精加考校，不必拘於對偶，須有文章，但能詞理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此格，雖本業初通，亦須黜落。』

三傳　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請參試舉人，公羊穀梁帖十通五許其入第。舊唐書長慶三年二月記：『諫議大夫殷侑奏禮部貢舉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唐會要記殷侑奏以左傳卷帙文字，比禮記多校一倍，公羊穀梁與尚書周易多校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授散，若大經中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為傳學者，猶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各問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與及第。其白身應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前資官應者，請准學究一經例處分。太和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定三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學及州府同明經一史，三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史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史部常選人，則史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五代仍沿唐制有三傳之科，如後唐同光元年春榜三傳科放十三人及第，其後新訂格文，三傳與三禮每科止放兩人，同光四年五科舉人許維嶽等進狀，請依元年例放人，敕從之。天成三年三傳與三禮三史開元禮等科考試，本業畢後，引試對策，精加考校（參看以上三禮項）。

三史（一史附）　長慶三年二月諫大夫殷侑奏：『歷代史書，皆記當善惡，係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煜兩漢書，音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世教。伏維國朝政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於身處班列，朝章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及第。能一史者，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有出身及前資官，優稍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慣。』勑旨依之。五代沿襲唐制，仍有三史之科，後唐同光間新定格文三史學究一科限放一人，但旋即寬限。天成三年七月勑三史與三傳三禮等科於考試本業後，又以時務對策，精加考校。

明法　明法之科，在漢代即為察舉之一途。隋唐明法科前後頗有變更，通典謂明法與進士同為二等。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貞元二年六月勅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經，小帖義通者，依明法例處分。五代因之，或停或復，其格例又頗有改易，後唐長興二年六月後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五代史本記）。五代會要記是年七月勅，其明法科令後宜與開元禮科同其選數，兼赴舉之時，委貢院別奏，請會諸法試官，依格例考試，晉天福六年五月勑，明法一科，今後宜令五選集，合格注官日，優與處分。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明法元帖律令各十五帖，對義二十道，今後罷帖律令，試墨義六十道，從之。但至同年八月依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還依元格帖律令各十五帖，對墨義二十道。

明書　通典云：『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此所記當係一時之制，其前後沿革與變化則不可考知矣。

明算　通典云：『為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其間或置或廢（參看新唐書選舉志）。五代後唐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請重置明算道舉。晉天福五

年三月詔能明算道舉百篇等科。是隋唐至五代，歷時久遠，明算之科，其間或置或罷，多所更迭了。

童子　漢代以降，已有察舉童子郎之事，隋唐五代時則有歲貢童子之科。然此科流弊很多，故自唐以至五代，置罷頻仍，楊綰於寶應中奏云：『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舊書本傳）廣德二年五月詔停童子歲貢常科，童子仍限十歲以下者。至大曆三年四月勑童子舉人取十歲以下者，習一經兼論語孝經，每傳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出身，仍每年終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訖聞奏。十年五月停童子科，勑令諸道不得更有聞薦。雖有是命，而以童子爲薦者，比比有之。大中十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童子近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僞稱童子，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日後，望令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須精熟一經，問皆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吏，亦議懲法。從之。五代唐天成四年正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特賜別勑，附名春榜。淸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請童子依舊表薦，又五代會要記晉天福五年四月禮部侍郞張允奏請停廢童子一科，從之。至開運元年八月復童子科。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郞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凡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至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郞知貢舉竇儀奏，其童子科，請依晉天福元年勑停罷，任改就別科赴舉，從之（又五代史本紀）。觀此，可知諸科之中其置廢頻仍至數者，以童子一科爲最。

孝弟力田　漢制孝悌力田依郡國戶口率，置常員。本爲察舉中重要之一科。自此以降，率常見於詔舉。郡國置常員之制則趨廢弛。隋時初亦未嘗定爲歲貢，僅於制舉之中有孝悌力田聞於鄉閭之科，至寶應廣德之際（代宗初），楊綰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主張孝悌力田科宜有官狀（楊綰傳），則似曾一度列爲歲貢科目。但至廣德二年五月詔能歲貢孝悌力田童子等科，是則孝悌力田之見於實施者，爲時不過一二年而已。

萬言　李白上韓太尉書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所謂萬言，初不過文人自誇或譽人過甚之詞而已。但至唐末，則於歲貢之中，似有萬言之科。開成三年十二月勑諸道應薦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卽歸禮部，文辭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令延引，則爲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禁絕倖門（唐會要）。萬言與童子並列，確依科名。然此不過一時之制。就勑文而論，卽在當時，固亦未嘗視爲正途。

百篇　唐甫杜詩云：『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所謂百篇者，不過形容其詩才之敏而且富。但五代時，則有百篇之科。五代史晉天福五年四月紀云：『禮部侍郞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之。』百篇與明算道舉等科並舉，決爲科名無疑。（按宋代猶存此科，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紀云：『夏四月親試應百篇舉，趙昌國賜及第。』）又顧名思義，其所注重者必爲詩賦。此百篇之科名，恰與上舉萬言可爲對文。隋唐貢舉至此，蓋已陷末流淫靡之境矣。

道舉　有道舉本見於制舉之中，但中間又嘗列入歲貢，而與崇玄生舉連類，當時稱之曰道舉，事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其後置廢無常，唐會要云：『天寶十三載十月十六日，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周易，宜以末載爲始，至寶應三年六月二十日，道舉宜停。七月二十六日，勑禮部奏，道舉既停，其崇元生望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五代之際，此科亦有興廢，晉天福五年四月詔廢宏辭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最前曾行此科，至是始廢。

綜上所述，已可知隋唐五代歲貢常科的大概。自隋與初唐的秀才一科沒落之後，諸科之中，最重進士與明經兩科，而兩科之中，又以進士爲尤貴，如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始不以進士擢第。』李珏舉明經，李華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之曰：『日角殊庭，非常人也，當綴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

路。』後班綜應進士舉擢第。又如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者，必嗟息久之（以上參考唐語林）。觀此可知當時朝廷上下普通的風尚。此種風尚盛行的結果，不由科第出身的人士，一班的都認為不是正途，舊五代史周本紀：『顯德元年七月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為樞密使檢校太保，』注引東都事略云：『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何如耳，遂用之。』蓋在已成的社會政治風氣中，除獨特英明之主能注重實際的才用之外，鮮有不為此風氣所溺者。

凡貢舉諸科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與禮部上尚書省參看），但有時派他官知事，或純由他官主持，考試科第之際，有公開的輿論，如考試不公，取士不實，則輿論有喧騰，其黜落之士許披訴，於此之際，則朝廷重加考試，才藝不稱者覆落，考官不公者貶降，蓋舉國上下均趨騖此一仕途，故極為朝野上下所重視。至於各種實際的事例，散見於史志紀傳中者多見，不復縷述於此。

請改貸金為工讀金

湯學耕

因為戰時生活費用的日益高漲，窮苦學生不能維持學業，教部乃有貸金制度的創立。自抗戰以來，多少家鄉淪陷，經濟來源斷絕的戰區同學，和後方家境清寒，無力升學的同學，靠了貸金而得完成學業，國家得以造就不少抗建人才。

但是貸金可以「巧取」，因此便產生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有家產極富者請得甲種貸金，而真正貧寒者，反只得乙種米貼，甚至不得核准，此實天下大不平事。而貸金制之最大危機，則在今日已被一般學生認為應享之權利，許多人本無需貸金者，亦已請得。此種結果，使得一部分大學生認不清義利，養成貪污作僞的惡習。而對真正需要貸金維持生活的同學而言，貸金屬於救濟性質，施之於大學生似不相宜，且難免造成一部分人的依賴性。

所以貸金雖救了不少大學生，却更毀滅了不少大學生。劉英士先生的意見是改貸金為獎學金，他的理由是：「只要運用得宜，我以為至少可以兼收兩利：第一、因為分發給獎係以鄭重舉行的嚴格考試為依據，學生成績愈優，則其可得獎金之機會愈多，所得獎金之數額愈大，故必能收提高程度之效。第二、因為金名既稱獎學，必其所治之學，政府認為該獎，而後可以得獎，故恃獎金名額之分配，很容易使大學各院系科收得均衡發展之效。」（星期評論第四十期「再論貸金與獎學金」）

我的意見以為將貸金全改作獎學金，也不是個至善的辦法。第一、我始終懷疑現行考試制度，是否衡量學識的天平？歷史告訴我們，許多成功者，在學校裏都不是名列前茅的學生。大學教育的目的之一，也似乎在造就些特殊人才。若照現行的考試辦法實行獎學金制，我想有些貧苦的特殊天才，將得不到足夠的獎學金以完成學業。第二、逼得每個人都為獎學金而讀書，沒有一點自由研究的風氣，似乎也不太好。第三、更要緊的是政府財力不夠，獎學金和貸金一樣的不能普及各級學校。連中小學也沒錢讀的人，反不能得到政府的經濟補助，似乎太不近情。

依照個人愚見，不如改貸金為工讀金。辦法是將學校下級員工的工作給貧苦同學擔任，再就學校的實習工廠和農場，添些設備，最好能使新興的生產機關附近學校，並與當地現有之生產機關取得密切聯絡，給同學做些生產工作。設立附中附小及民衆學校，給同學們以工作機會。只要時間支配合適，每天做一二小時工作，當無妨礙。最好的工作時間是在暑假，只要給以工作機會，使其收入足可維持一個學期，而在學期中每天能做一二小時的工作，就可維持當天的生活。

我主張改貸金為工讀金的理由：

第一、工讀非我的創見，事實上有許多大人物由工讀成功。現在因為適合戰時需要，將工讀作為一個統籌辦理有全盤計劃的制度來實行，以增進其效率。只要行之合宜，很可以永遠施行下去，因為不似貸金之另需大筆經費，更可以推行各級學校，教育不難從普及。

第二、請得貸金的學生要勞動服務，他們是已得貸金而從勞動，都覺得勞動是多餘的，大多敷衍了事，毫無成績，徒徒白耗時間，養成敷衍塞責的習性。不如改為工讀金的辦法，要工作才有工讀金，能收到工作的實效。

第三、貸金改為工讀金以後，有錢的少爺小姐們當然不願做事，而勉強可以維持的，也不一定想做事，於是需要工作的是真正清寒的學生，他們是自食其力，得到的是應得的工作報酬，不似貸金之純屬救濟性質，有類「嗟來之食」，以尊重其身分。

第四、在工作中既可訓練為人處世的方法，更可獲得一些工作經驗，使書本上的知識與實際工作連繫起來，大有助於將來入社會服務。

第五、政府所發出之貸金總額雖大，而因申請之人數太多，每人所得之數甚少，真正清寒者倘無法維持生活，於是「盛行兼營副業的風氣，有些副業對於功課沒有妨礙，反可培養一種技能，似乎值得提倡；而有些副業太侵佔了讀書的時間，太妨礙了德性的修養，應該使之根絕。」（星期評論二十五期通訊欄）楊人楩先生說：「貸金制已肇學生作偽之端，倘更縱其貪得奪利之心，則未出校門，即已接近腐化，影響所及，不僅不學而已。」（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桂林大公報星期論文「論大學教育之危機」）我想這些問題，只要能實行工讀金的辦法，都可解決。因為工作報酬比貸金數額高，從事的工作又由教部和學校審慎規定分配，必對其身心有益，不僅不妨礙其功課，且能幫助其所學，也就等於對該項學科之實習；而非學校所核准給予之工作，一概不許從事。

第六、因為貸金數額不多，學生伙食不得不量少質壞。因為量少而爭先恐後地狼吞，消化重任全交付胃腸，於是許多大學生有得胃病；因為質壞而營養不良，抵抗疾病力弱，易患難治不治之症，於是大學生有不少患肺癆的；影響國家民族的前途，殊非淺鮮。此問題雖已為當局注意，且已設法救濟，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然只要能實行工讀金辦法，學生收入較多，即可得到完滿解決。

最後，要聲明的是：第一、我並不否認大學生不應該受國家的經濟補助，只要國家有錢，就是給我們以義務的大學教育，不要我們花費分文，也未嘗不可。第二、我更不主張在沒有比貸金制更良好的辦法出來施行以前，就取消貸金制度。第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況且是先有貸金之制，而後始有騙取之人。所以我希望不應該請領貸金的同學，自動退出已經請得之貸金。第四、工讀金的辦法，實行起來，當不免有些困難，但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似有費力也要實行的必要。不過無論如何，貸金制總須趕急改革，因為「這是一種用意雖善，辦法卻非，亟應根本推翻的惡劣制度。」（劉英士先生語）而我也不敢認為我的意見絕對合理，所以全文有許多「似乎」的字眼，完全以一種疑問的口吻，請教於高明。

二月星座神話

陳遵嬀

二月下午八時中天之星座，有神話傳說可述者爲獵戶，天兎，天鴿，御夫，大犬等座。

一　獵戶座(Orion)

希臘神話以俄賴翁爲美麗勇士或精練獵夫。希臘以前之民族，想像其爲巨人，戰士，武裝之王，或聖者之姿；尊爲武勇，征服或勝利之象徵。詩聖何美羅斯詠爲『最美最高大之獵夫』，係海神普塞同與亞馬孫女王攸琉阿勒所生之子，故有步行海面之能力。

某時戀奇伐斯王俄伊諾比翁之女美羅列，治服蟠行該島之獅子，以之爲禮物，求與美羅列結婚，而女終避之，遂圖以強力佔爲己妻。俄伊諾比翁大怒，以酒灌醉俄賴翁，使其失明，棄諸海邊。盲目之俄賴翁受神佑，按單眼叩克羅普斯打鐵砧之音，到達鍛冶之神赫法斯托斯工場所在地之勒姆諾斯島，扶於工人刻達利翁之肩，向東而行，逢日神，兩目遂得復明。

其後俄賴翁爲太陰狩獵女神阿提密斯所愛，遂成爲獵夫；喧傳將行結婚，而女神之兄阿波羅，大不以爲然。某日俄賴翁僅伸首步行於海中之時，阿波羅映以金色之光，女神不知，放矢誤中之。逮俄賴翁之骸漂至海邊，女神見之，大爲悲痛，求諸大神，列入星座；自以白銀之車，運之上天。俄賴翁之獵犬賽利阿斯（天狼）隨彼而行。

初冬俄賴翁終夜現於天空而狩獵，晨曉沒於乃父普塞同所支配之海面之下。夏朝此星座現於東天，爲曙之女神奧羅拉所愛，日出後，始漸失其光。一說因此之故，女神阿提密斯嫉妬其幸福，以矢射殺之。

他一傳說，謂俄賴翁揚言『世界最強者惟我』，遂觸神怒，使大蝎跳出以螫殺之。又有謂阿波羅與阿提密斯之母拉托那將爲大蝎所殺之際，俄賴翁救之，而己反被螫殺，女神感謝其恩，請求大神，列爲星座。

又有俄賴翁追逐昴星團七姊妹之神話。某日，此七姊妹游戲於野，俄賴翁忽然來近，女等大驚，求救於薛烏斯，大神使七姊妹化身爲鴿而飛逝，成爲昴星團。

我國亦有參商之傳說。獵戶座中央三星曰參宿，天蝎座中央三星曰心宿，一名曰商星。此參與商，原係同胞兄弟，但情感極惡，常爭吵不絕，兄弟鬩牆。天神知之，使兄參現於冬天，弟商輝於夏夜，二人永不相逢。我國古諺稱物之表裏不相逢者爲如參商，即由此傳說而來。

我國又有稱參宿三星爲姊妹三人。某日母外出，來一山姥，三人乘龍升天，山姥見之，執龍下之繩，隨後追逐，繩斷落地而死。姊妹三人遂得平安升天，列爲三星。

此巨人之姿，古巴比倫認爲主神馬爾多克或美羅達克；聖經之尼羅多亦然，其他一切民族，殆咸尊爲巨人，獵夫王者，或戰士之像。

我國參宿（七星），觜宿（三星），參旗（九星），伐（三星），水府（四星），司怪（第一，四星），玉井（四星），屬此星座。

二　天兎座(Lepus)

相傳獵戶俄賴翁喜獵兎，故置於其星座之旁。又一傳說，謂希臘古代西齊利耶島，野兎蔓延，遂置兎於天上獵戶俄賴翁與其獵犬之

闕，乃一種之咒。布朗謂俄賴翁狩獵如兔之弱獸者，乃以俄賴翁象徵太陽而兔象徵太陰之故。又有謂兔嫌烏鴉，誤入烏鴉座，故特現天兔座。我國稱太陽爲金烏，太陰爲銀兔，若相對照，頗饒興趣。

我國所稱軍井（四星），屏（二星），廁（四星），位此星座。

三　天鴿座(Columba)

據聖經所載，諾亞大洪水，世界爲水所浸。諾亞自方舟放鴿，圖知減水情形，但未如願；鴿雖已放，毫無所示，回返方舟。後復放鴿，及暮口含橄欖新葉而歸，諾亞知水減少，大喜。

昔以此星座爲大犬座之西南部分。公元一六〇三年德天文家拜厄獨立設今之天鴿座。拜厄視南船座爲諾亞之方舟，於其附近之此部分，視爲諾亞所放之鴿。星圖示口含樹葉而飛返之鴿。拜厄雖如此命名，後久不爲天文家所用，逮一六七九年法之羅發挨始採用之，故有謂爲羅氏所設之星座，其實則否。

我國所稱屎，夫人（二星），子（二星），孫（二星），位此星座。

四　御夫座(Auriga)

希臘神話，稱此御夫係挨利克托琉斯或挨勒克泰俄斯，乃鍛冶之神赫法斯托斯與地之女神該亞（或雅典那女神）所生之子。孩提時雅典那女神裝之於櫃，交阿格勞羅斯，潘多羅索斯與赫塞，命其切不可偸視。三人爲好奇心所驅使，違命開櫃視之，見此孩提爲蛇所捲，大驚失魂，以至瘋狂，自阿克羅波利斯之岩，投身而死。

自是以後，挨利克托琉斯雖養育於雅典那神殿，但咸爲蛇委。逮彼爲雅典第四代之王，始建女神神殿而祀之。但挨利克托琉斯因係跛者，爲補救其行動不自由起見，發明四馬曳引之車。大神獎其功，使列爲星座。

一說此御夫乃赫梅斯神之子，皮沙王俄挨諾馬奧斯之御夫，精馬術而著名；希臘最著名之駿馬，係由其所訓練者。

首星名卡培拉，乃牝山羊之意，亦有神話可述。即此乃以乳育孩提時代之大神薛烏斯之牝山羊阿馬爾泰耶。大神與山羊相戲時，折斷其一角；大神遂使持有此角者，可任意取其所欲之財寶而無窮。

我國所稱五車（一至四星），座旗（九星），柱（九星），天潢（六星），積水等，在此星座。

五　大犬座(Canis Major)

昔視爲獵夫俄賴翁所攜獵犬之一，他一神話謂爲開法利斯之獵犬勒拉普斯。此青年獵夫乃赫梅斯與赫塞之子，爲曙之女神與羅拉所愛，當其迎迓其妻時，因女神之呪，誤以爲獵，射矢殺之；一說妻誤解與羅拉與夫之交情而自殺。獵犬勒拉普斯極其敏捷，某次開法利斯命犬與狐賽跑，不分勝負，大神薛烏斯遂升犬天空，列爲星座。一說犬與狐，同化爲石。另一神話，謂此大犬乃伊卡利奧斯之忠犬美拉。

首星曰天狼，西名賽利阿斯，乃希臘語『燒焦』之意。昔認爲自天狼先太陽上升之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一日止，天氣炎熱，乃因此星與太陽並懸之故。今英語稱爲『狗日』，即由此而來。古埃及尊爲『尼羅之星』，蓋夏至六月二十日升於東天，示尼羅河之氾濫，此時稱爲狼星年之元旦。又有尊爲地獄犬頭神阿努彼斯之變化者。

汽車行駛方向應否改爲左來右去？

何乃民

總裁著『中國之命運』第一四二、一四三及一五二、一五三頁曾指示中國在最近三十年至五十年內要自己製造汽車七、六七七、二〇〇輛。倘汽車行駛的方向，仍舊如過去的一樣左去右來，那麼這七百六十七萬餘輛汽車的方向盤以及轉向的機構，均應建築在汽車的右

邊。倘將汽車行駛的方向，採用世界各國絕對大多數，改爲左來右去，那麼這七百六十七萬餘輛汽車的駕駛機構，就應排放在汽車之左邊。這個公路交通技術上的重大問題，若在建國完成時提出改換，則費用巨大，損失嚴重；倘若認爲行駛方向應該改換，則現在着手，輕而易舉。

汽車行駛的方向，各國分成大陸和海島二派。左來右去的國家爲大陸派，計有美國、蘇聯、法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時、巴西、智利、瑞士、丹麥、挪威、芬蘭、荷蘭、希臘、羅馬尼亞、葡萄牙、西班牙、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國。大陸派共有汽車約四千萬輛，公路約一千二百萬公里。

海島派爲中國、英、日本、印度、奧國、捷克、匈亞利、瑞典、澳洲、南非洲、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共有汽車約三百五十萬輛，公路約三百萬公里。

大陸派與海島派相比較，各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汽車屬於大陸派，均採用左來右去的方向行駛。

各國汽車協會於一九〇四年組織國際汽車協會聯合會，辦理國際汽車互通事宜。現已加入互通者計有英、法、美、德、意、比等四十四國。一九三七年該會復新訂國際汽車旅行章程，對各互通國間汽車來往予以盡量方便。一九三七年夏初，國際汽車協會聯合會祕書長曾到南京全國經濟委員會與趙祖康先生及本人對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協會作初步的商洽，幷擬於一九三八年舉行國際旅行環球汽車一百輛，經安南而入中國，再由日渡美。後因七七事變及國際局勢之演幻而停止。

這個國際聯合會在公路交通上曾經供獻很多有益的工作：如現在各國所採用的國際公路交通標誌，國際互通汽車號牌，紅綠燈號，國際汽車比賽標準，保護汽車駕駛人利益，國際汽車互通等。關於統一汽車行駛方向問題，會中曾作多次的商討，希望能夠服從多數，各國一致採用左來右去方法。但因保守性成的海島派領導者英國人的反對，迄無成議。

現在美國與加拿大間，汽車互通，日以千計。在戰前英、法、德、間汽車互相來往亦多。這次戰事結束之後，國際間汽車互通將更加頻繁。東三省、新疆、與蘇聯間的汽車來往，定必衆多。因各國間行駛方向不一致，因互通而引起肇禍案件，必日益增高。對國際公路交通之安全殊多不利。際此汽車速率日益提高，地球行程愈見縮短，汽車互通更覺方便，我們希望各國間行車方向能夠統一，國際間汽車來往少去一層重困。

今後一二十年間國際汽車交通之發展，定日趨繁榮。國與國間的汽車來往，好比省與省的汽車互通。倘河南和山西省的行車方向是左去右來，河北和山東省的是左來右去，那車輛的來往是何等的不方便！因方向不同而引起的汽車肇禍案件，一定是悲慘而衆多！所以國際行車方向之統一，將來每年由避免汽車肇禍中減少一萬名死傷人員，幷無足奇。

國際汽車互通，可以交換各國鄉村間文化，提高人類友誼，瞭解各地情感，增加國民收入。巴黎市每年平均有外國遊客二百萬人，市民所得自遊客的消費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倘今後每年有外國汽車一萬輛前來中國旅行，每車中乘客平均在中國化費三千元，則民間每年可增加三千萬元的收益。所以國際汽車互通有着巨大價值，必爲今後交通界所注意而爲加提倡。

各國水上交通均採用左來右去線路。將來國際航空亦當引用左來右去法規。何以陸上公路交通，國際間不能協調，採用統一的行駛方向？這問題當然與英國關係最大。英有汽車二百一十萬輛，所有車輛駕駛的機構製造在車之右，公共汽車的車門，均開在車之左邊。公路上的一切交通設備，如交通標誌，里程牌，車站，交通章程等等均適應於左去右來的規定。若將車輛和交通設備全部改爲適合乎左來右去，這筆改革費用爲數當在百千萬元以上。因改換方向對民衆交通常識和習慣的養成，至少亦需半年之久。所以除非國際間加以巨大的壓

左，或由國際負擔其全部改換的費用；要希望富於保守性的英國自動放棄左去右來的方向，實在是一件難乎其難的工作。

法德人民到英國自駕汽車旅行。回來對人說：『英國人眞好笑，汽車行駛方向是左去右來，專門同我們大陸反對，實在是笑話。』英國人駕車到大陸旅行回來也說：『大陸的行車是左來右去，對我們英國人眞不方便。』這是英、法雜誌時常登載的一段道白。這種方向不統一的不方便，永遠使旅行到國外的汽車界懷着戒心。

為着國際汽車互通的方便，為着採取百分九十以上最大多數汽車所行駛的方向，為着將來中國汽車界一勞永逸的計算，我們建議中國汽車行駛方向，最好改為左來右去。倘這個建議能夠通過，則抗戰勝利後向美國定購大批汽車，可以買到美國本國貨，不若現在所購美車因方向機構不同，專為出口而特製左去右來之車輛；總裁所指示七百六十餘萬汽車轉向機構之設計，可以決定排放在車之左邊；一百六十萬公里的公路交通設備，均可依照左來右去而設置；公路交通法規，人民交通習慣及常識，亦不難於短期內訓練完成。

現在國內汽車數約五萬輛，公路十萬公里，對於改換行駛方向所需費用相當有限，因改換而引起的汽車肇禍，亦易於設法避免。所以這個問題，不改則罷，若要改革，趁早就要決定。決定後我們提議於日本投降之日起，六個月後實行。

中國倘自主自動的改換汽車行駛方向，改為左來右去，則中、美、蘇、英四大強國的公路交通，祇有大英島國是左去的，其餘中、美、蘇三大陸國均向左來的。這對於國際汽車交通統一性的供獻已經很大。在國際交通史上當可留下不朽的一頁。倘因中國自動改換的偉大的領導精神，因而感動世界輿論，促使大英帝國放棄左去右來之綫路，使世界各國服從多數，實現國際公路交通方向的統一，那對於國際上的供獻，當更為巨大。諺云：『大戰之後，興革必多。』我們期待公路界有所興革！

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之投效

余行邁

一

蒙古對金用兵約略可分為四期：即太祖時代三期，太宗時代一期。自太祖五年（金衞紹王大安二年）蒙古與金開始衝突，次年太祖誓師南伐以迄九年與金議和，為蒙古對金用兵之第一期。此期中蒙古兵由西京路入居庸關及紫荊口，然後分三路掃掠河東北山東等地，太祖八年（金宣宗貞祐元年）底各路兵會師金中都城下，次年金求和，蒙古兵飽載而歸。第二期自太祖九年至太祖十一年（金貞祐四年），因金遷都汴梁，蒙古回兵再圍中都，太祖十年（金宣宗貞祐三年）中都陷沒，金不接受「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之罷兵條件，蒙古兵繼續南向：一支軍由西夏趨京兆破潼關拔嵩汝等州，直至汴京附近而還；一支軍由中都南下破真定大名至東平河水為阻，掠其地而歸。同時中都陷沒前後（太祖九年至十一年）又有一支軍經略金北京路東京路及中都路東北一帶。第三期自太祖十二年（金宣宗興定元年）至二十二年（金哀宗正大四年）為木華黎專任征伐時期，先後經略山東河北河東京兆鳳翔等路，至是金只保有黃河南岸一隅之地矣（金時黃河自今皖北蘇北入海）。本期末（太祖二十二年）太祖趁破西夏之餘威，殘金鳳翔臨洮兩路各地，但竟崩於六盤山，遂金之棄

遂留待其子窩闊台完成之。太宗窩闊台甫卽位，卽議伐金，先經略京兆鳳翔兩路及今河南山西陝西三省鄰接處黃河轉向之三角地帶，先後攻拔河中等要地，唯潼關不下，遂令拖雷由鳳翔繞道漢中出宋人之境，由今陝鄂川豫交界處渡漢水入河南。太宗本人則率大軍由洛陽附近之白坡渡河。拖雷一軍至河南鈞州之三峯山，擊潰金之主力，與太宗一軍會師圍汴京。太宗五年（金哀宗天興二年）汴京降，金哀宗奔蔡州。次年蔡州破，金亡。

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投效者頗多，對於兩方勝負之局，影響甚大。上述伐金第一二兩期中，蒙古攻西京路破中都以及經略遼東等地，莫不有投效之契丹人參與其役，並往往扮演主角，有先導之功。今據元史紀傳依其歸附先後臚列此等投效之契丹人於次：

姓名	居地（據地或降地）	降附時期
耶律阿海 耶律禿花	世居桓州	太祖伐金以前
石抹明安	世居桓州	太祖六年
石抹高奴	降於威寧	太祖六年
耶律留哥	據隆安韓州	太祖七年
石抹孛迭兒	降於霸州	太祖八年
孛多及乣軍	降於中都路	太祖九年
移剌涅兒	生於霸州	太祖十年以前
王珣	義州開義人	太祖十年
石抹阿辛（卽石抹也先）	降於北京	太祖十年
耶律楚材	降於中都	太祖十年
石抹大家奴	世居太原	太祖時

契丹人在女眞統治下復國之念，迄未消除。如移剌捏兒「金以爲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元史移剌捏兒傳）。石抹也先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也先幼時聞宗國之所以亡卽憤然吐出「兒能復之」之豪語，及長，「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元史石抹也先傳）。此種反金復國之念，在契丹人中必相當普遍，故當蒙古起兵時，金對契丹人十分懷疑，「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眞戶夾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傳）。金宣宗遷汴，頗不放心於護駕之乣軍（大部爲契丹人，詳後），「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致激起乣軍之叛（元史太祖紀及聖武親征錄）。契丹人既有復國之念，又受金之壓緊壓束，最後不得不投入蒙古懷抱矣。

蒙古既舉兵，辭受金祿之移剌捏兒卽認爲「爲國復仇，此其時也」（元史移剌捏兒傳），一般契丹豪傑卽在此種認定下紛紛投附蒙古。蒙古對於此等契丹人之復仇心理，頗能迎合善用。太祖初見耶律楚材，劈頭一語卽是「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元史耶律楚材傳）。此言充分反映出當時契丹人投效蒙古之動機及兩方合伴之默契。

二

依據前表，降附蒙古之契丹人，其居地據地或歸降之地，大致可歸納爲三個區域：一是西京路區域，一是遼河東西區域，一是河東北區域，前二者乃金之邊境，鄰近蒙古，後者雖屬內地，但亦偏於金之北境，是可知當時契丹人之分佈區域大概不出遼國故壤，契丹人既多居於邊地，對於邊地情勢自甚熟悉，故蒙古踏入金之門戶，攻打金之北境遼國故壤時，乃多借重於契丹人之助力。蒙古伐金始於侵掠金之西京路，西京路之契丹人卽首先歸誠，而世居桓州之耶律阿海耶律禿花兄弟且於太祖伐金以前卽自動降附，阿海向太祖暴露金之弱點，以金「亡可立待」之斷語挑起成吉思汗之侵略野心，蒙古伐金之意，阿海實啓之，故其「參預機謀，出入戰陣，常在左右，」絕非偶然也。其後蒙古兵入西京路，正是阿海家鄉所在，阿海遂充任先鋒，後隨大軍略燕南山東諸郡，又從太祖西征。其弟禿花亦曾爲嚮導，從木華黎收山東河北有功。二人均位至極品：阿海拜太師行中書省事，每宴享必賜坐；禿花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太祖禮之極優渥，聲名

僅亞於木華黎。後扎剌兒（卽石抹也先之子查剌）劉黑馬與史天澤等漢人三大萬戶又由禿花統領。凡此足見阿海禿花兄弟在伐金之役中地位之重要。此外西京路歸降之契丹人尚有石抹明安及石抹高奴，石抹明安曾領蒙古軍撫定西京路各地，並勵太祖一鼓作氣直擣金之心臟，太祖休兵之意以此打消。蒙古伐金，耶律阿海啓其機，石抹明安增其勢，契丹人對金之命運蓋有決定之影響焉。破中都明安爲主帥之一，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此後留守中都之任卽由明安父子世守，明安卒於燕，長子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次子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咸得不任燕京行省時頗貪暴，殺人盈市（見元史耶律楚材傳）。耶律阿海之子忙古台太祖時亦曾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泊等處。燕市要地，既由契丹人總攬其軍政，而其權勢又如是顯赫，可見蒙古對契丹人信任之專（以上分見元史各人本傳及蒙韃備錄）。

三

上述歸降蒙古之契丹人皆屬西京路區域者。西京路之多契丹人及此等契丹人之叛降蒙古蓋有其歷史之背景焉。緣金滅遼後卽以契丹防守邊地，此等契丹人組成之軍隊或謂之乣軍，西京路既爲邊防地帶，自亦有乣軍戍守，其時有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總攬其事。蒙韃備錄謂石抹明安爲乣家人（原作紀家人，紀實乣之誤），可知西京路歸降蒙古之契丹人，恐大多爲乣軍出身。

金代乣軍之由契丹人組成，日本學者箭內亙羽田亨及我國學者王國維諸氏均有詳盡之論證。此等乣軍之防地除西北西南兩路外，尚有東北一路（招討司設泰州今遼寧科爾沁左翼前旗）。金章宗泰和伐宋之役，曾驅西北西南兩路之乣軍以爲前鋒（金史楊雲翼傳）。罷兵後因賞不均俱叛，金發兵平之，遂「散走投於韃人」（大金國志及蒙韃備錄），可知契丹人之投附蒙古，非始於成吉思汗正式伐金之時也。

東北路之乣軍迄金宣宗南渡時仍無恙，蒙古太祖六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會河堡一役之後，金之中都岌岌可危，泰州節度使朮虎高琪奉命調東北路乣軍入衛。蒙古兵入紫荆口，懷來一戰，金之主力卽此部分調來之乣軍。後宣宗南渡，乣軍又爲留守中都之中堅，因抹然盡忠虐殺其中數人，乃叛降蒙古。或謂乣軍隨宣宗南遷，途中宣宗疑之，欲收其兵械，乣軍乃叛。此說不可信，其詳見王國維撰元朝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

乣軍既叛歸蒙古，蒙古遂趁勢回兵再圍中都，而遣由乣軍出身之石抹明安與乣軍合作，中都之克，乣軍之力爲多。此事見於元史太祖紀。聖武親征錄有同樣記載，唯以契丹軍代乣軍，由其所記事實與元史太祖紀相同一點而論，可知其所謂契丹軍實卽元史之乣軍。此卽一般公認乣軍大多爲契丹人之結論的主要根據，叛變之乣軍共推卓多（或斫答）比涉兒，札剌兒爲帥，卓多等之必爲契丹人可無疑也。

乣軍之向背，決定蒙古與金勝負之局。蓋金之末造頗以乣軍爲重。對宋以之爲先鋒，對蒙古以之守衛京城，其作戰能力，必甚可觀。故蒙古太祖六年蒙古嘗別遣至中都城下，首先探問乣軍多寡，鄉民給以二十萬，者別遂退（新元史太祖紀）。乣軍叛後，金宣宗慨然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象多也！」象多爲抹然盡忠之本名，彼應負乣軍叛變中都淪陷之直接責任。高琪既挾乣軍發動政變，又不行宣宗遠徙乣軍於平州之擬議，且杖殺提出「乣軍不可信恐生亂」之忠告的耆生樊知一，故應負乣軍叛變中都淪陷之間接責任。乣軍叛後，中都陷沒，蒙古與金興亡之，命運從此確定，是以金宣宗斥高琪象多爲「壞天下」之罪人（以上統見金史朮虎高琪傳）。乣軍既有如是舉足重輕之勢，金方乃於其叛後力求挽回之，高琪曾遣移剌塔不也往招，終功（金史高琪傳）。金宣宗興定二年移剌福僧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乣人。……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金史移剌福僧傳）。乣軍對殘金竟有收復失地轉敗爲勝之決定力量。然大勢已去，挽回已不可能。而乣軍本身則因有獨立之傾向後爲蒙古拆散，分賜孛兒出與木華黎等功臣，竟不復自成一軍矣（見王國維：元朝祕

史之主因亦兒堅考）。

四

乣軍中之契丹人既斷送金之中部，另一部分契丹人又斷送金之東北地帶，王珣率衆降於義州開義（今遼寧義縣南四十里），石抹阿辛（即石抹也先）率北京等路降附，又隨木華黎計取東京。而耶律留哥崛起隆安（今吉林農安）韓州（今遼寧境內），聲勢最大，「營帳百里，威震遼東，」亦降於蒙古。此等契丹豪強之歸附大概均在蒙古太祖十年左右，正是蒙古經略遼河流域時期，蓋蒙古之經略東北，原係乘其地契丹人之叛而始著手也。

耶律留哥既降蒙古，無異與蒙古一有力之臂助。故蒙古頗欲以經略遼東之責屬之。金方對於留哥之叛亦極為重視，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令宗顏承裕完顏綱，「帥軍六十萬號百萬伐留哥，並聲言有得留哥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戶，」留哥求援於蒙古，與蒙古兵合力抵禦，承裕大敗而還。蒙古太祖八年（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三月留哥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以隆安為中心，建立一小朝廷。其部屬下蓋全為契丹人，留哥稱王之年的二月與五月，金廷曾兩度下詔撫諭遼東，後一次曾明示「詔諭咸平路契丹部人之嘯聚者」（見金史衛紹王本紀）。由時地相合推之，可斷言所謂契丹人之嘯聚者當即指留哥部衆。留哥又敗金宣撫蒲鮮萬奴之兵，奪咸平東京兩大重鎮，而盡有遼東州郡，擁衆六十餘萬，並於蒙古太祖九年（金宣宗貞祐二年）遷都咸平，號為中京。隱然與金蒙古成鼎足之勢。太祖十年（金宣宗貞祐三年）留哥朝見太祖，太祖破例首先接見，鄭重收下其貢物，「白之於天，而後納諸庫，」賜以金虎符，封以遼王，禮遇極優渥，但留哥部衆則反對降附蒙古，乃趁其朝覲太祖之罅隙，突然離叛。此後遼東又經過數年之擾攘，此契丹小王國，不斷自相殘殺，王位為爭奪目標，而蒙古則因錦州張致之亂無暇顧及，直至太祖十二年（金宣宗興定元年）蒙古兵始會同留哥，蒲鮮萬奴（女真人亦稱王遼東），及高麗之衆收拾遼東紛亂之局，而契丹殘餘部衆逃入高麗，又開蒙古經略高麗之端（以上大部見元史耶律留哥傳）。

五

以上略述契丹降人在攻城略地方面對蒙古之助力，一言以蔽之，蒙古之取金西北東北及中都路等地莫不由契丹人為之先導。其次在蒙古開國規模方面契丹人亦有其有歷史意義之貢獻，作此貢獻者即為耶律楚材，關於耶律楚材之功績，論者頗多，茲不復贅，此處須特別指出者即楚材所以得蒙古太祖太宗信任之由，約略可歸納為下列三點：

（1）蒙古原有巫教之原始信仰，巫者頗得寵信，往往用事，如元祕史所述之闊闊出與豁兒亦等，佐太祖決定大計，權勢炙手可熱。耶律楚材雖係儒者出身，但於天文術數亦極精剴，術數之學與巫道頗為相近，均能預言休咎，楚材即以此見幸於太祖，元史本傳記此等預言休咎之事數見不鮮，足以證明。（2）太祖崩後，楚材又侍太宗，以倡尊君卑臣之禮大得太宗歡心，太祖即位時，楚材勸太宗之兄察合台率臣下拜，王然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故太宗退朝喜不自禁，撫楚材之背曰：「眞社稷臣也。」楚材既倡尊君卑臣，自此一義出發，楚材又反對蒙古傳統之得地分封制，主張即封之亦應由朝廷直接徵其貢賦。（3）楚材又定稅制，以實利動蒙古太宗之心。先是蒙古有人以為漢地漢人無用，倡殺盡漢人，廢莊稼闢牧場之議，為楚材諫止。楚材就原有人地，用士人分十路徵稅，無何十路均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太宗深為驚異，大服楚材之能。此外楚材更倡儒學，定官制。凡此種種皆中國歷史上一朝開國必有之措置，而楚材一一奏行之。元之得國，楚材厥功甚偉。故西洋史家謂蒙古開國，軍事上有成吉思汗，政治上有耶律楚材(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Chp. III)，洵為的論（以上均見元史本傳）。

六

蒙古入中國，其文治武功，旣以契丹人之助力而奠定基礎，則其遇契丹人之特別優厚自屬必然。綜上所述，契丹人所受待遇之優渥遠爲漢人（狹義的）所不及，第一：耶律留哥之爲遼王，耶律阿海禿花兄弟及石抹明安之受封爲公，蓋爲太祖太宗時代漢人（廣義的）中所僅見，在此時期唯契丹人有此地位。第二：太祖太宗兩代以石抹明安父子等世守燕京要地，太宗時代以札剌兒史天澤劉黑馬三萬戶統漢兵，而以耶律禿花繼領之，又以耶律楚材爲第一任中書令，可見在此時期契丹人實分有一部分軍政大權。第三：蒙古之視契丹人，往往有「自家人」之概，如太祖稱耶律留哥之子薛闍「今爲蒙古人矣。」（元史耶律留哥傳）大概此等人受一種準蒙古人之待遇也。

蒙古所以特別信任契丹人之由蓋有三端：一者：契丹與金爲世仇，故知契丹人必可效死擊金。二者：契丹人之歸附多係出於自動，非爲被迫，可見其歸心之誠，此點蒙古太祖頗爲重視，當耶律留哥入見時，太祖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耶律阿海奏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其先留哥」（元史耶律留哥傳）。三者：契丹人往往以歸附而遭受重大犧牲，如耶律阿海歸附後，妻子爲金拘繫，阿海不顧（元史耶律阿海傳）。耶律留哥入覲時部衆離叛，家孥亦被執（元史耶律留哥傳）。蒙古由其犧牲而見其忠心，故特別寵信之。契丹人卽憑藉此種寵信得復其世仇，但卻未曾復其國，故究其極仍不過爲人作嫁而已。

明紀輯略與朝鮮辨誣

王崇武

明紀輯略十六卷，淸上虞朱璘靑巖撰。前有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張英序。靑巖初倣紫陽綱目體撰歷朝通鑑輯略四十卷，迄元末而止。玆輯上起太祖，下終三王（福唐桂），於明代史事之大綱鉅目燦然具備，蓋以續歷朝通鑑者。乾隆間嚴禁野史，此書曾列入禁目。余所見者爲中央硏究院史言所所藏刻本，每卷首行有「重鐫朱靑巖先生擬編明紀輯略」標題（原刊本爲「新鐫朱靑巖擬編明紀輯略」，今目錄標題倘未改），書中「胤」字避諱缺筆，而「弘」字不避，知爲雍正間重刊。據翻後刻者與原刊本及舊鈔本不同，蜀中無從假善本相校，亦無以驗其然否也。

此書係靑巖爲南陽知府時所編（靑巖以康熙二十九年任，見河南通志職官表），以僻處州邑，見聞不廣，故舛陋乖盩之處自亦不足深論。所可注意者，中記朝鮮史事頗招彼國不滿，至遣使臣辨誣。此事中國史籍如東華錄（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丙戌條）、淸朝文獻通考（卷二九四朝鮮傳），淸史稿（屬國傳卷一朝鮮）等書雖亦有記載，惟一般略不詳，非得朝鮮官錄互勘，無以明其眞相。

明紀輯略卷二，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載：

高麗國相李仁人囚其王禑，而立禑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來貢。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院君王瑤主國事。

又卷十三天啓三年五月：

朝鮮國王李琿爲其姪李倧所篡。原注琿前王李昖次子，性仁柔，倧其親姪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琿左右掌管誥令。火春，琿疾，遂萌異志，調平山節度使李貴帶領兵馬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琿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初九日，在宮中舉火爲號，倧率貴等以救火爲名，領兵入宮，縛琿投烈焰中死，盡殺其世子宮眷及親信之人，令太妃數琿罪惡，追廢之。本月十三日，倧卽王位。……登萊巡撫袁可立疏言李琿襲爵外藩，膺皇祖

誥命，已十五年，雖曰柔懦，未聞大過。自遼東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其意可嘉。如果不道，應聽太妃具奏，靜候朝廷處分。今以臣簒君，以姪殺伯父，所當急爲聲討以振皇綱者也。若爲封疆多事，未暇興師，當遣使宣敕，明正其罪。若果出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遜位待命，然後徐頒赦罪之詔，如國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議也。……

案紀略以李成桂爲李仁人子，出於陳建皇明通紀。建爲嘉靖間人，蓋本之明世相傳舊說（最早記載始自皇明祖訓）。此事朝鮮國王自永樂以還卽迭爲辨正，至萬曆修會典時已允更正（正德會典尙未改），建時不及見到，故立論猶如是也。至注中記李倧簒位，係採自畢自嚴朝鮮情形疏（見石隱園藏稿卷四），而袁可立奏疏則載於熹宗實錄，兩疏均轉引於皇明從信錄（陳建原著沈國元增訂），及皇明十六朝廣彙記（陳建原著，無名氏補纂），時靑巖未必見及實錄與畢集，然既做紫陽綱目著書，從信錄廣彙記皆編年體，詎不應不參考（康熙間兩書尙未被禁，皆易得）。意其史料之所從出。

畢袁兩疏皆有渲染太甚之辭，然大體論之，尙去史實不遠，吾人試收熹宗實錄天啓三年四月戊子條所述朝鮮簒位情形，與錢謙益初學集卷五十三譚昌言墓誌銘、卷四七孫承宗行狀、黃道周漳浦集卷十一論朝鮮不宜廢立其主檄、卷二十五袁可立傳及李應昇落落齋遺集卷一撫時直發狂愚疏相比較，卽可得一有力佐證，明史之依違其辭若蓋有隱也。

此書流布朝鮮，曾引起軒然大波，玆擇錄朝鮮實錄所載者，藉徵此重公案之原委。

英宗李昑實錄卷一一六，四十七年卽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庚申，前持平朴弼淳上疏，略曰：「臣於昨日偶伏見自燕來綱鑑會簒繫以明史者，卽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而所載我朝事，有璿系罔極之誣，爲我東含生之類者，驚駭痛迫，當復如何。粤在先王朝累以此申辨於皇明，至有會典昭雪之事，則天下後世宜無此等文字，而今此一書出於大學士朱璘之手，禮部尙書兼管翰林院僉事張英爲之序，作爲信史，與草野之書有異，而國系之誣尙如此極，伸辨昭晰之道決不可一刻遲緩矣。」疏入，上命承旨讀奏，拍案大驚，卽命朴弼淳入侍，又命左議政韓翼謩禮曹判書元仁孫入侍，考見弼淳所納册子，翼謩等曰：「非別事也，乃宗系事也。」弼淳曰：「宣廟朝辨誣事，臣亦聞之，此乃康熙年間所撰，而復有罔測文字，故臣不勝痛迫，有此陳章矣。」上曰：「是乃正史耶？」翼謩曰：「雖已辨誣，草野則尙傳叵測之說，故作史者鳩合簒輯，而決非金櫃之文矣。」上曰：「如此則無辨誣事矣。」翼謩曰：「然矣」。弼淳曰：「雖非正史，亦可謂信史，而傳於天下後世，則其痛迫如何。」上曰：「此言亦不無理矣。」又教曰：「此册借於誰家乎？」弼淳曰：「借於錦城尉朴明源家，而其家亦轉借於他處，故未及還卷云矣。」上曰：「以使臣求出如許册子者，抑何心耶？」仁孫曰：「買來全秩，故初不考見。若知有此說，則渠何敢一刻留置乎？」又教曰：「今聞朴弼淳之章，玆事莫重，不可不博詢。明日崇政殿時，原任大臣備堂三司入侍。」

辛酉，上御崇政殿，諸臣入侍。上曰：「幾年辨誣，已載正史，則雖夢寐中豈料有此事耶。左相謂不足辨誣，夜臥更思，則此書留置宇宙一日，則一日不孝也，二日則二日不孝也，卿等各陳所懷焉。」領議政金致仁曰：「一番陳奏，似不可已矣。」左議政韓翼謩曰：「駭痛則極矣，正史已頒，昭如日星，則此不過彼人私自記述以爲取利之資，其不足信明矣，何如是過煩聖心耶。」上曰：「左相之言甚緩矣。」右議政金尙喆曰：「不勝萬萬驚痛，而旣非正史，則今無辨誣之端，遣使陳奏後，焚書毀版好矣。」致仁曰：「非但焚書毀版，必請罪朱璘然後可也。」上曰：「自此先罪賀來使臣，然後可以有辭於彼國矣。」諸備堂或言宜請焚書毀版，或言宜請朱璘罪。翼謩曰：「雖請焚書毀版，彼之聽否未可必，故以是爲慮矣。」副應教鄭象仁請其時三使削職，持平宋德基請極邊遠

寘，上皆不答。教曰：「嗚呼，兩次辨誣後，其誣快雪，昭如日星，則今者此書誠萬萬料表（謂出乎意外也，朝鮮文義如是）。昨聞此事，心骨俱戰，其中一字戊子所無之事，此等文字雖得於燕市，敢煩以置，先罪我國使臣，續當奏聞。嗚呼，得來使臣削職之請，甚無倫理。遠竄之請，雖勝於此，嗚呼，雖不能挺身赴燕，買來朱璘肉皮，爲今日入侍三司焉敢不齊聲請討其時買來三使臣，亟施栫棘之典，入侍三司並削職。使名曰陳奏。……使臣復命，雖不可預待，渡江然後可食可寢。拜表日子今月內擇入，自今日減膳撤樂。朴弼淳特爲加資。」仍命諸臣考見輯略中所印圖署，即徐宗弼也。上使承旨出去金商門，其誣語所系之處，先洗草，後付丙。

壬戌，持平洪彬啓：「璿系快雪之後，書之正史，昭如日星，」而意外無倫凶書貿諸燕市，宗誣罔極，擧國痛迫，貿來使臣既命栫棘，則印章糊續之人，不可以已故置而不論。請故牧使徐宗璧追奪官爵。」允之。上曰：「使行，官銀不可不持去耶。」領相金致仁曰：「諸議以爲前後有事之行輒皆持入，獨於今行空手入去，不能無慮矣。」上問其多寡，致仁曰：「前例則多準萬數，而此則似過限，以七八千恐好矣。」上許之。

癸亥，教曰：「此書一部留在國中，則豈陳奏之意乎。其令今日內自現。」另飭京兆仍命二十年爲副使書狀者若有此册，即爲持納。今日自現者宜有參酌，特除申晦爲漢城判尹，令曉諭五部，時士夫中庶家有此册自現者，相繼積於尙書省。

上御典設司，拿入五部官員，嚴飭自現。

上御建明門，自現人俞漢吉等並命拿入。教曰：「朴弼淳陳章之後，尙留置家中，彝倫斁矣。事當一並亟正邦刑，而既已自現之後，並置一律，非但王命之道，亦不可循例白放，或施刑訊，或施島配之典，貿來譯官並於海島爲奴。

丙寅，京兆，以明史綱目中有朱璘文字爲奏。教曰：「今聞李玄錫所撰明史綱目有朱璘之言云。此非聖賢書，不過予嗣服後命刊者，既聞之後，不可置覆載之間，一併洗草。」

丁卯，上幸慕華館送陳奏使。……教曰：「事若不諧，則伏於闕外，期於得請也。」正使金尙喆曰：「聖教至此，臣以燕武十九年期之矣。」

奏文曰：謹奏。爲事關先故，敢暴至懇，冀蒙矜許事。竊照小邦恪守藩服，世受皇恩，有叩必應，無願不遂。今臣有切骨之痛，腐心之冤，而徒懷僭越之懼，不思伸籲之圖，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也。臣今始得見聖祖仁皇帝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紀輯略，其中載臣國祖康獻王諱宗系及臣四世祖臣莊穆王諱事蹟，而悖謬無倫，汚衊罔極。五內驚悼，寧欲無生。是書之成已七十餘歲，流傳小邦亦不知爲何年。而祇緣臣誠孝淺薄，不能早自覺察，登時陳籲，此尤臣私自痛恨者也。蓋康獻王宗系之誤書於明朝會典，實由於高麗末奸人等之陰逞醜誣，而自臣先祖恭定王諱以來積誠祈懇，至神宗戊子快許刊正，仍賜成書。莊穆王事蹟之謬錄於十六朝紀，亦由於椵島將毛文龍之晴肆譖搆，臣於世宗憲皇帝丙午專价籲天，遄蒙允可，既至我皇上頒示正史，昭揭日星，小邦之前後受誣，至此而渙釋無餘。仁恩所暨，幽冤克伸，擧國含生，莫不口頌頂戴，竊自幸其可以傳信於今與後，則顧此輯略不過朱璘私自集纂，非可擬議於國乘不刊之書，而因訛襲謬之說，尙在卷帙之中，傳布市肆之間，臣之崩迫寃憤，庸有極乎？然璘之是書蓋有所從來，明人陳建所撰皇明通紀亦有小邦宗系罔測之言，而其書起洪武，而止正德，想是嘉靖間所編，而小邦之得見，乃在明朝昭晰之後，伊時小邦之人咸謂會典之誣既正，則爲此說者將歸於自起而自滅，故不復以辨明爲事。今以朱璘之書見之，概是掇拾於通紀，則又安知此後必無襲璘而爲之說者乎？此臣所以每欲拔本而塞源，並擧而仰請者也。臣竊伏念一部明史始承先皇帝明命，終蒙我皇上恩頒，其記載之光明，事體之尊嚴，顧何如也。而乃以此等誣罔之書公行需貿，無所顧忌，則其爲壞亂昭代信史之規，大違一統同文之義者，亦豈細故也哉。臣

自見此書，憤懣膺中，當食忘食，當寢忘寢，若使此書一日留在於天壤之間，則臣將何顏而歸見臣先祖乎？茲敢涕泣齋沐，瀝搯血懇，身雖滯東，心則拱北，伏乞皇上俯察小邦倫義之所係，特軫聖朝史例之至重，上項所陳通紀輯略二書中悖謬之有關小邦者，頒降明旨，並行刊去，以慰微臣冤鬱之情，則東土臣民謹當生隕死結，以酬天地曲遂之恩矣。緣係事關先故，敢暴至懇，冀蒙矜許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原注「藝文提學蔡濟恭製」。上教曰：「嗚呼，朱璘罔測無倫之書，豈可一刻留於覆載之間。朱璘張英雖不能食肉寢皮，賣買其文者同日正法，可代朱張。此專由於國人務時體之弊，本事今可謂妥帖，以此觀之，此書之傳布外方焉知無也。申飭諸道兩都皆令火其書，若有隱匿者，以逆律重繩事嚴飭。」

戊辰，前參判嚴璘改名璹，蓋以與朱璘同名，故大臣陳達改之。

己巳，命追削故判書李玄錫職。以玄錫所纂明史綱目附朱璘之評，故有是命。

六月辛未，上御建明門，時象諱與册僧之以不納青菴集，裸體反接，列伏於爀陽之下，危死者迨近百數。

乙亥，上曰：「因一凶璘，遂使明史泯沒於我東，可勝嘆惜。」命洪啓禧裒集皇明記蹟諸文字，取來鼎足山史庫所藏明史綱目增删編摩，俾成一統信史。

卷一一七，同年七月甲辰，新刊明史綱目，命藏於五處史庫。……上以故判書李玄錫所撰明史綱目有朱璘名，初命洗草，使洪啓禧改纂，後悔之，只去朱璘評，仍舊本新刊以頒。九月辛酉，上出御憶昔窩，引見大臣備堂，使藥房提調蔡濟恭讀陳奏使先來所賫回咨。其文曰：「禮部爲議奏事。查朱璘紀略於乾隆二十二年經陞任浙江督撫臣楊廷璋等奏請將板片書本通行查繳銷毀在案，其陳建通紀臣等遍訪京城內外書肆，並無售者，是二書在中國久已不行，更何所容其改削。至該國王所稱書中誣衊其國祖康獻王世系及其四世祖莊穆王事蹟二條，伏查雍正四年經該國王奏請昭雪，蒙世宗憲皇帝宣付史館，詳加稽核釐正。今恭閱欽定明史朝鮮列傳載其始祖世系及國人廢琿立倧處，考據已極詳明，所有從前野史無稽之談，悉已剖白删除。復於乾隆三年蒙我皇上允該國王所請，將明史內朝鮮列傳刷印頒給，凡該國之受誣於當時者，業邀伸雪於聖世。今此奏辭雖甚懇切，亦何過費無窮之慮乎？至該國王既奏有頒發史傳，自當欽遵刊布，使其子孫臣庶知所信從，以敬承天朝德意。若陳建通紀朱璘輯略二書該國或尚有流傳，自行查禁焚銷，永杜疑竇，則直史垂萬世而日月常昭，屬國守一編而蒙翳盡釋矣。是否有當，伏候皇上訓示，俟命下訓知該國王欽奉遵行等因，於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於本月二十二日，由行在禮部移送到部，除抄錄原議並欽奉諭旨行文直省各督撫，將前項曾經禁止書籍，或有銷毀未盡之處，再行申禁，毋許私藏，通行曉諭外，相應知照朝鮮國王遵奉施行可也。須至」云云。濟恭讀訖，上疑其未盡善，問濟恭曰：「明白乎？」濟恭對曰：「語意明白，似無加此矣。」上曰：「似特旨乎？」對曰：「其曰由行在禮部移送云者，明是特旨矣。」時清主在熱河，距京數日程，故行在云耳。上曰：「今則更無憾矣。」大臣以下頓首稱賀。教曰：「昨聞事則雖成，其猶未快，今日令讀狀本，自此以後，專對之意快伸，噫，幾日用心，於今渙然冰釋。該部議奏特爲申禁，倍於所請，自此以後庶有歸拜之顏。」

觀此，知以輯略之故，至於刑懲挾書之人，盡燔舊藏之籍，重編已定之史，派遣辨誣之臣。具徵其對於此事之注重。朝鮮受儒家思想薰陶最深，於隱惡揚善，迴護尊親之事，視中國尤爲倍蓰，王室者，一國風俗習尙之代表，自於此更斤斤注意，上例其一端也。

又據朝鮮實錄載，使行曾攜賄金七八千，此其所以速爲允准，重申禁令歟？（朝鮮實錄載國王曰：「所請只是銷燬一節，而彼國則至爲申禁，若是曲盡，誠意外也」云云，蓋亦始料所不及。）則又非中

國記載所可考知者也。

青巖以貢生起家，歷官武昌同知、南陽知府，有政聲（朝鮮實錄謂爲大學士誤）。其事蹟具載章實齋湖北通志檢存稿嘉慶上虞縣志及清朝耆獻類徵。查昇鄂渚紀聞詳載其在武昌陷賊，不屈，頗爲時人推重。父雖祚講學東山，發明紫陽之旨，青巖通鑑明紀之作，蓋亦得自父傳。所纂除上舉兩種外，尚有諸葛武侯文集二程文略八大家古文適諸書。康熙南陽府志錄其所作詩文甚多，皆清麗可誦云。

文學的時代

姜蘊剛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

一

所謂文學的時代是從兩方面講：一是說人類時代是該在文學的階段中發展；二是說人生與社會由文學來表現，比較充實與有力量。

人類發展史應該爲四個階段：一是神話的階段，二是意義的階段，三是理智的階段，四是情緒的階段。這第四個階段正是藝術的階段，也就是文學的時代。

神話的階段，是純感情與純感覺的，所以整個宇宙現象都趨重於神話的解決；意義的階段則在尋求原則的發展，而不滿意於神話的說法了；但原則的存在，未必全然合理，於是求實證的心理是人所同具的，這是理智發達的階段；不過理智仍不會是人生的，也不能滿足人生的，這樣有復活感情生活的傾向，可是純感情，并不能配合文化高度發展後之全部人生，所以情緒的階段發生了。情緒是還元人生，完成人生，充實人生，促進人生的。情緒乃感情深化，複化與系統深刻化後一種情態之出現，使這種情緒能夠盡量無滯礙表白出來的便是藝術，在文字方面的曰文學。所以我們把這個時候叫着文學的時代。

二

文學的時代不僅繼理智與意義兩階段而起，也就是爲克復神話階段之復活而起。現代人已在迷惘中欲回到神話時代了。世界上獨裁政治之產生，就是傾重於神話時代復活之表徵。獨裁主義的發展及維持，純以神話爲其中心之特質。要是在獨裁政治中抽去其神話性的部分，其間就并無其他可說的了。神話，就是以神祕的魔力去牽織成他的綵網。好像是電影幻想曲中荒山之夜（Modassorgsky's Night on Bald Mountain）中所表演的一般，這種妖魔鬼怪的幽窶，是經不着光明之熱力的通射而消失的。光明的熱力不是原則，也不是理智，正是人生的情緒。惟有情緒可以壓伏感情，可以使感情起昇化作用。情緒的表現是一篇詩的，戲劇的，小說的，乃至於小品散文的；而感情則只是一陣怒吼，突擊，號哭，乃至於流血漂杵。可是在後者之世俗的不少之表現，又無影無蹤了，人間不曾浮動着何種長遠或偉大的波浪，這是虛擲，衝動，獸行的浪費而已。荊軻、聶政、田橫五百之死是有異於此，他們這樣表現是詩的，戲劇的，小說的，而不是一種屬之於純感情的。尤其是田橫五百之死，是一篇可痛讚的長歌行體的文學傑作。卽以最徵末的歷史事實而言之，陶淵明不爲五斗米而折腰的行

徑，正是一篇很精美的小品散文，你何必還讀他的歸去來兮辭後，方稱他為文學家呢？唐荊川就說過：『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拈來，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

我們以為有文學情緒的人，是不會刁鑽古怪，卑鄙齷齪的。心境既已經非常幽美，行為當然更非常豪慨。既不肯做損人利己的事，也不肯有入主出奴之見。坦白的，熱烈的，直率的，絕對排除陰謀、虛驕、偽善種種反人情的惡行。惡行的表演，最容易以神話的感情為護符，所以羅蘭夫人上斷頭台時，要仰天悲呼曰：『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皆假汝名而行之！』隨園詩話中言：『人心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

三

既說是文學的時代，當以情緒為主。在此天下滔滔的時候，不管是為民族，為人類，為社會，乃至於為着自己，若無『民胞物與』的胸襟，這個時代是無多少希望的，在第一次歐戰前，即以世界文學界而論，只有古典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橫行，否則便是唯美派，惡魔派，高蹈派的放蕩，所以激起了人類的戰爭。戰爭開始進行後，愛國主義與悲觀主義的文學作品一時甚盛。但在戰後，則文學界又走向未來派，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新即物主義諸方面去。於是不僅文學的時代建立不起來，便連文學界，也是烏烟瘴氣的見不着真面目了。

我們以為藉此次大戰中，要把真實的人生之光明的途徑指示出來，要使任何人深切的體驗到人生之高貴及其價值的存在，而向偉大的非獸性的人生前途邁進。

惟有這樣，可以減免下一次更殘酷的戰爭，否則，此次戰爭未了，而下一次戰爭的因素已醞釀成熟了，於是人類便永遠為戰爭所蹂躪與犧牲下去。

所以在另一方面，便當注意到文學的表現了。文學的表現，當以昭明太子的話說得好，他說的文學是當：『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我以為這可以抵得過千百條古今中外許多文學定義。這話包含了文學的四個重要因素：內容、想像、情緒、形式。

用這樣的文學表現來報道各種人類的現實，這就是人類前途的一種指示了。這便是歷史藝術論的。

事實上，這已經是一種趨勢，不過在我是加以提明而已。

我在歷史藝術論再版序中已這樣說過：『世界上原有許多人是主張歷史藝術論，尤其徹底覺悟到人生之真象的人，無不流露出個人歷史藝術論的認識，尤其是目前世界之動亂中，人生宇宙的本來面目暴露無遺，若必要有所認識的話，又必然是歷史藝術論的。試讀時下許多有價值的歷史作品及一般散記載，差不多全都是富於歷史藝術論的作風。其所以受歡迎及使讀者發生很深印象的原因，就全然出於他不是呆滯的公式手法，或論證意義的解釋，而是活潑潑的一件藝術品，因其內容及形式都是藝術化了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歷史藝術論的發展，正是在一方面說明這時確是文學的時代，在他方面說明這時的各種新聞消息，乃至講演論文都必是文學的表現才有力量。

四

專就文學來說，我很注意中國古代詩賦兩部門。陸機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尤其是賦體，我覺得是中國文學中的最大特色，也是凡治文學的人應該有的訓練。『昔人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因賦者鋪也，必鋪張其事，而盡量括展其胸臆的境界，這就無怪班固兩都賦，必至十年始成。後代賦體已濫，可以不必論，若就宋玉風賦而言，總算把風的形貨說得很盡緻了。六朝時代，江淹恨賦別賦最為出色，在恨賦中，其寫各種色人之恨，令人讀

去，眞不禁『冷水澆背，熱心頓解，』『英雄昏涕』！全文起迄，固皆以恨字點出，而其神氣音節又皆塡入恨字，故爲其創格，不怪人說江郞夢筆生花。尤於別賦，開始四字，卽『無限淒涼』，而寫出各種別情，都不離『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一句。賦至庾子山的哀江南賦，就在今天的許多『歷史藝術論的』著作如莫洛亞的法國的悲劇，幷不能超過他。所以我覺得古賦雖不必作，但古賦的訓練則不可少。

比如我剛纔說到的莫洛亞等，總算此次大戰中報告文學中的有色人物，一方面看去全然是『歷史藝術論』者，在另一方面正像是受過中國古賦之訓練的人物。事實上，當然不會有過眞正的中國古賦之訓練，連『歷史藝術論』的名詞也未必知道；但是無關，正因爲如此，就足見我的說法是一種時代共同的眞理。這個表現，正是我所說的文學的時代。

像蘇聯愛倫堡著不是戰爭的戰爭，也是寫法國悲劇的，他寫巴黎陷落的前後，使我們旁觀者讀起來哭笑不得。法國人在戰前戰時的種種夢憧現象，在巴黎陷落時還是夢憧的情況，好像太滑稽。愛倫堡用着江文通恨賦別賦的體裁，寫着巴黎未陷落前各種各色人的夢憧、腐敗的狀態，我們摘錄點來看就知道了：

『德軍進入巴黎後，發展千萬噸閒置了將近十年未用的電車鐵軌。

『戰前照樣忙工作，準備晚餐，消夏節目，賽會和別的事情；單只沒有準備災難的到來。前一年馬賽大火，百萬人口大都市，卻找不到雲梯和喞筒，不得不去請里昂的救火隊，在這時，馬賽一直在火燄中……

『每個人都看見法蘭西準備戰爭，但這是欺騙，而且主要的是欺騙自己。

『當達拉第從慕尼黑回巴黎時，看見飛機場擠滿人，心裏吃驚，以爲人們會用爛蘋果擲他，而人們卻投之以鮮花……

『得到了慕尼黑經驗後，法國不相信戰爭的眞實性了。……戰爭開始了，但巴黎咖啡館的戰略家卻堅決相信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芬蘭人，挪威人，甚至烏拉圭人都會捲入戰爭，只法國人是例外。

『……盡可能少想戰爭……

『正月裏，政府因爲戰爭還很遠，而春天轉眼就要到來，所以開始部份的復員，好讓農民解除軍役，「我們那些可憐的士兵們都很厭倦，他們需要娛樂。」報紙上這樣嘆息着。……

『當巴黎半個月光景買不到咖啡的時候，巴黎人就大爲生氣了：「全是那些波蘭人惹來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全世界各種語言播送着巴黎餐館的菜單……樂天主義者的巴黎人……他們唱着希佈萊的「巴黎將永遠是巴黎」……

『新聞紙都墮落得可憐。他們不曉得寫些什麼：既無戰報，而要寫一篇卽使是短短的敍說所謂「戰爭目的」的文章，又是那樣難，實在既無戰爭又無目的。報上以侮蔑和讒謊塡滿篇幅。

『戰時政府莫有什麼舉措，在許多地方，縣長與市長第一個先逃……』

這種『歷史藝術論』之賦體的報道，實在使我們的印象特別深刻，也就無形中指示了人們以應該要走的路道。

五

在這個動亂的大時代中，實在是『歷史藝術論』者最活躍的時代。許多零篇亂簡不必說了，只就已經整部出版而使世人最歡迎的現代著作，應該是漢德生的使德辱命記；此外專門作新聞記者的著作是根實的歐洲內幕與亞洲內幕，薛萊的柏林日記。

無論如何，這些著作的影響都是不可估計的，都是令世界人對於時代及人生有了深刻的認識。其中有無偏見，我們姑且不管，反正這種作風是時代共同所需要追求的。

像那種格格塞塞而以爲是載道的古今文字，實在是不必要，卽使

寫了出來，也不會發生普遍的與深刻的影響。至於枯索的公式主義之新聞筆墨，是完全沒落的朽骨了，是應該改正的時候。甚至論道的文字，露着以爲極合邏輯的面孔在那裏斟句酌，有酸餡氣固不必說，也如唐荊川說的：『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我們眞眞要排斥他！

文學的時代是要燃起熊熊烈焰的情緒，要適應這個空前偉大的人生時代。做人也好，作文也好，風格與心情均融合在文學中，這個人類是有希望的人類，這個世界是有希望的世界；就是我們短短的一人一生，也是富於有濃烈情趣的。

宗教家的天國太懸遠了；享樂主義者的生活太糊塗了；雅片煙主義者的認識是在刹那的麻醉狀態中。欲求隨時清醒，而天國即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我以爲即是文學的時代眞理所追求而獲得的。

爲達到這個時代，所以我們曾提倡民族的狂飇運動；事實上，要盡人而富有活力。以之救人類，救國家，乃至於救自己，都是很有效的一條路逕。所以這個，并不單純只在談形迹間的文學，而是靈魂的文學化，全人類的文學化，惟有這個方是文學的時代！

藝術有用論

王平陵

謝六逸先生在貴陽中央日報上曾經大聲發出『藝術有用論』的號[illegible]當局立即在科學館內建築一座樸素實用的藝術室，他那[illegible]藝術的熱忱，必能獲得當局和民衆的贊襄，是無疑的。在他所作『貴陽缺少的是什麼』一文中，提出藝術有用的原則：『有用的藝術，可以使人與人彼此瞭解，互相合作，增加社會的親愛力，蔚成全民族的精誠團結。』眞是不刊的名言呵！因爲任何民族的文學均足以爲其民族生命的樞機，影響民族生命的發展，先之以轉移民族的氣質，繼則造成民族的本質。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在作品中所描寫的偉大人格，歌誦的光明面，以及咀咒的卑劣，無恥的行爲，暴露的黑暗層，都可以深深印入讀者的心坎，發生劇烈的情緒的昇華，積極改變人生的態度；爲要使全民族各分子的心靈，愈增和諧，祇有從文學上盡量充實各分子心靈的內容，把民族的立國要素，藉詩歌，小說，戲劇等等的陶養，在不知不覺中由離心而向心，由分裂而和諧，以造成全民族思想的統一，進而建設賴以立國的民族文化。

文學作者能遵循這原則努力於寫作，其作品不論能否成功，都與社會有益而無害。不過，作者們如果沉淪於享樂主義的泥沼，僅憑個人的偏見，專事帶有毒素的宣傳；或則缺乏藝術的良心，抹殺是非，混亂眞理，妒嫉別人的成功，而猶運用其巧妙的辭藻，文飾自己的錯誤，并且引誘盲目的羣衆來恭維他們的錯誤，甚至無故遷怒到一切，妄想燬滅了一切，藉以發洩個人的『不得志』，像這一類的作風，就祇能增加社會的戾氣，使人與人的關係，分崩離析，大家存着陰險殘酷的壞心腸，處處設防，佈電網，埋地雷，抵禦別人的暗算；所以，文學作者要是違背了這一個原則，其作品不但是無用，而且是有害的。

我們爲要使藝術做到有益於社會的程度，就必須根據謝六逸先生提出的原則，盡可能地獎勵藝術的製作，推進藝術的事業，例如廣立藝術館，藝術獎金，及發展純正的藝術運動之類，但同時更必須澈底清掃一切含有毒素的作品，使這些作品找不到生根立脚的據點，我們寧可讓社會無藝術，決不能使藝術害社會，就是荒涼到像沙漠一般的

社會，也要比毒菌滋長，微生物叢生的社會好得多。

抗戰到今天，有心人都有一個同樣深切的憂慘，就是，我們在六年來血火連天的苦戰中，已將打出新中國的根基；可是，作爲建設新中國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人的心』，大有每況愈下之感了。由於少數發國難財者的操縱囤積，造成生活上的空前困窮，而這些人不僅未受到法律和輿論的裁制，反是趾高氣揚，青雲直上，到處春風似的，卻有使好人不能安於自己的崗位，不好不壞的人，加速跑到作惡的路上去，少數已經作惡的人，就祇有愈益沉淪到阿鼻地獄裏，永不復返的種種情勢，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所以，如何挽回陷落的人心，確實是文藝界當前最切要的課題。

六逸先生又說：『在今天要想用藝術的力量，感化第一流的蠹蟲，雖三尺童子，也知道是無濟於事的。』這不是痛語，而是一句老實話。正因爲第一流的蠹蟲，是國法所不容而竟能巧妙地躲避國法的罪犯，他們的良心已經喪盡，早復返於原始的屬於人獸之間的一種無理性的動物，最高尚的藝術，雖能使鳳凰來儀，百鳥起舞，感天地而泣鬼神；而要格化冥頑不靈的害馬與國蠹，是不會生效的。不過，藝術家們也不必因此灰心，藝術畢竟是有用的，牠能使好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使不好不壞的人，振奮向善的勇氣。其實，那些第一流的蠹蟲，縱能以作惡的方法，掠取成萬成億的不義之財，在全國同胞救死不遑之際，獨自驕奢淫逸，縱情聲色的享樂，但當他們泯滅的良知偶然復活時，一定的，也是異常痛苦的。你能相信他們的生活比到心地光明，澹泊刻苦的人們更幸福嗎？不會的，他們較之一般僅在物質上感受痛苦的人，實在還要痛苦。他們耽心着國法的顯戮，掛慮着貲金的喪失，物價的忽漲忽落，會使他們善憂無常，誠惶誠恐，陷於精神錯亂的狀態。在他們雞鳴而起，孜孜爲利的時候，也是抱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其辛苦艱難，並不下於孜孜爲善的人們。在他們攫奪不義之財，悖入悖出的時候，正同孜孜爲善的人一樣，都是不睡覺的人。吳梅村詠吳王台詩云：『台畔臥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是的，大家都是通宵達旦，決不休息，拚命幹到底的人，所不同的一點，人家的不睡覺，是在生聚教訓，勵精圖治；而有些人的不睡覺，是在跳舞，醉酒，狂嫖，濫賭，和國家的元氣作對，替自己的壽命作對。

總之，人心的陷落，是眼前最值得關注的暗礁！我們決不能任其江河日下，滔滔不返，無論如何要竭盡一切的可能，把陷落的人心振作起來。振人心，對外要發揚正義，對內要扶持正氣，正義存，公道必伸，正氣盛，邪氣必衰，欲求斯效，匪異人任，全國藝術家們是責無旁貸的！

中國戰時戲劇創作之演變

田禽

戲劇是時代的鏡子，所以它必須反映着時代精神。否則，它便失去教育的價值，和藝術的功能。相反地，時代思潮也可以左右戲劇的傾向，影響着戲劇創作的體裁。

老實說，戲劇應該是舊時的改造者，新時代的創造者。基於此，創作的意念必須站在時代的尖端，也就是說，劇本的中心思想要對時代起着領導作用。這樣，它才能盡到它爲那一時代的觀衆或讀衆解答他們（或她們）當前急需解決各方面的現實的困難問題。也只有這樣，戲劇才能獲得廣大的觀衆或讀衆；也只有這樣，它才有社會存在

的價值和基礎。因爲藝術是爲服務人生而存在的，并不是人生爲服務藝術而存在的。作爲「靈魂的工程師」的劇作家，必須確定了「藝術是爲服務人生的」世界觀，然後，他才能把握着時代，而對着現實，忠實的表現現實生活的美與醜，或愛與恨，絕不逃避現實，避重就輕的鑽入象牙之塔！

進步的作家不但不會落在時代的後面，而且他更有着推進時代的動力！相反地，落伍的作家永遠是趕不上時代的，而且他根本也不肯趕上時代。

「七七」事變，可以說是抗戰的序幕。事實告訴我們，就在這個階段里，我們的劇作家羣迅速的把握住了這個偉大的時代。作爲這一時代的鏡子的戲劇，首先便是：「中國劇作者協會」集體創作的「保衞蘆溝橋」，田漢的「蘆溝橋」，以及胡紹軒的「蘆溝橋」……它們都像「活報」似的那樣敏銳的表現了抗戰序幕的現實。他們以興奮的心情，創作了富於煽動性的劇作，而觀衆（也就是民衆）也以興奮的心情來欣賞他們的劇作，不，簡直可以說是活生生的現實。

無容否認地，抗戰初期的劇作，大都單純的重視了宣傳作用，而忽略了宣傳必須與藝術統一的眞理。

由於民族革命的怒潮給全國民衆帶來了極度的興奮，所以，從來沒有寫過劇的人，爲了宣傳抗戰，他們也興奮地寫起劇本來了，從來把演話劇的認爲是「新戲子」的先生們，爲了宣傳抗戰，他們居然也興奮地參加了演劇活動。而觀衆也因爲在戲劇里可以看到中國人打勝仗，日本鬼子吃敗仗，所以，他們也都願意看這樣的戲，因爲這些戲都能叫他們「出氣」，「興奮！」總之，無論劇作家也罷，觀衆也罷，大家都生活在興奮的空氣裏。這是這一時期的戲劇的特徵，也就是這一時代的特徵。

這一時期的戲劇，我們不敢說都是粗製濫造的劇作，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大部份是不成熟的，儘管事實如此，可是，它在服務抗戰的政治要求上，確實盡到了它應該盡的任務，并且獲得了不可泯滅的宣傳效果。

就形式方面講，街頭劇，活報劇，舊瓶裝新酒的民間劇，都隨着抗戰的洪流，急劇的普遍的發展起來了！就內容方面講，主要的是反日反漢奸的鬬爭。然而在政治方面，每逢有一個新的號召的時候，我們的劇作家便敏銳的選擇了配合這一政治要求的主題，迅速的寫成戲劇，表演於觀衆之前。於是這新的政治的號召通過了藝術的形式便迅速的廣泛起來，不久，由於集體的意識引起了集體行動的反應。

無疑地，抗戰初期的劇作，在產量上是豐富的，特別是獨幕劇。

我們知道，戰前新演劇運動只是寄託於幾個較大的都市裏，雖然，我們曾經意識到新的演劇必須與廣大的民衆發生血緣關係，切實實現「戲劇大衆化」的理想是戲劇的崇高的指標。但，由於客觀條件的桎梏着它，使它不能正常的發展和成長。畢竟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環境，由於新的時代把舊時代的枷鎖打碎，因而新演劇運動也伴隨着爲民族爭生存的全面抗戰，而展開了爲民族革命運動而服務的戲劇的全面抗戰。所以，無論鄉村，城鎮，前線，後方，沒有一地方不是戲劇活動的中心，而且無論任何階層的人都有欣賞它的機會，它不再是少數人的娛樂品，而成爲多數人的精神食糧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擴大劇作的產量，供給演出上的需求，而且尤須擴大主題的範疇，以滿足觀衆的要求，但，由於我們的劇作家生活不夠豐富，另一方面，也許由於客觀環境的約束，於是多數的劇作家，只是在那些大家用得濫熟的主題上兜圈子，儘管寫出了很多劇本，然而它們的內容大部份是大同小異的。

値得注意的是陽翰笙的「塞上風雲」，這是抗戰初期，無論在主題的選擇上，與內容的表現上，可以說是獨具一格的劇作。由於作者思想的敏銳使他跳出了一般主題的窠臼，而且給戲劇創作的方法上另開了一段新的途徑！

再，洪深的「飛將軍」和「米」，也都是在武漢時期創作的，前者反映了那一階段的飛將軍們的現實生活，而後者又預先指出了奸商

操縱糧食的嚴重性。洪氏也像前一作者同樣的從生活中發掘了新的主題。「爲民族爭生存求解放的戰爭，當然是極其艱苦的和偉大的革命事業，」這種偉大的事業，決不是從短戰爭中能夠促其成功的，特別我們是一個弱國，我們必須艱苦的，長期的打下去，才能有辦法。所以我們的國策決定了長期抗戰。

在長期抗戰的過程中，一切的一切必然地都起了變化，特別是人民生活的情緒。因此，觀衆對於抗戰初期的戲劇——尤其是拖着「勝利尾巴」的結局的戲劇，感到厭倦，感到不夠親切或眞實，因爲他們耳所聞目所見的現實生活，幷不完全像劇本裏所表現的類似，因此，他們幾乎不再願意接觸抗戰戲劇，他們的腦海裏常是存在着這樣的意念，「又是抗戰戲，反正老是那一套，父親當漢奸，女兒深明大義，結果把她的父親幹掉了，或日寇在淪陷區，怎樣殘暴，怎樣強姦婦女，最後，游擊隊來了，把日本鬼子趕走……沒有什麼看頭。」

武漢撤退以後，大多數的觀衆對於一般的抗戰劇本都有着不滿意的趨向，我們的劇作家也深深的理會到這個危機。

曾經有一個時期；劇作家們採取了「噱頭主義」作爲吸引觀衆的手段，同時，在沒有下筆之前，甚至故事與主題還沒有處理妥當的時候，而預先便決定了如何吸引觀衆的佈景，以及每篇戲必然有着不少的愛情場面，……這樣一來，觀衆倒是滿意了，然而單純的用這些花頭作爲寫抗戰戲的出發點，試想它們怎麽會不把「抗戰」的意識冲淡了呢！

但，進步的作家們永遠是面向着現實，從生活的洪流裏，不斷的去發掘與觀衆有着密切關係的現實生活的新的主題。從不爲了低就觀衆的趣味，而在「噱頭主義」下向觀衆屈服。

是的，由於戰略的關係，我們的確失掉了不少的土地；因此，思想敏銳的劇作家們不再拘泥於一般主題的描寫，進而創作了反映淪陷區戰鬥生活的劇作，例如章泯的「戰鬪」，陳白塵的「魔窟」，以及王震之和崔嵬合著的「順民」，……都是描寫淪陷區生活的佳作，特別是陳白塵的「魔窟」，作者從每一傀儡人物的性格上和生活上表現出美與醜的鬪爭，幷且典型化了僞組織極其醜惡的東西。

這類的劇作又給了觀衆一種新的刺激和喜悅，一度的轉移了觀衆厭惡抗戰戲的不良傾向。

戰爭的勝利基礎奠定於兵源的補充和軍民合作上，於是兵役問題，和軍民合作的問題，又成了劇作家們的新的主題了，但，寫來寫去，總是那一套，觀衆仍然會厭倦的，但，讀者要注意，觀衆所厭倦的幷不在於主題的重複，而是劇作的描寫不夠深入。

洪深的「包得行」，演遍了後方各大都市與農村，無論那一地區的觀衆都在熱烈的歡迎着它。陳白塵（根據艾蕪小說「秋收」）所寫的「秋收」，劇中儘管沒有摩登女郎，沒有富麗堂皇的場面，依然轟動了戰時劇壇。關於兵役問題的戲劇，「包得行」可以說是代表作，關於軍民合作的戲，無疑地，秋收（即「陌上秋」）是其代表作。王爲一的「宣傳」也是值得推薦的一篇軍民合作的好戲。描寫漢奸人物最成功的戲當推曹禺和宋之的合著的黑字二十八。這些劇作之所以被人推崇，主要的是因爲它們有着崇高的藝術成就，而沒有陷入一般膚淺的「八股式」的戲劇的泥塘裏。

劇壇正在鬧着劇本慌的時期（其實是好的劇本在鬧荒），勞雷一聲，我們的優秀作家夏衍和曹禺各自貢獻出他們的傑作，前者呈現了擺脫「抗戰八股」式的劇作——「一年間」，後者呈現了「蛻變」。

我們的國策是抗戰建國同時幷進的，因此，戲劇爲了吻合政治的要求，必然地，也應該不單是表現抗戰，而同時更要表現建國。建國的基礎是多方面的，然而不可否認地，建立民族工業乃是建國的重要的一環。陳白塵的「大地回春」充分地把握住了這一點，而且在表現建國的劇作當中他作了急先鋒！

漢奸汪精衛叛國後，曾經有不少的劇作家選擇了這一主題，馬彥祥的「國賊汪精衞」在反汪鬪爭中盡了相當的任務。

與陽翰笙的「塞上風雲」有着異曲同功的劇作——「國家至上」，（宋之的，老舍合著，）乃是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政治口號提出不久以後的優秀作品。前者是提醒蒙漢應該澈底合作共同抗日的劇作，而後者是啓示回漢團結懺悔的作品。

由於後方一般人迷於都市的奢侈生活，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甘心走捷徑，企圖發國難財，宋之的抓住這般人們的弱點，攝取了現實生活的眞實，創作了暴露大後方黑暗面的「霧重慶」（即「鞭」）。

這是一篇最富於現實性的佳作，在這個劇裏有着專走捷徑的智識份子，跑香港發國難財的飛機階級的奸商，也有着爲祖國而戰鬥的女性，兩方對比，更能顯示出大時代中不同思想的人物所走的不同的路！

關於表現淪陷後的上海現實生活的作品；如洪深的「黃白丹青」，夏衍的「心防」，于伶的「夜上海」……都是値得令人喜悅的劇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曾經有一個時期，由於寫作的主題不夠廣大，又走入了千篇一律的地步，因而抗戰戲劇又遭到了觀衆的冷眼！於是重慶的舞台一度爲了維持他們的起碼生活；不得不在生意眼的劇本上打主意，所以間或也把表面上與抗戰無關的外國劇本搬上了舞台。爲了這，曾經引起了批評家們的一場爭論。

曾經有一個時期，有幾位劇作家寄居在香港，并且他們時逢其會的趕上了香港的戰事，因而他們親自觀察和體驗到香港的實際生活，由於他們有了那次的經歷，更使得他們的生活豐富，所以展轉到後方以後，把淪陷前後的香港縮寫成最富於現實性的戲劇，例如宋之的的「祖國在呼喚」，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原名第七號風球），都是香港淪陷以後這一時期的佳作。

近一二年來，歷史劇的產量特別豐盛，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孔雀膽」，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陳白塵的「翼王石達開」，楊村彬的「淸宮外史」，都受到觀衆的熱烈歡迎！

歷史劇豐盛的原因，固然由於歷史劇比較表現現實生活少受一些客觀環境的約束，是其原因之一，此外，觀衆之樂於接受，更鼓勵了劇作家們的寫歷史劇的傾向，因而，造成了寫歷史劇的風尙。然而作家們的生活不夠豐富，深入，以及客觀環境的約制，也是局限了寫作範圍的主要因素，我想，這話并不苛刻！

近年來，還有値得我們注意的一種現象，那就是多幕劇的產量多於獨幕劇，而在多幕劇中又盛行着五幕，甚至六幕劇。

自然，有許多進步的作家，他們并沒有放棄獨幕劇的寫作。不能否認地，由於多幕劇一旦上演就有上演稅可拿，因而也有的作家們簡直就放棄了獨幕劇的寫作，而專心一意的去寫有上演稅可拿的多幕劇去了！於是，即使獲得了只能寫獨幕劇的材料，也就不得不費盡心思，故意的把它「拖長」爲五六幕的戲，企圖一旦上演，便可解決一時！這種情形之下寫出的劇本，其結果如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它的寫作技巧，夠不上藝術水準是必然地。然而它也有時竟欺騙了觀衆，甚至演出者，而自己便躲到一邊去竊心的微笑！自己安慰或祝賀自己說：『我的劇本成功了，要不是傑作，演出者爲什麼會把它搬上舞台，而觀衆又爲什麼買「飛票」都要去看呢？哼，這一來，我可成了中國的名劇作家了！……』其實，天曉得！

其次，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劇場問題。以重慶而論，祖國泰的劇場，必須等到晚場電影散場後，才能演出，又因現在的戲都是以長取勝，戲散場起碼是一點鐘以後，這，對於觀衆的健康確有很大的影響，而同時，由於觀衆的過度疲乏，往往也不能獲得戲劇的整個印象，這，無論站在宣傳效果上講，或站在觀衆健康上講，劇場問題，確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希望政府能重視這一嚴重問題！

我們要知道，劇場的存在與戲劇的創作是有着血緣關係的，因爲有什麼樣的劇場就產生什麼樣的劇本。劇場決定劇作的形式，而劇作的形式也往往影響劇場的改進！

陳白塵的「亂世男女」，假如我們有西洋那種「活動舞台」(Movable Stage)，也許早就表演在我們觀衆之前了！因爲我們缺乏這樣的

舞台，所以，像這樣的好戲也不得不暫時擱在書櫥裏，只供讀衆研讀了。

雖說，我們的戲劇創作都能適應着客觀環境逐漸的演變着，儘量的配合着政治要求，但，每一新的轉換期到來的時候，其初期的創作還都能把握住那一新的時代，然而時日一久，終於流入了千篇一律，不過，劇作家們都還有着自我批判的精神，因此，即使在創作上有了某些不良的傾向，也還能提起自己的警覺性，慢慢的改正過來。這點，是值得我們喜悅的。

假定我們把戰時戲劇創作，劃分爲三個時期：以「七七」事變到武漢撤退爲第一個時期，武漢撤退到太平洋戰事爆發爲第二個時期，太平洋戰爭以後爲第三個時期吧。無容否認地，第一時期是只憑着興奮的心情從事創作，粗製濫造當所難免，人物概念化，代表化，劇本內容類型化，特別是單純的注重宣傳效果，而忽略了藝術或技巧。以上幾點是這一時期的通病！

舊瓶裝新酒，以及改編外國名劇，也曾經成了一時風尙。馬彥祥根據「祖國」改編的「古城的怒吼」，以及宋之的和陳白塵合作改編的「民族萬歲」，在改編的諸劇作當中可以說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朱雙雲的「淝水之戰」是舊瓶新酒的代表作。

值得提及的是：這一時期的戲劇眞正做到了「戲劇大衆化」！換句話說，就是眞正的深入民間了。同時在劇作的產量上也居於首位，特別是獨幕劇或街頭劇。

武漢撤退後，由於戰局的穩定，給了劇作家在創作修養上一個反省的機會，於是，他們的創作態度有了改變，重視「宣傳與藝術的統一性，而且在人物的描劃上不再是概念的化身，或臉譜主義了，并且也能深入的以人物的生活作基點來精細的，合理的刻劃性格了。也許因爲這個原故，作品的產量比較減少了，因而提出了「劇本荒」的口號！其實，這減少產量的現象并不可慮，因爲粗製濫造的東西不再像剛一開戰那樣受人歡迎了。相反地，像樣的劇本，倒比第一期多了起來。

這時，觀衆欣賞戲劇的水準逐漸的增高了，這，多少也刺激了劇作家們在創作上不能不加工細製。

第三個時期，從創作的傾向看，特別着重了後方的現實生活。但，不久又轉入歷史劇的階段，原因，當然有着主觀與客觀的條件存在着的。這一時期，雖然印刷條件極度困難，但，并沒有十分地限制了劇本的出版，而且大多是五六幕的大戲，獨幕劇的創作，雖說沒有根絕，但，它的產量確是窮乏的可憐了！這一階段，創作上的成就，較諸以往更爲輝煌。

限於篇幅，我們不能把每一期所有的劇目紀錄在這裏，只好簡略的把比較優秀的作品提提，這點，還希望讀者和劇作者特別原諒。

時代的巨輪不停地的輪轉，戲劇創作也必然隨着時代的齒輪而演變，相信，每一齒輪的輪轉，不但在創作的傾向上有着必然的進步，而同時在創作的方法上也必然有着新的進步，而且更能帶來新的創作技巧，優良的劇作，以及優秀的新軍——新的劇作家。

邱吉爾的雪茄煙

許君遠譯

萊斯敦（James B. Reston）作，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紐約時報」（係由倫敦拍發之專電）。

便是我們最後和最少的快樂的幻想，顯然也要隨着戰爭的結束而該定毀滅。我們很不應該把它提起，我們還有重要的事，很容易整個

把這末節忽略，不過我們對於邱吉爾首相雪茄的意見似乎全屬錯誤，縱然有全世界雪茄最大鑒賞家之譽，這位仁兄看到烟了並不知道爲好爲壞，並且當一枝好烟交給了他，他也不知道如何吸法。

一位很有權柄且有資格坐在英國內閣辦公室內的人，當然常常聞到首相著名哈瓦那烟的味道，根據他的說話，我們很可以說邱吉爾先生是一位「嚼烟者」——那就是說，他從兩頭吃烟，而且常常犯着讓烟在他的牙齒中間很長時間熄滅的罪。

誠然地，他得到很多的上好雪茄。每一位從產菸國家來到的大使和公使，總是帶着一件私人的貯藏，並且遇到運輸不給，那末部分的原因也許就是由於他的景仰者從世界各部給他運輸他所愛好的雪茄。同時也是眞的，在他吸烟的時候，雪茄常被嚼去大部，不過每日總有大量的雪茄送到唐寧街十號，千百種極品的哈瓦那放在每一個辦公室內可以隨手取得的地方，所以他的選擇也往往摸到兩角五分錢兩支的劣貨。

但是邱吉爾先生的雪茄的確能在不列顛的政治生活上達成重要的任務。如果你試一展開不列顛的政治歷史，你的結論不是說英國人民把最有特別習慣和幻想的人擺在唐寧街十號，便是認爲在白廳(Whitehall) 外面那所有著獰惡可怖怒形於面的建築，容易把它的住居者養成特殊的習慣。

舉例來說，狄斯萊里(Disraeli)以他的鬈髮，有生氣的鵝絨衣服，和帶諷性的小說作成很大的政治的本錢。愛斯葵先生(Mr. Asquith)寫詩；彭納・勞 (Bonar Law) 用一杯半奶慶祝他在英國政治生活中的成功，便以「絕對禁酒者」賺得了聲望。

自然，在他的輝皇的生命將近八十五歲的時候，格蘭斯敦先生(Mr. Gladstone) 離開了「十號」，那時人們才知道在餘假的時候他在試着調和「荷馬和救世主的天地開闢論」(Homeric and Messianic Cosmogony)，並且決心在他死前把這理想作個結果。

英國人民對於他們首相們的習慣特別稱讚，而這種習慣如果落在旁人頭上，便會一文不值。在這一個國家裏面，有很多的人民慣於吸食雪茄，但是似乎很難有很多的供應。美國副總統馬夏爾(Thomas R. Marshall)也不知道淡巴菰的價錢。而英國國家所需要的是五角一枝的優等雪茄，只有像邱吉爾那樣孚衆望的纔能夠揮舞着哈瓦那，在新聞片裏向人們噴烟，然後又拿着雪茄揚長地走去。

新聞檔案堆裏充滿了關於邱吉爾雪茄的故事，一如十號的地窖裏裝滿好的和壞的雪茄。舉例說，其中有一個是說一位紐約雪茄商，在一個曼哈敦 (Manhattan) 建築裏擺雪茄攤，一次接到邱吉爾先生拍給他的一封電報，電文是這樣，「盼照前次貨樣再送一千枝，隨你的便，差不多就行——邱吉爾。」這一個文件汚辱了倫敦的眞正雪茄專家，他們聲言像這樣一位對他的雪茄漫不經心的人，眞不配稱爲全世界第一號雪茄吸食者。

邱吉爾先生每天吸，嚼，消耗或者毀壞約莫八枝雪茄，鑒於在這個過程中所浪費的精力和火柴，他的同事常常拿這件事作爲他是不稱職的代表作(Masterpiece)。

但是，他並不向任何人說道歉的話。在非洲戰爭最黑暗時期他有近東之行，決定要更換那一個地帶的英國司令，蒙哥馬利將軍 (General Montgomery) 以爲把他那嚴格的淸教徒習慣告訴首相，會能給他一個印象。

「我從來不吃烟不喝酒，所以我是百分之百地適當，」蒙哥馬利將軍說道。「我也吃烟也喝酒」，邱吉爾先生回答，「同時我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地適當」。

在環飛世界的旅行中，邱吉爾先生的雪茄是一種特別的威脅。他對於在飛機和裏面吸烟的地方很小心，並且也服從機師的規程，不過越是興奮，他吃的越兇，噴的越厲害。

「我絕不會忘掉首相的雪茄」，魯吉斯 (John Ruggies) 說，他是送邱吉爾到莫斯科那架解放式機的副機師。「他把飛機弄的到處是烟，結果我們不得不把炸彈門打開了。」

不過邱吉爾雪茄已經打破唐寧街十號的傳統，並且大大地困擾了不列顛內閣。它們是一切戰時救濟拍賣品中最受歡迎的貨色。在援蘇募捐舉行那天，有十枝邱吉爾雪茄陳列克里斯提拍賣行，結果賣二百一十鎊一枝的高價。「援蘇募捐真是奇怪」，他的一位同僚說，「不過我希望購買的人不要把最臭的貨色買去吧」。

翠玉戒指

Martin Armstrong 作　錢歌川 譯

年老的塞頓小姐，身材很高，骨瘦如柴，鼻上架着一副老光眼鏡，戴着一頂女孩子用的庭園帽子，手上提着一籃花，走進牧師邸宅的園門來。她把花提到衣帽室裏。那兒有一張粗糙的松木桌子，上面擺着一些空的花瓶和鉢子。

她把籃子放下，很當心地從那裏面把花取出來，開始配着插進瓶子裏去，掛在周圍的那些各種各樣的衣帽，像不用的稻草人一般，如醉如癡地在旁望着。她時常停下手來，站退一兩步，去看插得好不好，如果她覺得不好的話，她便要把嘴唇咬緊，眼鏡後面的眼珠子，也幾得和小石子一般的堅硬無情了；如果她覺得滿意的話，她的眼鏡上便浮滿；了仁慈的青光，嘴唇收縮攏來，結成一個意外溫柔的微笑。

在那小窗下，裝有一個洗面盆，當她把花插完了，便走過那兒去洗手，先把她手上的戒指取下，放在兩個龍頭之間面盆邊上。好不像愛密麗，今早上打電報來說，今天不能來了，改在明天再來。那簡直不能想像，不曉得是什麼使她臨時要那樣地改變計畫。

當她在想着她妹妹那種出乎意外的行為的時候，她機械地洗過了手，揩乾了，又伸手去取了那些戒指來帶上，直到她帶好了兩隻戒指，她才神志清醒，恢復常態。

那第三隻翠玉戒指那裏去了？

她詫意地凝視着自己的手，隨又再凝視着那洗面盆的邊上。於是她記起來了。今天早晨，在她下樓去吃早餐之前，當她正在帶戒指的時候，那新來的使女瑪麗，妨害了她多年來的例行常規，竟跑來敲門，遞給她愛密麗來的電報，她接來看過，便即時走下樓去，忘記帶上那第三隻戒指。

她平常決不是這樣健忘的，也正和愛密麗平常決不會在吃早餐以前來打電報一樣。

塞頓小姐把她那些花瓶，都放到餐廳，門廳，和長長的白木壁板的客廳裏原來的地位上，隨即便走上樓到臥室裏去了。她一點不疑惑地，以為那戒指一定是忘記在臥室裏，不意走上去一看，竟不在那裏，這可使她吃了一驚。

她站在那里滿懷疑惑地以冷眼凝視着那放戒指的地方，半響沒有動，然後才轉身走下到客廳裏去了。

她方寸中很覺擾亂。使她擾亂的，不僅是失掉了戒指，還有點別的什麼。在她發見那戒指不在那洗面架上的時候立刻她便覺得有一個內在的聲音，細聲說道：『瑪麗』！

她素來對於用人都是處得很好的，把她們視為家人一樣。瑪麗是一個能力很好的，年輕漂亮的婦人；兩個月前來接工的時候，塞頓小姐一見就很喜歡她，剛纔雖然一時曾疑心到是她偷了那戒指，可是馬上又自己否認了。

塞頓小姐一向的辦法，是不把錢和珍寶到處亂放的，因為她覺得

把那些誘惑物，放在別人的前面，是不對的。甚至一個誠實的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也免不了要被一種突然的誘惑所動，而不能不屈服。而且還有所謂盜竊狂的那樣一回事：她回想到兩三年前使得四鄰轟動的，史搭克頓老太太偷了東西的那回異常的事情。

她坐在那裏沈思默想了很久，直到最後她還是讓她自己承認了那內心的告發，而向這一方面去想了。一種突然而來的誘惑，一個不及預防的時會，竟把那事情做了；既做之後，又有什麼辦法去取消呢？不過，雖則那犯者也許不能把她自己許可的事取消，別人也許可以幫助她來解除的。是呀，或許她把瑪麗叫來，透露一點這個意見……問問她，或許……。

從容而細心地，她想出了一個辦法，板起面孔，眼鏡後面的眼珠子，變得和小石子一般的堅硬無情，那博學的審判官想出了一個辦法，而認為頗好。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按了一下鈴子。『亞格利斯，你去告訴瑪麗說我要和她說話。』

一分鐘之後，瑪麗就來了。『哦，瑪麗，我今早上忘記了一個戒指……一個綠寶石的戒指……一個翠玉戒指，在我的化粧臺上那放戒指的地方。我剛纔上去拿，卻不見了。你看見沒有？』

『一個戒指嗎，太太？沒有，我沒有看見什麼戒指。』

那副眼鏡望着瑪麗的臉，注意到她的臉色變紅了。『那末，一定是掉在地板上去了。你可以到那化粧臺和五斗櫥的下面，去仔細尋找一下。那恐怕一定是掉在那下面了。』

哦，她多麼容易地給了瑪麗一個悔過的機會，她只消把那戒指交還就得了，說她是在那五斗櫥下面找到的。只要她交出來，她也就不會再對瑪麗怎樣的。她將把這件壞事情永遠忘懷。因為她把戒指亂放，畢竟她自己也有些不對。

但是不幸她的辦法沒有發生効果。不一會，瑪麗就轉來了，說她沒有找到。

『你確實看了不在那里嗎，瑪麗？』

『確實沒有，太太。』

那副眼鏡又再堅硬而固定地，細察了那年輕婦人的面孔，而注意到那面色變得堅硬無情，她的眼睛中也現出頑固的神氣來。這多麼令人傷心呀。這樣一個異常可愛的女孩子。

塞頓小姐感到沮喪而不知所措了。她現在要怎樣辦呢？從此以後，別的東西也有被偷的危險，即令她不像別的東西，不過下回有什麼東西失掉了，要不疑心瑪麗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若再留她在這裏，日子一定過得不快活的。

那天夜裏，她躺在牀上沒有睡着，心上一直在想着這件苦痛的事，最後她決定把瑪麗打發走。第二天早晨，剛吃過早餐，她便把瑪麗叫來了。

『瑪麗，我非常不願意地，不過我已決定請你去另外找事。』

她望着那女子面孔變白了。

『太太，你不滿意我的工作嗎？』

『瑪麗，在許多方面，我都非常滿意，不過還不是全部滿意。』

『太太，如果你肯告訴是為得什麼事的話……。』

『瑪麗，我想還是不談的好。我只能說，我和你分別，我很難過。』

瑪麗的臉變得更加蒼白了，而其表情也就堅硬無情。『也許，你願意我馬上就走吧，太太。』

塞頓小姐想了一下，『你希望馬上就走嗎？』

『是，太太。』

那老小姐點了一下頭。『好的，瑪麗。』

她嚴肅地正襟危坐着，直到瑪麗走了出去，把門帶關之後，她才帶着一種突然絕望的動作，一下把眼鏡取了，用手去摸她的手絹，眼淚流出來了。

那事情使她那般傷心，竟沒有能夠告訴她的妹妹。不久就有一個

新的使女來，做瑪麗的工作，使得在那牧師邸宅中的生活，照常舒適而單調地繼續下去了。

兩年之後，她聽說瑪麗和喬治巴羅結了婚，巴羅是附近城裏一個裝置鉛管的人。塞頓小姐和他很熟，而且很喜歡他。因爲他是牧師邸中的老用人，他的父親在他以前就在塞頓家做過多年了。現在瑪麗嫁給了他，生活很好，而又幸福，他聽了很是高興。哦，只要她能夠正確地明白瑪麗爲什麼要偷那戒指就好了。塞頓小姐覺得只要她能夠明白那回事，明白那一切的境遇，她就可以了解，而不再爲此難過了。

因爲那傷痕一直沒有好。使她傷心的，倒並不是一個戒指的損失。那個可恨的戒指，有什麼關係呢？只是在她和她那般喜歡的這個姑娘之間，突然發生的那種可怕的裂痕，使她覺得傷心。也許瑪麗現在早已忘記了，但是她卻忘不了。她不能忘記。年復一年，每當她在那衣帽室去插花，插好洗手，再把戒指帶上的時候，那往事重又縈懷，隨着帶來了舊日的苦痛。

在八月的一個早上，那已經是她開除瑪麗十年後的事了，她把所有的花瓶，都插好了花之後，看見那兒還剩下不少的花，她便到門廳裏去拿了一個笨重的東方的花瓶來。

那裏面滿是灰塵，她便拿到洗面盆上去洗乾淨一下，但是她那老年的手，近來有些發抖，一個不當心，就把那花瓶掉在洗面盆裏了，把那面盆打成兩塊，她只好派人去叫巴羅來，把舊的撤去，換上一個新的。第二天早上，她在衣帽室裏遇見了他。

他已經把那破面盆撤掉了，正跪在地板上，用手拿着一根S形的水管。他用一隻螺旋啓子在細心查看着裏面，然後把它好好地裝在支撑面盆的一個鐵托架上。忽然他從那裏面拾出一點東西來，放在手上，細細地在看。

塞頓小姐和他說了一聲『早』，巴羅一聽見她的聲音，便回過頭來，伸出他那打開着的手。『您早，太太。這東西是您的嗎？』

塞頓小姐屏着氣息，站在那兒凝視着他伸出來的手。『是的』，她終於回答了，聲音小得幾乎等於耳語。『是的，那是我好幾年前所失掉的。』

他抬起頭來望着她。『眞奇怪，有時候東西會弄到那樣一些地方去，』他說，他的眼色和聲調中，全沒有一點什麼不對的神氣。

她呆立在那里，兩目無光，說不出話來。最後，她才向他：『那末，你知道關於這戒指的事？』

『是的，太太，』他答。『瑪麗把一切都告訴過我了』。

她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我不要這個了』，她說。『我再也不能來帶它了』。她停止了一下，又加上一句：『我想你也不會要它吧。』

『是』，他說，『我不要』。

他還是伸着他的手沒有動，於是，帶着一種突然的動作，她攫取了那隻翠玉戒指，蹣跚地走到客廳裏去了。她驚呆得人事不省了。儼然是一個大的爆炸，把她過去十年的生活都炸毀了，她茫然地坐在那兒，戒指放在她的膝上。

最後她動了，僵硬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來；那戒指滾到地板上去，她也沒有注意，她再走回到衣帽室去。巴羅還在那里。

『巴羅』，她說，『你回去的時候，請你替我問一聲瑪麗，看她允許我去看她麼？你來裝新盆子的時候，可以給我一個回信。』

在憂慮和希望的狂熱之中，她等待着他轉來。兩天之後，當亞格尼斯來告訴她，請巴羅來裝新面盆了，她便馬上跑到衣帽室去。

『哦，巴羅，你早。你給我帶來了瑪麗的回信嗎？』

他回過頭來。

『帶來了，太太。她要我對您說，她並不記恨，一切都過去了，既往不咎，不過，如果你不見氣的話，她請你不要去看她。』